

塔里克·阿里谈拉丁美洲 反新自由主义运动的新进展

林小芳 查君红 编写

2004年7月22日“委内瑞拉分析网”(www.venezuelaanalysis.com)刊登了该网站记者对英国著名政治活动家、英刊《新左翼评论》的资深编辑塔里克·阿里的题为《委内瑞拉：以夺取政权改变世界》的访谈。访谈中阿里重点论述了委内瑞拉反新自由主义的成功经验：查韦斯拥有政权，并且利用政权切切实实地在改善人民的生活，因此将会赢得最终的胜利。作者也大量涉及正波及整个拉丁美洲的反新自由主义运动，特别批评了巴西劳工党，认为该党虽然通过反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纲领赢得大选的胜利，但是上台后提不出替代性的建设方案，没有给人民带来利益，将来会失去人民的支持。访谈主要内容如下。

记者：你如何解释在拉丁美洲爆发的众多反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运动？

阿里：我认为，原因在于长期以来美国将拉美当做一块实验田。美国所想做的一切首先是在拉美实验的。美国人想要以军事专政粉碎人民运动时，他们首先是在拉美这样做的：巴西、阿根廷和智利，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三个最残暴的专制政权。然后，在共产主义对手溃败后，美国人在政治方面放松了，而从经济上牢牢控制了拉美，他们说“这是惟一向前走的道路”。然而在美帝国的实验田首先发起了对帝国的反抗。在拉美发生了如此之多的各种各样的和值得关注的运动，但是我认为，这里的左

派是弱小的，它没有能力将那些运动捏在一起，并重建拉美左派。

在拉美开始发生的是非工业化过程。典型的例子是皮诺切特领导下的智利，然后是卡多佐领导下的巴西和连续几届政府领导下的阿根廷。他们破坏了本国的民族工业，他们认为国家可以在一种虚假的繁荣所制造的经济泡沫中运作。这种繁荣主要是由外国投资推动的，国外的钱总进入低利率的银行，但每当投资遇有风险，又迅速抽走。外国投资者完全没有任何动力来建设巴西或阿根廷，他们进入拉美纯为了投机和掠夺。因此逐渐地开始兴起一种自下而上的新社会运动：农民运动，无地农民运动，失业劳工运动，它们最初是在微观层次，在乡村、城镇、本地、本区域开始发起挑战。然后逐渐地开始扩散开来。

记者：结果是遍及整个大陆的抗议……

阿里：你见到玻利维亚的科恰班巴爆发了反对水业私有化的起义。你见到秘鲁库斯科的农民反对电业私有化的斗争。对上述两种斗争，当事国政府首先是镇压，然后它们不得不让步。然后你见到了阿根廷发生了难以置信的崩溃，不到三个星期，换了五位总统。这开始鲜明地表现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危机。然后你见到了巴西。在巴西，你见到了卡多佐彻底破坏民族工业的情形。那里没有培植出民族资本家，国家开始遭难。

记者：你认为美帝国试图提议一种更温和

的新自由主义版本吗？

阿里：我不认为美国人当下准备那么去做。他们只有在自己感受到威胁时，才会那样去做。而当前他们没有感受到任何威胁。这里，我不得不非常不客气地指出，他们没有感受到威胁，原因之一是社会运动喊的是理想主义的口号：“我们可以在不夺取政权的情况下改变世界”。这一口号对任何人都构不成威胁；它只是一个道德口号。你知道，当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从恰帕斯行军到墨西哥市时，什么都没有改变，它是一个道德象征，甚至不是一种道德上的胜利。在拉美政治中，这个阶段是可以理解的，当时人们因这样的事件失去了锐气：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失败，武装斗争运动失败，军政府胜利等等。但委内瑞拉的例子是最有趣的。它宣称：“为改变世界，必须夺取政权……否则，就什么都不会改变。”所以，这是一种有趣的情形，我想，明年在阿雷格里港市，所有这些事都将得到辩论和讨论。

记者：全球社会正义运动没有充分地考虑国家政权问题，那么它们提出了怎样的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方案？

阿里：不，它们没有替代方案！如果你没有替代方案，那么你对你所动员的人说些什么呢？巴西无地农民运动有替代方案，他们说“夺取土地，还给贫穷的农民，让他们有地可耕”。而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观点是不实际的。因此，对我来说，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模式比恰帕斯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模式有趣得多。确实是有趣得多。

记者：你如何理解巴西草根阶层与政府之间形成的对峙僵局？

阿里：我认为，在巴西，问题在于：劳工党赢得了人民的尤其是穷人的信任，但它迄今为止不能拿出任何东西。事实上，在卢拉任期的第一年内，农场主和警察已杀害比以前更多的无地农民运动斗争者。依我之见，这些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劳工党没有考虑过任何真正的替代方案。他们在公开场合说，“是的，我们将为无地者分配土地，是的，我们肯定会

做的”。但他们还没有做任何真正的准备。我担心卢拉是一位弱势领导人。他在掌权后忘记了他为什么会上台。相同的事情也发生在波兰的瓦文萨身上，大规模民众运动将其推出，结果他赢得了选举。他拿出了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于是不久他被人民投票否决了，而这也将发生在卢拉身上。

记者：重建巴西左派……

阿里：依我之见，我们在巴西需要的是一场重建巴西左派的运动。宽泛地说，这场运动必须包括劳工党党员（其中有许多国会成员、参议员和草根阶层成员），应该包括无地农民运动成员（一个非常关键的组成部分）和现已觉醒的巴西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阶层。这三个组成部分对于重建巴西左派是非常重要的。一小群人走出来，宣布“我们是一个新政党”，以为这样做就行了，这是愚蠢的。你需要一种新型运动和一个不同于劳工党的新型政党。巴西的工人阶级现在是一个以非正式就业为主的工人阶级——它已不复是当年劳工党创建时的那种状况。因此你现在要有不同的优先考虑。你重建的巴西左派必须与这些新的优先考虑和当今的巴西现实相一致，而不是与过去的一些虚构图景相一致。

在巴西选举之前，我在圣保罗州黑河市参加一次集会，人们问我：“如果你是一个巴西人，你会投票给谁？”我说，我会将票投给代表巴西大多数贫穷者的卢拉。但我还说，我非常担心卢拉将会忘记谁投票将他推上台，而将会迎合那些未投票给他的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这些机构没有投票给卢拉，但其政策正得到执行。我说，这将是一个悲剧，人们又会喘不过气来，而这些正是现在所发生的。在我看来，卢拉和卡多佐之间的关系就是撒切尔和布莱尔之间的关系。布莱尔紧随撒切尔之后，卢拉也紧随卡多佐之后。他们是纠缠在一起的，这是巴西的悲剧，在四到五年内，人们将大范围地觉醒；右派或许再次赢得胜利，而左派将不得不从头开始进行斗争。

记者：例如，在哥伦比亚，存在着与冷战时期美国的拉美战略极为相似的大规模军事化。这与你所指出的美国在拉美的新战略主要着眼于经济似乎是矛盾的。

阿里：目前，哥伦比亚是一个例外，当然委内瑞拉也是，美国人试图推动一个新政变，不过失败了。在任何地方，美国人认为民主不能服务于其利益，他们就会转而动用军队，这是明显的。但目前的问题是：如何建设一个可以为穷人谋求社会民主福利的社会。这是我的观点的关键所在，这也是委内瑞拉为什么非常重要的原因所在。在卢拉当选之前，出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阿根廷崩溃了，而在委内瑞拉有查韦斯，如果巴西、阿根廷、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和古巴组建了玻利瓦尔联邦，这样就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观察世界，也造就了一种不同的社会形式，它不是压迫性的，也不是邪恶的，会改变穷人的日常生活。可惜这没有发生。依我之见，基什内尔比卢拉好；前者正在某种程度上试图做出抵制。大失所望的是巴西劳工党，人们实在大失所望。古巴向拉美派出了大量的医生，数以千计贫穷的委内瑞拉小孩去古巴学习当医生。查韦斯和委内瑞拉正在吸收古巴的长处，在卫生、教育等方面进行改革，巴西在这些方面本可以做得很好，但它没有做。

人们去实地看看委内瑞拉正在做什么是有意义的。去贫民区，看看那里的人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再看看这个政权成立之前那里的人又过着怎样的生活。不能总是以旧眼光看问题。不夺取政权就不可能改变世界，这是委内瑞拉的例子。查韦斯正在改善普通人的生活，这就是难以推翻他的原因所在，否则，他早被推翻了。喊口号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对于普通人，给他们提供教育、免费医疗、廉价食品比所有的口号加在一起重要得多。

记者：你如何看待委内瑞拉式的参与民主？

阿里：我认为它需要得到加强。我还认为，它是弱小的，运动需要在每一层次（小村

庄、城镇、不同的街区、组织）制度化，这可以是非常宽泛的：例如玻利瓦尔小组定期地碰头，相互交谈，讨论问题，而不只是对上面的呼吁做出回应。该制度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知道，查韦斯在拉美是一个不寻常的家伙，非常的特别，而且他年轻，我祝福他长寿延年，不过他必须为这个国家的未来创建超越人亡政息后果的机构。

记者：委内瑞拉的利害得失是什么？关乎谁的利益？委内瑞拉可以单独存活下来吗？委内瑞拉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呢？

阿里：委内瑞拉是一个美国人希望铲除的范例。因为如果该范例存在，并越来越强大，那么巴西人、阿根廷人、厄瓜多尔人、智利人、玻利维亚人都会说“如果委内瑞拉人能做，我们也能做”。这就是美国人为什么花费数以百万计的美元资助该国愚蠢的反对派的原因所在。我还认为，直到最近，玻利瓦尔革命的弱点之一是它没有对其他拉美国家做更多的事情，因为它局限在本国范围内。

记者：在委内瑞拉，主流的私人媒体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作用。如何与故意编造的假信息做斗争呢？

阿里：我们在拉美缺乏的是通讯手段，我们需要像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这样的卫星频道。需要一个这样的媒体，它定期地报道右派正在说什么，左派运动正在说什么，它对无地农民运动想做的事进行说明，它对卢拉构成挑战，但它相当独立，不从属于任何国家机构。拥有这样一个向英国广播公司和有线电视新闻网发起挑战的拉美频道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你认为，在8月15日查韦斯获胜之后，反对派和美国将推出怎样的策略？

阿里：我认为，那时他们剩下的惟一策略就是尝试通过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他。■

[林小芳：浙江大学法学院；

查君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责任编辑 刘元琪）

澳共的主张及其对澳主要政党的态度

杨成果 刘春元

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党于1996年10月6日更名为澳大利亚共产党,这标志着澳大利亚在1990年底共产党自动解散后,又有了新的共产党。新澳共在理论上不断反思创新,在实践上不断调整政策,使其纲领和政策更加符合国情,其影响也不断增大。本文主要介绍澳共的发展历程、主张及其对澳主要政党的态度。

一、澳共的历史演变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澳大利亚共产党于1920年10月30日宣告成立。澳共是工人阶级政党,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为斗争目标。1920年12月3日澳共发表的宣言指出:“只有通过整个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我们才能获得解放,这是一项基本原则。”^①

澳共自其成立之日起便十分重视工会的作用,因为工会是澳大利亚工人阶级的主要群众组织。澳共党员都参加各自的工会,并在许多工会组织中起领导作用。澳共第一个倡议建立澳大利亚工会联合理事会(英文缩写是ACTU),并为它的筹建做出贡献。澳共的思想影响了工会,如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爆发时,澳大利亚工会联合理事会发布的决议指出:“失业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其固有属性决定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人的需要。只有把工业(即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社会化,才能消除失业的根源。”^②大萧条时期,澳大利亚有大约

30%的工人失业,许多家庭由于付不起租金而被赶出家门。澳共领导工人与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以各种方式来帮助这些家庭。澳共党员的努力使澳共受到了工人们的尊敬,尤其是在煤矿业,澳共党员被选为矿工联盟(the Miners' Federation)的领导。

“二战”时期,澳共大约有4000名党员参加了军队,站在反法西斯斗争的最前线,扩大了党的影响,党员一度增加到两万多人。

冷战开始后,澳共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注重加强国际联系,支持世界工会联盟(World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澳共领导工会为减少工时而进行了艰苦的斗争,首先使许多工会的工时缩短为每周40小时,随后又使煤矿工人和码头工人的工时缩短为每周35小时。1949年6月,澳共领导煤矿工人进行大罢工,罢工持续了一个半月。后来在工党政府的镇压下,罢工失败了。“1949年矿工的失败不是因为工会的政策或失误,而是因为工党右翼高层领导反对工人阶级的态度。”^③1954年和1956年澳共又领导码头工人进行了两次罢工。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澳共发生了两次分裂,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中苏论战开始后,澳共党内分成支持苏联的一派和支持毛泽东的一派。其中,支持毛泽东的一派于1963年分裂出来建立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其领导人为希尔。1971年,一些党员由于反对澳共领导层的政策,分裂出来建立了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党(the Socialist

Party of Australia), 其领导人为米德叶顿。

到20世纪70年代末, 受到重创的澳共母党已失去对工人阶级的信心, 认为学生和学者已经代替工人阶级成为社会的革命部分, 因此, 其领导人撤销了许多工厂的党组织。他们放弃了马克思主义, 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 革命政党已不符合时代特征。这些观点最终导致该党于1990年底解散。

从澳共母党中分裂出来的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党一开始便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 在工会运动中实施统一战线政策。它的成员在许多工会组织和澳大利亚工会联合理事会中起着领导作用, 特别是在码头工人、船员、火车司机和建筑业工会中有很大的影响。

1996年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党在其八大上决定把党更名为澳大利亚共产党。这次更名是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党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的重申, 受到多数工会成员的欢迎。目前, 澳共正在重建其在工会运动中的影响。澳共的报纸《卫报》十分关注工会问题并支持工人的斗争, 因而它在工人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受到工会的多次赞扬。

二、澳共的政策主张

澳共是一个由激进分子组成的党, 他们来自工会、和平组织、环保组织、团结组织, 或进行其他政治运动以及在共产党的名义下从事活动的组织。澳共成员致力于消除失业、贫困、不公正、无家可归、种族主义和战争。澳共认为, 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追求利润的私人公司支配着社会, 要解决澳大利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必须改变澳大利亚的政治方向, 最终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

澳共的政策主张如下。

1. 关于社会主义的看法。在社会主义社会, 公有和公共控制的企业将成为经济的主要所有权形式。然而这并不排除一些私有制企业的长期存在。工业必须高效率, 必须收支平衡, 然而生产增加的利益必须由做这些工作的人所享有。

这意味着限制赚取私有利润。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社会兴衰交替的顽疾, 在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实行经济计划。经济计划能够充分利用国家资源和工人的技术, 保护人民的全面需要。

社会主义政府将是一个民主政府, 由工人、科学家、技术专家、知识分子、农民和小商人的代表组成。对当选的代表有撤职的权利, 不胜任工作者将被代替。社会主义政府将坚持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坚定地支持国际裁军。侵略和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将被友谊、不干涉和尊重所代替。社会主义政府的一大任务是向人们灌输尊重和保护环境的意识及生活方式。保护环境需要科学知识、持久警惕、公共意识、民主参与和责任心。

2. 吸取苏联东欧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第一次出现的社会主义社会, 它们消灭了大量失业, 为所有人提供了发达的全面的社会保障、教育和健康设施; 以极低的租金来提供现代住房; 文化得到了发展, 且所有人都可共享; 妇女和男人同工同酬, 拥有同样的机会; 为年轻人提供了教育、体育和文化设施;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慷慨的援助。

同时, 它们必然面临许多困难, 也犯了不少错误。尤其是社会主义民主没有得到充分贯彻, 社会生活和经济停滞不前。然而我们并不能由此而得出社会主义已失败的结论。共产党已经从中总结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历史是人民为了更好的生活、自由、安全和独立而不断斗争的过程。我们坚信这些伟大的目标只有在基于社会主义原则、免除大私有企业剥削的社会中才能够实现。

3. 在经济方面的政策主张。澳共主张立即结束私有化浪潮, 因为私有化浪潮已使成千上万的人丧失了工作, 并使澳大利亚的经济越来越受国外跨国公司的控制。价格、利润率和利率应由联邦政府管制。企业税率已降到36%, 然而一些大企业支付的税率竟达不到10%。必须提高大企业的税率, 对流往海外的利润应课以重税。外资企业应受政府控制, 确保本国占51%的所

有权。国际贸易应达成互惠的协议，而不应该恶性竞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实行的是跨国公司的政策，掠夺了许多国家。它们并不站在人民这一边。应由联邦政府负责经销小麦、羊毛、肉、煤、铁矿石、黄金及其他主要资源，建立国家销售局来管理所有主要的商品。鼓励兴建包括生产、销售、加工和购买农业设备的合作社，以帮助改善小农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打破银行和大垄断资本在农村的支配地位，确保农民有较好的生活条件。

4. 关于失业问题的对策。失业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问题。失业导致成千上万家庭的贫困和沮丧。失业及许多工人生活水平的下降意味着人们的购买力下降，而需求的下降将导致更多的失业。为此应该增加工作岗位，其措施应包括：扩大公共领域，增加政府在制造业、建设工程、学校（尤其是大学）、公共住宅、医院、公共交通、环境和生态方案等方面的投资；根据澳大利亚工会联合会的建议，全国将最低工资或基本工资增加到每周380美元（10美元/小时），这将有助于150万低工资工人和临时工，增加工人的购买力，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增加养老金、失业津贴和助学金，使其不少于男工平均周工资的35%；减少标准工作周至35小时而不降低工资，限制加班，这将增加成千上万的工作岗位；停止降低关税，关税的降低已破坏了成千上万的工作岗位，且有威胁加剧趋势。

5. 转变党的战略。澳共目前不仅依靠工人阶级，而且主张发动并团结所有致力于争取澳大利亚政治新方向的组织和个人，以便兴起一场运动，挑战国内经济政治力量的真正控制者——大企业。澳共认为，这就是改变澳大利亚政治方向的方法。

澳共认为，现在由自由党国家党联盟(the Liberal-National Party Coalition)和澳大利亚工党(the Australian Labor Party)轮流上台执政的两党制度并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如今在各种议会中出现了替代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它们认识到为澳大利亚平民百姓的权利和利益而斗争、反对经济理性主义(economic rationalist,

指以个体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前提的经济学。——编者注)政策的重要性，这表明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但今天，在澳大利亚还没有一个政党获得了足够的支持，以在联邦、州或地方形成一个替代政府，没有一个政党或团体能够代表所有进步的、民主的观点。因此，联合其他政治力量和采取各种形式的合作极为重要。为了打破两党制，澳共必须增加进步“人民议员”的数量，争取通过建立一个左翼和进步人士的联盟来获得政权。

三、澳共对澳主要政党的态度

1. 对澳大利亚工党的态度

澳大利亚工党在纸上保留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然而仅此而已。工党既不宣传社会主义观点，也不通过阶级分析来制定政策。工党的一些成员是真正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目标的，但是该党的意识形态、主要的政策和结构阻止了这些目标的实现。

澳大利亚工党100多年的历史（其间曾组成几届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并曾连任许多年）显示，工党接受资本主义的长久存在，是比保守党派更优秀的资本主义的管理者。在过去经济增长时期，工党支持改善工人的生活水平。在经济低迷时期，它同样能够攻击工人的生活条件和权利。

包括澳大利亚工党在内的社会民主党最近几年已经大大地右转了。其早期的许多政策现在正被抛弃。社会民主党政府实行经济理性主义政策，解除了国家对经济的管制，攻击工人阶级的条件和权利，把公共企业私有化，采取的政策与保守党的政策十分相似。它们帮助跨国公司增长，帮助跨国公司支配所有重要的经济领域。这些政策对未来人类的生存环境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社会民主党并不能领导工人阶级与经济理性主义政策进行有组织的、坚决的斗争。

2. 对自由党国家党联盟的态度

自由党国家党联盟代表着大资本、大地主

和农业企业（它们只占社会的10%左右）的利益。它完全支持经济理性主义政策，并不遗余力地去实施这种政策。

在野时，自由党和国家党联盟运用聪明而伪善的宣传策略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人民的党，甚至声称它代表着工人的利益。一些工人还成为其成员。然而，这个党在本质上是反对工人阶级、反对工会的，它把工人阶级当作大企业的附属品，认为自己是社会自然的、天生的领导者。

自由党和国家党联盟要求全面私有化，消除对私有企业的管制，降低企业的税率，实行用户交税原则，驱逐工会，重建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主仆关系等。它们掠夺环境，把短期的利润置于人类生存和生态保护的长期利益之上。在文化方面，它们极为保守，支持十分平庸、空洞的观点。

总体上说，自由党和国家党联盟支持君主政体，反对澳大利亚成为共和国，反对进步的变革，把进步变革当作对它们的权力和阶级利益的威胁。自由党和国家党联盟是进步的、革命的工人运动的敌人。如果工人阶级和其他反垄断阶层要有所作为，要实行进步的社会政策、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就必须揭露它、击败它。

3. 对澳大利亚民主党 (The Australian Democrats) 的态度

澳大利亚民主党建于1977年，是从保守派所支配的自由党中分裂出来的。该党自认为处于大企业和大联盟之间，声称澳大利亚经济的未来要靠小企业和农民在没有政府管制和官僚文章妨碍的情况下艰苦地工作。澳大利亚民主党要实现一个“更加公正的”、经济独立的资本主义，反对跨国公司入侵澳大利亚的经济。

该党没有对社会进行阶级分析，但在广泛的领域提出了许多进步的政策，包括经济、环境、社会安全、外交和对外贸易、妇女、健康、土著居民、民族事务、农业和农村事务等领域，有时还在工业关系领域起着积极的作用。它反对完全解除管制，反对外资对澳大利亚的控制，支持对工资和生产成分的调整。

澳大利亚民主党对公共部门并没有意识形态的承诺，但它反对在对澳大利亚没有纯粹经

济利益保证的情况下出售公共和私有资产。它反对在公有企业提供关键服务的领域实行私有化，反对联邦银行、澳洲航空公司 (QANTAS) 和澳大利亚电信集团 (Telstra) 的私有化。

澳大利亚民主党在参议院和一些州议院的的上院有一些代表，总体上它起着进步的作用。澳共把澳大利亚民主党当作一个采取一些进步政策的政治组织。这些政策的实施将大大有利于澳大利亚的政治方向朝着左翼和进步的方向改变。

4. 对绿党 (The Greens) 的态度

人们对环境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已经发生的许多斗争为绿党(WA)和澳大利亚绿党的建立提供了基础。绿党既倾向于采取行动，同时又参与议会。绿党的每一个国家或地方组织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它们在生态的可持续性、社会公平和经济公平、基层民主、和平、裁军和非暴力等方面是统一的。绿党在参议院、一些州议会和市政厅都有代表。

绿党致力于改变社会，在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上有许多进步的政策。例如，绿党在反对私有化的斗争中，在《工作场所关系法》、东帝汶事件和土著居民的土地权利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政策的实施能够为澳大利亚政治带来新的方向，使普通人的利益得到优先考虑。

绿党在决策时缺乏阶级分析，这有时会导致错误。例如，对加铅汽油增加税收被作为环保措施而受到一些绿党成员的欢迎，它们没有看到这是一个增加财政的措施，主要损害的是工人阶级。然而，绿党团体发动的许多运动也挑战了大企业的权利和特权。■

注 释

① Warren Smith, *A brief history of Australian Unionism and the ro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2000.

② Ibid.

③ L. L. Sharkey, *The Trade Unions*, 1959, p.49.

[杨成果：南阳师范学院德育教研室；
刘春元：南阳师范学院政治与社会管理系]

(责任编辑 佳怡)

巴西的参与式预算与直接民主

——评《阿雷格里港替代：直接民主在实践中》

张梅 编写

2004年普卢托出版社(Pluto Press)出版了伊恩·布鲁斯(Iain Bruce)等人所著的《阿雷格里港替代：直接民主在实践中》(*The Porto Alegre Alternative: Direct Democracy in Action*)一书。英刊《国际观点》杂志2005年2月号刊登了亚历克斯·考珀关于该书的题为《巴西的直接民主》的书评,肯定了巴西阿雷格里港“参与式预算”的积极意义,认为它有利于制约腐败、培养人民的民主意识并最终有利于社会主义。书评主要内容如下。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晚期,在大约15年左右的时间里,巴西南部城市阿雷格里港进行了一项激进的试验:成千上万的市民参与预算决策过程,以改进他们的生活条件。这个直接民主试验被称为“参与式预算”。

该书的开始部分,是对几个基层积极分子的访谈,他们是伊恩·布鲁斯、劳尔·庞特(Raul Pont,前阿雷格里港市长)、乔·迈克多(Joao Machado)和其他巴西的左翼领军人物;书中还集中收录了他们起草的文章和广播稿。实际上,这个实践的成功,是世界社会论坛选择阿雷格里港作为主办场所的原因,同时此地也成为反全球化运动的一个灯塔。

总之,本书为我们描述了一幅参与式预算如何运作的最佳图画。每一年在几个月中,人们在就近的街区集中,讨论决定下一年度市政预算

的优先安排,通过一系列的群众大会(在2000年以前涉及约3万人),他们的决定被一步步精炼并综合协调。这个程序后来推广到整个南里奥格兰德州,2002年的参与人数达到30余万。

参与式预算是一种民主遮羞布吗?群众的赞同意见是不是成了一种对政府落后的表现的挡箭牌?参与式预算的讨论对市民而言,是不是限制而非拓宽了他们的视野?实际上在有些城市,参与式预算受左翼力量的影响很小。

但是,正如一位名叫乔斯的活动分子所言:“除公共事务之外,(参与式预算)还讨论更重大的问题……它应该在巴西贯彻下去,我认为这是整个世界需要的一个模式。”在最好的情况下,参与式预算是一种类似保罗·弗雷勒(巴西著名教育家,主张一种对话式的追求人性自由解放的教育方法。——编者注)解放教育方法的实践。

在一个第三世界国家里,直接民主实践仅限于很低的市政层面的讨论上,又能给人民生活带来多少实质改变的可能呢?因为,与大多数第三世界地区不同,巴西南部地区是这个国家最发达的地区,有相对高的税收基础。阿雷格里港参与式预算执行的最初十年里,地方税收增长了196%。

借助于对预算的大众参与性审查,该市已经形成对腐败更有效的制约,节约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其他项目上。其结果是,当地拥有巴

西最好的公共交通服务，99.5%的人能享用高质量的饮用淡水，对占领荒地行为实行最宽大的规定，等等。

伊恩恰当地指出了参与式预算对巴西民主社会主义党（第四国际巴西分部）的重要价值。正如他们所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第四国际就已经详加论证，要在民众争取权利的斗争中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中，把满足民众的民主诉求作为一个长期的动员经验。

这些思想对当今社会运动乃至革命的意义从未如此巨大。在没有公开的辩论和讨论，

从而赢得大多数人赞同的情况下，革命无从谈起。革命无捷径可行。

民主社会主义党认为，像巴西这样的不发达国家，对民主的追求，已不可避免地成为革命的动力，它在逻辑上将导致与现存体系决裂。■

[张梅：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基础部]

(责任编辑 刘元琪)

(上接第36页)一种普遍的理论基点，而且他甚至也没有为批判理论家提供一种理解早期社会的视角。马克思主义在早期社会系统之上建构他的生产方式观念，是不合理的。在这一指责中，鲍德里亚已经使自己置身于理论薄冰之上。

他想要说的是，恰恰由于其分析模型，马克思主义忽视了早期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社会之间的根本性差异。这一生产模式看不到原始社会中交换的象征性，它把那—社会纳入到它自身的相同性之中，仅在返回到它的相对差异性中、在返回到它的欠发达的生产方式中建构了一个视角。但是宣称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不恰当性是由于它的概念的分析本质，宣称在目前的基点上，无论怎样批判，都无法提供一个基础以阐明过去的结构，这招致了纯粹相对主义的危险。鲍德里亚表现出的这一困难在于，如何使激进的非连续性可以被理解。他试图主张在原始社会和政治经济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断裂，但历史的、分析的模型仅使连续性和相对差异得以认知。

对于他自己而言，鲍德里亚在最简明的概括中展示了社会系统的历史，从象征性交换的前工业社会到政治经济学，然后到第三阶段，即政治经济学的充分发展达到了对象征主义的

完全否定，第四阶段意味着我们向象征主义的回归。这一历史被非连续性所标示，本身隐含了对意义系统的分析，但鲍德里亚没有把这些要素加以理论化。换句话说，他对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批判的非完整性和含混性返回到并出现在他自己的立场上。他的批判方向被很好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的目的论和完全的连续性模型敞开了被攻击的大门，但是鲍德里亚没有向我们展示通向非连续性模型之路，既避免终结所有目前的历史，又包括尽管破碎但是某种的总体化，它能够提供一种阐明当前实践的批评基点。

总之，鲍德里亚关于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假设为激进的理论指出了—个前景看好的方向。它把符号学和日常生活概念结合起来，显然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选择。■

注 释

① Jean Baudrillard, *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trans Mark Poster, St. Louis: Telos Press, 1975.

[戴阿宝：中国艺术研究院]

(责任编辑 飞 扬)

企业社会责任的非激进化

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已经给予了跨国企业能匹配、有时甚至超过国家政府所具有的权力。而跨国企业不断增长的权力促成了许多新的政治行为的产生,这些行为围绕着跨国企业对受其影响的大众没有充分承担起责任而展开。至少,它们被认为在保证公正地分配社会产品方面以及修正对社会危害与风险的不平等分配方面承担的责任太少,与其自身的规模不成比例。这导致大众的强烈不满。而企业社会责任(CSR)就是大众的压力与企业对此压力作出的反应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行动领域(field of action)。

该领域的一端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将“责任”与一整套不断增强的道德义务与法律责任联系在一起。这些人力图赋予企业社会责任以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性的法则,将其视为一套在国家以及跨国水平上运作的关于企业管理的管制结构。该领域的另一端则是企业与其他相关人员,他们倾向于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与自愿和利他精神联系起来,最好坚持企业自我管理的结构。为此,企业设计了许多战略来阻止人们使用法律手段以使企业承担更大的责任。而在建构“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过程中,由企业资助或指导的非政府组织发挥了较大作用。通过一系列的社会事件、研讨会与公共活动,这些组织以有利于企业和雇主的方式形成了像“社会责任”与“社会变化”这样的观念。▲

(美刊《批判社会学》2004年第3卷洛南·沙米尔文,陈晓摘译)

治理失败的国家与世界 体系中的积累关系

在对治理失败的国家进行研究时,人们大多倾向于依据该国的自身情况作出解释,而很少根据世界体系中的各种力量(这些力量往往增加了这些国家治理失败的几率)来进行解释。在这后一种思路

框架中,为什么有些国家会治理失败以及有些人口持续贫困这一问题是与有些国家能维持其强大以及其人口的富裕紧密联系在一起。贫穷的、治理失败的和富裕的、运行良好的国家都处于同一个“体系”中,因而体系的各种影响将有助于解释上述这一结果。

美国只占了世界人口的4%,却积累了世界收入的1/3。另一方面,超过一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其经济增长严重受制于有限的出口收入的国家。在这些国家,越来越多的国内资源必须用来获取一定数量的进口商品,如生产资料。这就缩减了这些资源的国内用途,包括用来减少贫困和资助行政服务的措施。这样的国家机构很可能会变得越来越腐败。当然,“国内”原因可能与之有关,但主要的原因是世界体系的特征(如跨国公司的选址、南北贸易协议、技术垄断等)与这些国家的人口特点(如人口的快速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贸易与价格的快速自由化导致了治理失败公司的数量增加以及政府部门失业的增加,从而使公共收入减少并产生财政危机,恶化了有效率的市场所必需的公共服务,这又使各公司的情况更加恶化,因而进一步使政府丧失其合法性并增加其大部分人民的不满。这种恶性循环几乎被市场自由主义的获胜者所忽视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事实上不重要。▲

(英刊《国家政治科学评论》2005年1月号罗伯特·亨特·韦德文,陈晓摘译)

如何认识发展中国家的 非政府组织(NGO)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NGO在发展中国家大量兴起,其原因包括:新自由主义开始攻击由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于是利用NGO为社会提供比原来廉价得多而又不可或缺的社会服务;左翼以阶级为基础的运动破碎化了;左翼政党和工会不能清楚地认识并回应社会面临的日益多样化的新问题。此外,更根本的原因是,20世纪70、80年代左翼世界性的失败以及随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的失败,使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充

巴西：新自由主义发展路径与新依附经济

[美] 玛·罗哈 著 周通 摘译

2002年10月，巴西左翼劳工党领袖卢拉当选总统，取代了自1994年以来任总统的卡多佐。此事受到世界各国普遍重视，被认为是拉美第一大国——巴西人民渴望变革的结果。英国《新左翼评论》2002年7—8月号刊载了盖萨·玛丽亚·罗哈题为《巴西的新依赖经济》的文章，认为卡多佐当政8年来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巴西经济重新陷入依附状态，因此虽然开始几年较顺利，但终于陷入困境。该文主要内容摘译如下。

卡多佐上台前的情况

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巴西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对内实行强硬镇压政策，同时以高关税壁垒为屏障，遵循30年代起就开始的进口替代发展路线，工业化进展甚快。60年代中期以后，巴西的发展模式在若干重要方面不同于传统的进口替代路线。当时，欧洲美元市场的兴起为许多国家的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前所未有的机会：巴西军政权首次有可能走上一条通过向世界资本市场大量举债而求得发展的道路，即它可以向“核心地区”（指西方发达国家。——译者注）的银行贷款，而不用像过去那样从政府或半官方机构那里贷款了。1974—1979年间，盖塞尔政府虽身处世界性经济衰退之中，仍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

的发展重工业的国家计划，该计划公开宣称的目标是要在70年代末使巴西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1980年以后，国际实际利率达到了创纪录的高度。这直接摧毁了大部分“边缘地区”国家（指发展中国家，下同。——译者注），同时也使这种以举债求发展的模式不得不突然终结。来自社会各方的压力很快使业已削弱的军人政权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从而在1985年迎来了“新共和政体”。在此后的10年间，劳工运动开始成长，政府方面则由保守的文人当政。萨尔内和科勒尔两位弱势总统曾企图恢复发展，前者采取了一些小步的社会再分配措施，后者则采纳了初步的新自由主义方案——主要是贸易自由化和解除管制，这是根据布雷迪计划（Brady Plan，由美国前财政部长布雷迪于1989年3月提出，将缓解第三世界债务问题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提出的结构调整政策相挂钩。——编者注）作为重组该国外债的一项条件而强加于巴西的。但两人都未能制止日益加速的通货膨胀。当科勒尔受到弹劾而由副总统伊·佛朗哥接任时，物价已如脱缰的野马急剧上升，1994年通胀率高达2000%。

卡多佐上台推行新自由主义路线： 以依赖外资为主求发展

1993年5月卡多佐由佛朗哥任命为财政部长。他集合一帮名牌大学出身的技术官

僚设计了一项稳定计划,被称为“里亚尔计划”(里亚尔是1994年7月起在巴西开始流通的新货币名。——译者注)。这不仅仅是一项稳定计划,它还有更大的雄心。从一开始,该计划的中心设想就是:通过大力削减通胀,创造一种具有吸引力的环境,吸引跨国公司来巴西投资,而只有外资的大量流入才能为国内的长期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健全基础。这帮技术官僚们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对该国能起到多方面的作用:有助于解决国际收支赤字问题,有助于使工业结构现代化,有助于发展先进技术,有助于提高生产率以及巴西出口货物的国际竞争力。事实上,稳定计划的中心部分就是借助于外资使巴西经济现代化。为此,卡多佐建议取消对外国公司开发巴西自然资源的壁垒,允许跨国公司参与该国基础设施领域具有战略意义的国企的私有化。

但是,只有当稳定战略恢复了国外投资者的信心时,卡多佐一帮人所企盼的长期外国投资才会真正流进来。可是,巴西当局鼓励短期投机资本流入巴西,方法是使资本帐户空前自由化,以及大大提高利率使其高出世界其余各地很多,目的是迅速增加巴西的外汇储备以巩固稳定货币的成就。1994年7月,新货币里亚尔开始流通,其汇率被固定为以一比一和美元挂钩。这时,巴西已拥有403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70%均是卡多佐任财长后积攒的。这说明:从一开始他就盼望着外资会源源不断流入来帮他稳定经济。两年后他对人说:“我们现在的情况是马克思或韦伯或任何其他人都想象不到的:资本已迅速国际化,它多到已唾手可得。某些国家可以利用这一剩余资本,巴西正是其中之一。”外资成了卡多佐战略的中心,而这一战略又是以对本国货币汇率的过高估价以及进口自由化为基础的。有些人批评这一战略,警告说,这会使巴西经济越来越容易遭受国际震荡的伤害。卡多佐及其顾问们对这

些意见都嗤之以鼻。

从表面看,卡多佐的北方的天上可以掉下馅饼的想法业已得到了验证。1996年外资净流入额达到342亿美元,而1994年仅为143亿美元。其中,变化无常的证券投资资金占相当大的一部分。1995年国会修改宪法,消除了种种妨碍外资在巴西运作的障碍,于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开始大量涌入。外国直接投资净额在1995—2000年间每年分别为:39亿、96亿、178亿、263亿、299亿和305亿美元。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材料,巴西1995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为425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1999年升至1977亿美元,占21.6%。此外,在整个里亚尔计划期间,巴西也依赖短期投机资金的流入,其净总额均为230亿美元。为了吸引这种“热钱”,巴西当局给投资者提供的不仅有世界上最高的利率,而且还允许外资在任何时候流出巴西,为此给投资者提供了对其极为有利的免税机制——可在银行开设非本国居民帐户,可以自由利用浮动汇率。引诱投资者的还有这样的保障机制:政府长期国库券和外汇挂钩,以保障投资者离开时能保值。

依靠大量的外资,“里亚尔计划”的设计师们得以控制了物价。1994年6月时,月通胀率为50%,到7月末就降至6%。依靠这一成就,卡多佐在该年10月的总统选举中轻易获胜——第一轮投票就赢得了54%的选票。此后,年通胀率持续下跌:1995年为23.29%,1996年为10.03%、1997年为4.82%、1998年为1.79%。贸易自由化在控制物价中也起了辅助作用。1990到1994年间平均关税水平从32.2%降至14.2%。

其结果是,巴西的进口急剧增长,仅在推行“里亚尔计划”的头半年,进口就上升了52.7%。这种进口繁荣还受到本国货币汇率被高估的有力推动,因为汇率越高估,进口就越便宜。即使在政府政策的支持者中,

也有人从一开始就看出，这一做法简直就是“玩命”。

一直到1995年3月，卡多佐的恢复经济战略仍看起来好像是创造了奇迹。国内生产总值1994年第三季度增长了3.4%，第四季度增长3.5%，1995年第一季度增长2.8%。巴西本国资本也得到突然增加900多万“新”消费者的好处，因为稳定货币的初步成就使得绝对贫困人口显著下降，平均实际工资大大上升，对于处于社会金字塔底层的人尤为如此。官方数字是，巴西的绝对贫困人口从占总人口的41.7%（5940万人）降至33.9%（5020万人）。

巴西经济一再受到国际 金融震荡的严重冲击

作为总统，卡多佐显然是要使巴西经济尽可能依赖核心地区的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他这样做，招来了一大堆矛盾。首先，巴西的外贸赤字无情地上升。90年代早期，巴西还拥有每年100—150亿美元的外贸盈余，此后变成了大量赤字，到1997年赤字达到约83亿美元。这是“里亚尔计划”的一个直接后果。因为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固然在短期内有助于制止通胀，但从长期讲它招来的是灾难，因为它削弱了边缘地区本已薄弱的环节——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一旦汇率被迫上调（挂钩制迟早会导致这一点），进口货会自动变得更具竞争力，而出口货则相反。1995年，美国调高美元汇率时，“里亚尔”不得不跟进。结果是毁了巴西的外贸平衡。90年代早期当美元和“克鲁赛罗”（巴西旧货币名。——译者注）都处于低位时，巴西出口增加了50%，而从1995年到1999年，出口几乎毫无增长。

一方面是外贸赤字扩大，一方面又需要增加外汇储备以保护过高估价的本国货币免受投机性袭击，这就需要外资的大量流入来

支撑。而后者反过来又造成经常项目帐户赤字的急剧上升，这中间当然包括利息的支付和利润、红利被汇往国外。1994年巴西的经常项目赤字为17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3%），到1998年已达334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显然，越是需要更多的外资流入来解决“里亚尔计划”所造成的赤字，赤字也变得越大。这样恶性循环的结果是巴西的外债越滚越大。1994年，它的外债为1482亿美元，1998年则为2416亿美元，即在卡多佐首次任期内外债增加了1000亿美元。如果再加上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今天，巴西的对外欠债已达4000亿美元！这样一种极端依赖外资的状况必然使巴西经济极易遭受国际震荡的伤害。

结果是发生了一系列越来越恶化的国内危机，它们的发生都遵循着同一个轨迹：外资逃离巴西，巴西被迫接受极高的利率以及更严厉的财政紧缩措施以便吸引外资再回来；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崩溃从而导致衰退；失业上升，贫困加剧，收入分配恶化。

1994—1995年间美国联邦储备局调高利率一倍，引发了世界债券市场崩盘和墨西哥比索崩溃；1997年初美国再次提高利率引发恐慌。此后泰国、东亚发生金融危机；1998年8月俄国无力还债及华尔街大跌盘。这些都一次又一次地对巴西经济形成严重冲击。每次，或是由于巴西当局采取调高国内利率（如1995年上半年将利率从42.4%调至64.8%的天价），或是由于美国转而降低利率，再或是美国出面救援（如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给巴西415亿美元的拨款以避免“里亚尔”崩溃），才使危机暂时得以缓解。

但清算的时刻还是来了。1999年1月中旬，金融市场对“里亚尔”发生了一次猛烈的投机性袭击，每天都有几十亿美元外逃，这迫使巴西政府不得不放弃保护“里亚尔”的政策，允许它在世界市场上浮动。作为

“里亚尔计划”基石的固定汇率制就这样被冲垮了。1月15日采用浮动汇率后，“里亚尔”对美元一下跌了40%。卡多佐经济战略的前提就这样毁了。

2000年夏华尔街陷入衰退，从而结束了美国90年代的繁荣，开始了一个迄今尚未结束的衰退期。“9·11”事件后情况更糟。这些都不能不对包括巴西在内许多国家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巴西经济恶化的后果之一是国内公共债务持续上升，从1994年的1920亿里亚尔(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1%)升至今年5月的7085亿里亚尔(占56%)。

卡多佐政府的另一重点： 削减公共开支、增税、国企私有化

卡多佐信守“华盛顿共识”中的首诫：财政上需要拥有占国内生产总值几个百分点的“基本盈余”。为此，“里亚尔计划”从一开始便以以下承诺为基础：削减公共开支、增加税收、对具有战略意义的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

在减少公共开支方面，巴西改革公共服务机构和退休金制度，以减少福利。

税收额从1995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增至2001年的34%。这在拉美是最高的税率。增税包括增加直接税，它打击了工人阶级和中等阶层；也包括增加间接税，它对巴西产品在国内外竞争力都影响很大。对商品及服务增加间接税实属倒行逆施：月收入在相当两份最低工资收入以下的家庭要为间接税付出收入的26.48%，而收入在相当30份最低工资收入以上的家庭为此只付出7.34%的收入。

1996年起，外国直接投资开始大量进入巴西。吸引它们的主要是巴西国企的私有化以及对巴西私企的合并、兼并。1996年到2002年4月，309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用

于收购私有化的原国营电力、邮电、煤气、金融等部门。如果把巴西方面出资的交易再加上说的话，这一数额还会更高，因为巴西国家银行为外资收购私有化的国企的很多交易以极低利率贷款。1995年到1998年间，巴西国企私有化售出总值的42.1%由外资购得。如果再加上巴西股东后来又把股份出售给了外方，这一数额还会更多。例如，巴西国营电话公司，原来外资购得66.7%的股份，但后来巴西两家公司又将他们的股份卖给了意大利邮电公司。

推动外资对巴西私企的合并、兼并，是卡多佐重组巴西经济的另一重点。1995年到1999年间，共有1233件合并、兼并，跨国公司均在其中或获得了控股权或参了股。一项调查表明，这一期间巴西70%的企业兼并由跨国公司干的，因收购而流入的直接投资达500亿美元。迅速的进口自由化和天价般的高利率，是使外国资本得以轻易排挤、取代巴西本国资本的两大因素。大量巴西公司，包括一些重要工业集团被迫关门、出售或加盟于跨国公司。外资兼并发生最多的部门有：汽车部件、银行、钢铁、食品、饮料、奶制品、电子、化学品等等。

与此同时，一小批巴西工业、金融界精英，在私有化过程中和外资联手，也获得了垄断地位。最突出的例子是：巴西最大的私人企业“施泰因布鲁赫”和外国资本合伙，并在美国国民银行的支持下购得了大为赢利的巨型国营矿业公司“凡莱·道·里约·道塞”的太多数股票。此外，石油化工业中的奥德布列赫特和玛里亚尼家族、钢铁业的维佛哈家族、金融业的布拉德斯科、伊塔马和鲍赞诺家族等，也都是在私有化过程获利极丰的国际化了的新型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过这些人也只不过是少数例外。外资取代巴西本国资本而不是和后者联手，才是“里亚尔计划”的特征。

卡多佐政策的经济、社会恶果

非国有化在多大程度上使巴西经济现代化了呢?下面是回答。解除管制、私有化以及汹涌的企业合并、兼并浪潮的结果是:巴西本国的研究开发机构被弃置,而被代之以从跨国公司进口技术。资本货物进口额由1994年的75亿美元升至2001年的148亿美元,同期半成品的进口额从156亿美元升至273亿美元。1998年巴西邮电总局私有化后,为更新巴西陈旧的电话系统,跨国公司所需部件的97%来自进口,巴西政府为讨好新主人,放弃了它原来要求的至少采用35%本地产品的主张。一位经济学家指出:“90年代,发达国家以信息技术为特征的消费模式在巴西也推广开来了,然而巴西在生产上却出现了无可否认的倒退。”有一项研究报告指出,1994—1997年间,巴西本地资本货物产值下降10个百分点以上。换言之,伴随非国有化的是一定程度的真正非工业化。

这一期间,巴西的出口仍集中在传统产品——农产品、农产加工品、矿产品上。巴西未能增加它在世界制造业产品出口中的份额。

在卡多佐任内,尽管外资大量流入,巴西的固定资产投资率仍低得可怜,比灾难性的80年代还要低,那时它平均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2.1%,而1999年(这年外国直接投资额最高达300亿美元)仅为18.9%。这并非偶然。为吸引外资,巴西维持极高利率,这从一开始就压抑了国内投资。在跨国公司领导下进行的巴西经济现代化,既没有促进巴西资本积累率的提高,也没有促进巴西的国际竞争力。

1957—1961年间,巴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6.1%,1968—1973年间,年均增长率为8.4%;而1995—2001年间,即卡多佐的新自由主义实验期内,国内生产

总值年均仅增长2.4%。

1997年巴西人均收入为4940美元,而2001年跌至2920美元,即倒退到了80年代的水平。这一期间,巴西国内生产总值从8070亿美元降至5030亿美元,从而使它失去了世界第八大经济体的地位。

按照巴西官方数字,巴西失业率从1995年的4.6%升至2000年3月的9%,在巴西的工业心脏地带——圣保罗地区,公开失业率从1995年的13.2%升至2002年5月的20.4%。这是在极高利率和横扫一切的贸易自由化双重压力下中、小企业大量倒闭的直接后果。随着失业的增长,巴西城市的暴力案件数量也在上升。

1999年到2001年间平均实际工资下降了10%。政府研究人员估计,到1999年巴西绝对贫困人口增至总人口的34.1%,即约有5300万人,另有2260万人(占14.5%)为贫困人口。新自由主义模式在拉美到处都增加了不平等。巴西是世界上四个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其它三国是尼加拉瓜、南非和马拉维),1999年巴西最富有的10%人口拥有47.4%的国民收入,而最穷的40%人口仅拥有8.1%的国民收入。

巴西过去曾推行过由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现在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与之相比较,远远不如前者成功。■

[罗·多哈:美国罗特格斯大学教授拉美政治经济学;周通:中华全国总工会老干部处]

(责任编辑 刘元琪)

不破哲三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几点建议

曹天禄 夏建义

不破哲三是日本共产党的资深领导人、理论家。他在2003年出版的《马克思的“科学观”——21世纪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①一书中，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现将其主要观点介绍如下。

一

中国正在探寻“通过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的道路。日本正处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中期，日本共产党希望在日本阶段性地实现社会主义，其过程将是通过“市场经济”或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来建立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的新发展，同时也是科学社会主义面临的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目前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并由此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据专家预测，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的年平均增长率可能保持在6%—7%。在2020年到2025年间，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经济将很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如果这一预测成为现实，那么亚洲的状况以及与中国保持密切关系的其他国家将会发生极大的改变。但是，由于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所以即使中国经济赶上了日本，按人均国民收入来计算，也只是日本的1/10。然而当中国经济真正赶上或超过日本时，中国在亚洲和世界

上的地位将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1978年，中国共产党认为自己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要完成这一过程需要10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则需要50年的时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于1992年采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中国和日本都在通过市场经济手段来发展经济，但是，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许多人认为，中国是在以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

我认为他们的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即认为市场经济只属于资本主义，但中国的实践确实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只有认真地研究，才能摆脱目前对此认识的混乱和误解，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二

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市场经济在很多方面是有效的，并指出市场经济为衡量劳动以及企业的其他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个手段。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未曾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过理论上的研究，而列宁是第一个迎接这一挑战的共产主义者。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列宁的目标是建立一套能够使国家有权控制生产以及将产品分配给国民的经济体系，这是一套以“一战”期间德国建立起来的“战时经济”为模式的经济体系。列宁在瑞士流放时听说了德国

的战时经济,并认为如果资本家为了他们的利益能够有计划地以国家的力量创办这种经济,那么就有充分理由相信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人民大众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也可以这样做,同时,这也是社会主义即将产生并成为现实的依据。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通常被认为是为了战胜国内的反革命暴乱和国外的武装干涉而不得不采用的政策。因为列宁坚持认为小生产者就是资本主义的温床,市场经济的引进意味着让资本主义再次蓬勃发展。于是,能够使生产者自由交易产品的市场经济成了建立社会主义的障碍。为此,列宁花了很大精力写了许多文章来宣布社会主义不允许市场经济的存在,并且认为对小生产者和市场经济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必然会引起资本主义的复辟,并要求对此提高警惕。

但是,当和平时期到来时,反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尤其是广大农民的反对声。于是,列宁在1921年决定放弃这一政策,实施具有市场经济性质的“新经济政策”。但最初这一政策还只是局限于农民用玉米交换工业产品和城市其他产品,因此与市场经济不是同义语。

新经济政策是革命胜利后为改善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而实施的。然而,起初许多俄国共产党员并不支持这一政策,甚至提出“在监狱里没有人教过我们做生意”^②，“共产党难道可以承认贸易自由,可以实行这种自由吗?”^③等看法,最终列宁还是说服了这些反对者。这样,列宁将他的政策从消极的接受市场经济发展到运用市场经济来推动社会主义前进。“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运用市场经济来建立和资本主义一样有竞争力的社会主义经济。列宁逝世前三年,其主要精力就是解决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问题。但他逝世后,斯大林摧毁了“新经济政策”道路,否则苏联的社会发展与今天的情况会有很大不同。无论如何,列宁新经济政策所预示的“通过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是不可忽视的。

一是这涉及社会主义结构的建立和发展,

这在与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中是不能丢失的。

二是市场经济在一定条件下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同时要求引进外国资本,这是一个重要发展。

三是新经济政策要求国家掌握社会主义主要经济力量,列宁明确指出:“一切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企业、铁路等等,都操在我们手里。”^④即要占据制高点。

四是新经济政策要求俄国学习先进的资本主义所能提供的一切,以便使社会主义重要的经济结构能够获得经济力量。

五是新经济政策强调未来合作社的农民组织不应由上级的命令或强迫来执行,而应基于农民的自愿来组织。

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是通过克服历史错误而确定的新的建国的努力方向。“新经济政策”为今天中国倡导的通过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提供了借鉴。中国的发展进程是基于与列宁决定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所持的思想相类似的基础之上的。列宁挑战市场经济的历史与中国在1949年之后所走的道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今天的中国正进入一个类似列宁提出来的“新经济政策”的阶段。

三

但是,由于历史的不同,列宁时代和今天的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途径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社会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在列宁时代,为了得到技术上的援助来促进苏联的发展,列宁欢迎外国资本主义参与苏联的建设,并为这些企业提供各种“特权”,目的就是要向外国资本主义学习经商之道,但真正到苏联去的外国企业并不多。相反,今天的中国正吸引着来自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国的大资本,但中国社会主义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即在向资本主义学习的同时,还要与它们展开竞争而且不能被它们所吞并,要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像资本主义一样的市场经济。

由于这是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所以我所关注的是中国怎样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不被资本主义所取代，它又应该怎样使社会主义的核心经济部分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用来与资本主义竞争。有什么证据证明我说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正确的呢？一方面是列宁的市场经济理论，另一方面是我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了解。尽管我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我知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好坏两方面，可能坏的方面比好的方面更多。从这个角度，我想对中国朋友讲一些有益的东西。

市场经济可以通过两种发展途径来使其发挥作用。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提供了资本主义发展之路；在其他条件下，它可能提供通向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列宁关于此问题提出了如下几个关键点。

1. 社会主义经济命脉在市场经济中需要像资本主义经济一样强壮有力，并且必须向资本主义学习。列宁指出，我们虽然在做买卖，但这离有本领做个文明商人还远得很。“现在是按亚洲方式做买卖，但是要能成为一个商人，就得按欧洲方式做买卖”，^⑤并“通过国营企业同资本主义企业的竞赛来进行检查”^⑥。即通过建立市场以及通过市场的检验来构建社会主义。

2. 在市场经济中，国家必须牢牢地“占据制高点”。为了不在市场经济中迷失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将工业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即“制高点”控制在社会主义手中，以便它能确定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向，但这种“占据制高点”的现象也是随着时间和条件的转移而改变的。

3. 必须保护社会和经济免受市场经济所产生的消极方面影响。市场经济本身是无序和竞争性的，并且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就是公司重组、失业、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拜金主义和各种腐败现象也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了，为了在市场经济中有一个良好的经济发展，必须建立一些机制来控制这些消极影响，其中包括提高和发展社会服

务。这些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也是相当受重视的，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提出限制工作日。

中国的市场经济刚刚被引进，正处于社会规章制度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道路上，因此建立这样的规章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市场没有能力来控制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贪婪和腐败等矛盾，这些矛盾必须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和其他社会保障措施来解决。社会主义公共组织必须牢牢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如果这些部门受到了腐蚀，那么官僚主义和独裁就会甚嚣尘上。为此，列宁反复强调人民大众的监督和检查以及公共组织内部自律的重要性。同时，列宁还强调有必要提高广大人民的文化水平且使每个人都履行其责任。我希望那些通过市场经济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国家也能在这个领域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4. 要求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战胜资本主义并不局限于类似生产速度和效率这样的经济指标等方面。列宁提出社会主义应该在各个领域都要体现出优越性，其口号“战胜资本主义”还涉及环境和污染等问题，明确要求社会主义工作地点的安全要和资本主义最好的地方一样有保证。

虽然各国建立社会主义可能会有不同的形式，但是我认为这个“通过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的一般途径将会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因此，中国面临的新挑战将具有全球意义。■

注 释

① 不破哲三：《マルクスの「科学の目」——21世紀の資本主義と社会主義》，发行シャンププレスサービス，2003年第1版。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35页。

③④⑤⑥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448、679、777、664页。

[曹天禄：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
夏建义：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责任编辑 佳 怡、王丽华)

德国工会和政治抉择

黄汝接 摘译

德国《社会主义》杂志2004年第6期刊登了一篇由萨尔布吕肯情报研究所所长海因茨·比尔鲍姆教授撰写的题为《工会和政治抉择》的文章，介绍了德国工会的状况、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矛盾，并重点指出由于社民党越来越不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德国工会日益与激进的社会运动合作，有成立一个新的左翼组织的趋势。其主要内容如下。

工会和社会运动的合作

2004年5月14日至16日在柏林召开的“前景大会”，主要是由德国五金工会和服务工会两个大工会以及ATTAC（全称是“争取开征托宾税援助公民行动协会”，1998年6月3日由法国《外交世界》月报发起。——编者注）共同举办的。围绕着“选择，另一项政策的前景”这个主题，人们在大量的报告和讨论中提出了各种替代性的政策方案。其内容涉及劳动市场、民主、金融市场、教育、艺术和媒体、战争与和平直至生态和社会政策等各个方面。有2000人参加了大会，这表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为应对占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需要有另一种政治抉择。

引人注目的是，德国工会和社会运动第一次如此紧密地走到一起并且共同讨论问题。这次大会除许多社会运动的代表外，还有大批左

翼工会工作者，这是较长时间以来首次出现的社会运动与工会之间的接近，而且工会是正式以组织名义参加的，德国五金工会和服务工会的主席尤尔根·彼得斯和法兰克·俾西尔斯克的参加可以说明这一点。

工会和社会运动之间的频繁合作在2004年4月3日反对削减社会福利的“欧洲行动日”已经显示出来。在柏林、斯图加特和科隆举行的有50万人参加的群众集会是一个巨大的、超出预料的成功。

除了分析经济和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围绕具体抉择的讨论，工会的中心要求是寻找社会运动和工会在政策上采取联合行动的共同点。虽然这种探索还在进行，但是有几个共同关心的问题已经明确，那就是双方都认识到政府关于2010年前社会福利改革的《2010规划》的严重社会后果，特别是在涉及社会福利方面的公正问题和最低工资、工时以及私有化和公共投资等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社会福利和分配的公正性问题。人们还达成以下共识，即这种讨论不仅应在一国范围内，而且应在欧洲和国际范围内进行。

工会和社民党的矛盾

“前景大会”明显反映出德国正在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反对派，这由社会运动和工会力量组成。

一个由工会牵头的反对削减社会福利的反对派正在形成中，这一发展是与工会同政党关系中出现的变化联系在一起，而社民党的政策对这种相互关系的变化起着关键作用。随着《2010规划》的出台，工会与社民党的关系再度恶化。尽管工会与社民党的联系仍然很紧密并且还没有达到分道扬镳的地步，但是彼此之间的传统分工已经结束了。按照传统的分工，工会的精力主要集中在企业政策和集体谈判政策上，而社民党则主要从政治上代表工会的要求。按照新自由主义的逻辑，通过《2010规划》削减社会福利是经济高涨的前提。它错误地认为，减轻企业的负担就可以促进经济高涨，而实际上低迷的内需才是经济景气的根本障碍。这次政策转变在社民党内引起了强烈抗议，许多党员特别是传统的工人党员退党，但这并没有促使社民党改弦更张。社民党左翼本来已经很弱，左翼在这场争议中进一步丧失了阵地。虽然党的主席施罗德换为明特费林，但是并没有导致政策的变化。毫无疑问，社民党并不仅仅是由于推行《2010规划》才背离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公正的基本价值观，并因此而疏远工会的。这只是一种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即以企业为中心逐渐代替以劳动为中心，从而导致私人企业的文化赢得统治地位。

这项必然导致社民党疏远工会的政策并没有实现其许诺的繁荣目标，不论是经济目标还是就业目标，相反的是为进一步削减社会福利和使经济与社会更多地接受市场的摆布创造了条件。保守势力从联邦政府的政策中汲取了动力，基督教民主党人和自由党人以及企业主联合会汇合起来，一起鼓吹进一步削减社会福利，取消集体谈判自主权，限制工会的活动，并进而执行一项比现行政策更有利于企业主和富人的税收政策。

工会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抗

在这种情况下对工会施加的压力不断增加。有人企图在各个领域夺走工会通过多年斗

争赢得的成果，这在缩短工时问题上特别明显。虽然五金工会在最近一次的集体谈判中击退了企业主延长工时的要求并且捍卫了每周35小时工作制，但是企业主并未放弃延长工时的要求。对工会的压力是与经济、社会和政治各方面出现的变化联系在一起，而这些变化则是由力图把所有领域都置于市场摆布之下的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资本家对劳资合作以及对以新伙伴关系方式来调解劳资冲突已越来越不感兴趣，而且还推行一项反对工会的政策。工会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争议越来越激烈。这一点在工会政策的核心领域——集体谈判政策和企业政策——中明显反映出来。围绕工时、收入、覆盖式集体合同和投资场所等问题的争议表明，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资本方面转移，工会只是被动地进行防卫性斗争。同时工会还暴露出自身的组织弱点，这一点在会员减少方面突出地表现出来。简言之：工会处于劣势。

尽管存在着各种弱点，工会仍然是社会的反对派，它们筑起了反对削减社会福利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日益广泛的阵线。但不容忽视的是，工会的态度是矛盾的。它们在《2010规划》问题上是在被动防守和主动反击之间来回摇摆。一部分人主张与政府和社民党对话，而另一部分人则寄希望于议会外的群众对抗力量。

由于社民党的变化而出现了政治真空，而社民党左翼因本身的弱点又无力来填补这个真空，于是工会被迫自己行动。保持和扩大工会的独立自主是必要的，独立自主既不意味着代替政党的位置，也不意味着脱离政治。工会的独立自主更多地意味着独立自主地执行工会自己的政策并以自己的政策构想参与社会大辩论。工会需要革新自己的政策，摆脱目前被动的守势地位。因此，工会制定自己的关于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构想比以往更显得必要。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框架内不可能实现工会在总体上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的目标。工会必须更加重视制定自己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这些政策不会为社会保障制造障碍，

而是为经济发展创造前提条件。其目标是由社会需要决定经济发展,在这种经济中,社会的需要、文化的发展、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所有必需品的供应都应成为生产、投资和就业的内容。在这些方面有许多相关的政策建议。应将它们综合起来使之在政策上发挥作用。这之所以是工会的一项任务,是因为它可以使工会在工会的核心领域——集体谈判和企业政策——中又回到进攻态势。目前在五金工会内部讨论的社会分配方案正涉及集体谈判政策和经济、财政政策之间的联系问题。

可能出现一个左翼组织

在这种背景下,不仅一些工会同社会运动的合作加强了,而且在工会中还出现了一种“倡议”行动,这种“倡议”不只是停留在开展社会抗议活动上,而且还在争取成为一种组织。正因为如此,巴伐利亚州的五金工会书记成立了“倡议——劳动与社会公正”运动。该运动把自己定位为对联邦政策的有组织的批判者,特别是对社民党的现行路线提出质疑。它指出,随着《2010规划》的出台,社民党与工会之间再也没有了共同基础。这些巴伐利亚的工会工作者——社民党的老党员——提出警告,如果不改革这条路线,他们就退出社民党。因此,这就出现了成立一个新的左翼政党的前景。虽然这只是一个规模有限的行动,社民党领导层却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以开除出党来威胁他们。同样来自工会阵营的还有“竞选政策的抉择——2006倡议”运动,它具有相似的政治倾向,其出发点也是强烈批判社民党。这两个进行合作的“倡议”运动,不仅共同批判社民党的路线,而且都提出了正在发展着的政治代表的问题。因为既不能指望社民党,也不能指望绿党会在维持目前的政治路线的情况下出台一项不具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政策。

不论是“竞选政策的抉择——2006倡议”运动还是“倡议——劳动与社会公正”运动,它们首先要争取的对象应是对“红绿联盟”深

感失望的选民,特别是那些不再与社民党交往,要么离开党,要么不再参加选举活动的人。这些心灰意冷脱离政治的人事实上是不少的。如果将其中可观的一部分人发动起来,那么选举的前景对一个这样的反对派来说是不坏的。但也不要过高估计这些“倡议”运动的影响力,它们的力量还很小,而且基本上局限于地区范围内,它们只是第一次尝试填补由于社民党的变化而出现的政治真空。

正在朝着组建一个新左翼政党方向发展的“倡议”运动的纲领深受工会及其政策的影响,例如强调社会公正,强调经济政策的目标是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其出发点首先是批判联邦政府特别是社民党的政治路线。

工会及整个社会的抗议活动所作出的政治抉择,是以反对削减社会福利和争取社会公正为出发点的。社会反对派中的一部分人不愿只局限于从事议会外的群众活动,而要将这种抗议活动形成一种有组织的、可以在议会中显示出来的政治力量。因而出现了积极筹划组建一个新左翼政党的前景。(2005年1月22日“竞选政策的抉择——2006倡议”运动和“倡议——劳动与社会公正”运动在哥廷根联合成立了“劳动与社会公正——选举替代党”。——编者注)朝着组建一个左翼政党方向发展的“倡议”运动的代表们指出,如果社会抗议活动没有政治团体的支持将一事无成,但如果作为惟一的提出建党倡议的“倡议”运动,如果不融入社会运动并成为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则它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问题的关键是,这种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抉择的运动能否巩固和发展壮大。只有这样才能为建立一个新左翼政党奠定基础,并且在取得政治成果的情况下,大大推进社会运动的发展。■

[黄汝接:中华全国总工会]

(责任编辑 吴新)

拉封丹算账了：德国社民党 现在只是一个空壳

张文红 摘译

德国《南德意志报》记者在德国社民党前主席拉封丹宣布退党并加入“选举替代”^①之际，同他进行了一次访谈。在访谈中，拉封丹解释了他为什么要加入“选举替代”，他将如何与民社党前主席居西合作，他如何看待施罗德等问题。这对了解拉封丹乃至新左翼党的纲领有一定帮助。下面是访谈的主要内容。

记者：在几年前的一次访谈中，有人问您：“有些同志认为您站在民社党一边。”您那时回答说：“民社党现在变得荒谬可笑了。”而您现在却要进入民社党的开放式候选人名单参加竞选。您自己也变得荒谬可笑了吗？

拉封丹：时间已经过去几年了，我们处于一个全新的局势中。在议会里只剩下推行“哈茨IV”^②和“2010规划”的政党了。大多数人已经拒绝了那些与技术至上的数字联系在一起的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政策。

在这种形势下，必须尝试提供一种新政策。民社党在柏林墙倒塌16年之后已经发生了转变。现在将出现一个新的左翼组织，它将提出一个与所有政党联盟的政策相对立的政策。我想参与这件事。

记者：再提一句拉封丹的老话：“民社党绝不是一个左翼党。人们事实上不会把民社党与自由联系起来。”那么，民社党现在是自由的完美化身了吗？

拉封丹：民社党的新党纲吸取了社民党纲

领的重要原理，包括承认民主和市场经济，承认自由企业主身份和利润。

记者：但民社党还信奉“社会主义的社会终极目标”。您也是这样吗？

拉封丹：想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克服赤裸裸的资本主义。我还相信，过去15年的讨论进程使民社党成员获得了两种认识。一是资本主义犯了使人屈从于经济的错误。二是共产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犯了使人屈从于党和国家的错误。但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制度，使人既不屈从于经济，也不屈从于党和国家。这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

记者：您接下来要加入“选举替代”吗？

拉封丹：是的。

记者：您已经描述了民社党的转变。您自己改变了吗？

拉封丹：谁不改变，就是对自己不忠诚。

记者：您的心，如同您在一本书的标题中表明的那样，在左边跳动^③。难道您有一颗移动的心吗？

拉封丹：我坚持我的信念。

记者：您比施罗德更早呼吁取消政治避难权。而且在社会福利和经济政策中，您要求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没有完全补偿的缩短工作时间。您为此得到经济界的赞扬，如同经济界称赞施罗德的“2010规划”一样。那时是一个错误的拉封丹吗？

拉封丹：我呼吁改变政治避难权和限制移

民，是因为我考虑到雇员的工作世界和生活世界。一个左翼政治方案必须与自由和团结互助这些基本价值紧密联系起来。对于就业而言就是：不进行工资补偿而缩短工作时间能够为那些没有工作的人找到一个工作岗位。我今天仍坚持这种看法。

记者：但声音不是特别大了。

拉封丹：这个题目依然在日程内，看一看大众公司、德国电信以及服务业工会与柏林市的协定。我只是在全体职工和受波及者在考虑家庭状况后同意的情况下，同意星期六和星期日工作。

记者：如果左翼政策就是保留或创造工作岗位的话，那么自民党也是左翼了。

拉封丹：自民党并不赞成缩短工作时间，而是赞成没有工资补偿地延长工作时间。而且他们反对劳资共同决定。创造新就业岗位最终取决于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由基民盟/基社盟和自民党联合执政的科尔政府的政策和施罗德政府的政策一样失败了。为什么？他们寄希望于削减工资、削减退休金、削减社会福利、降低企业和富人的税负。这一套方案磨灭了内需并导致失业率上升。

记者：一个与所有这一切完全对立的政策就是左翼的吗？

拉封丹：可以这样说，因为国会里的所有政党都采纳了经济团体的政策。它们忘记了亚当·斯密的看法：我们需要资本家，但他们的利益永远不会与大众的利益相一致；而且他们总是要欺骗公众的。

记者：回到新左翼党这个话题上来。您认为通过建立一个新党能实行合理的政策吗？

拉封丹：我相信这一点。现在的形势和绿党出现时的形势相似。当时已经有些政党不关心生态问题。今天的议会政党再次出现同样的盲点。所有政党都信奉新自由主义的纲领，都推行经济团体的政策。因此，我确信，新的左翼政党——如果能成立的话——将会在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三大党。

记者：当时有政党对生态问题不敏感，但现在它们可都重新敏锐地认识到社会福利问题的重要性了，这些问题在很早以前也曾是基民盟和社民党政策的核心内容。

拉封丹：但是，没有人再相信推行“哈茨IV”改革方案的政党了。因为他们经常在选举前向选民许诺一些事情——不仅仅施罗德政府如此——但在选举后做的却是相反的一套。

记者：那么，人们为什么应该相信拉封丹呢？

拉封丹：因为我严肃地看待这些许诺，我也因此而辞职。选举欺骗已经成为政党的家常便饭。所以，如果社民党和基民盟现在要求提高工资的话，就显得可笑了。他们多年来鼓吹抑制工资的政策。在过去的10年里，德国的实际工资下降了0.9%，而在欧盟内则上升了7.4%，荷兰上升了11.9%，英国上升了25.2%。

记者：“选举替代”是拉封丹重返议会所骑的驴吗？

拉封丹：我认真对待“选举替代”和民社党的党员和纲领。他们尝试建立一个新的左翼政党，推行左翼政策。我希望参加进去。

记者：您和默克尔（德国基民盟主席——译者注）一样是物理学家。您曾经是社民党的瓦特——您推动了社会民主主义这台蒸汽机快速前行。您现在真的有兴趣和力量为新党工作？

拉封丹：我作为一名战争寡妇之子无论如何要关心德国的失业者、退休者和雇员，使他们得到适当对待。此外，新左翼党刚刚出现就对德国政治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看看默克尔和施罗德突然赞成增加工资，这已经是令人惊叹的了。

记者：您将在议会里担任反对派领袖吗？

拉封丹：如果我成功取得议员席位的话，我们将分担反对派的工作。就是这样。

记者：和居西一起吗？

拉封丹：是的，和居西以及其他。现在正进行着一场狂欢节般的活动：人们指责居西

和我只是为了满足虚荣心才从政。

记者：这并没有错。

拉封丹：居西和我每天都钦佩那些没有虚荣心的人物，如施罗德和菲舍尔、默克尔和维斯特韦勒（德国自民党主席——译者注），并为我们不能达到这种谦虚程度而感到羞愧。

记者：他们没有放弃他们的职位并抛弃一切。

拉封丹：我担任了25年的社会职务并参加了许多选举。今天的领导人中没有哪一个拥有如此长时间的社会职务。我不是贪图安逸而辞职，而是因为我不这样做就得背叛我的信念。

在德国，辞职的政治文化已经丧失了。许多本来应该辞职的人口是心非，依然守着职位。实际上，他们不为他们所犯的错误承担责任。

记者：您其实是想说，您辞去所有职务是一种政治文化？

拉封丹：是的，辞职是我不能分担施罗德政治转变的自然结果。我不想从事一个又一个竞选欺诈。

记者：也许您欺骗了那些相信您的人。抛弃奥古斯特·倍倍尔、库特·舒马赫和维利·勃兰特曾担任的职务，您不感到遗憾吗？

拉封丹：当然，我一直为这一决定感到痛苦，也感到遗憾。但我当时作为党的主席看不到任何可能性，可以像您刚刚所提到的那些伟大先驱那样扮演角色。

记者：您曾写道，您没有正确估计到您的辞职对社民党所产生的后果，而且为此请求原谅。

拉封丹：是的。我没能料到，社民党从一个社会公正的党发展成为一个“哈茨IV”和“2010规划”的党，而且它还还为参加违反国际法的侵略战争感到自豪。

记者：施罗德和菲舍尔让德国参加科索沃战争是为了表明“红绿联盟”是负责的。

拉封丹：违反国际法现在是、并且将一直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在前南斯拉夫和阿富汗屠

杀无辜民众不是误伤。德国不允许参加肆无忌惮地轰炸村庄和城市的战争。

记者：您也一样要为您所抱怨的社民党的发展状况负责，因为您走开了。

拉封丹：社民党内的很多人就是这样说的。这也是一种推卸自己责任的尝试。民主政党不能将其纲领发展的责任系于个人身上。

记者：您辞职后，有人说拉封丹没有荣誉意识和责任意识。这属于您所蔑视的次要美德吗？

拉封丹：我的任职经历证明，没有次要美德是不行的。作为州长和党主席，我每天工作15小时，每天都要勤奋、准时和可靠。但是直到今天，许多德国人仍不理解，这些次要美德能够体现在每一个体系里。人们无论做好事或是做坏事都可以勤奋、可靠和准时。

记者：从1995年3月16日到1999年3月11日，即从曼海姆党代会到逃出柏林，这段时间今天对您意味着什么？

拉封丹：我反对用“逃跑”这个词。当施罗德辞去党主席职务时，没有人用“逃跑”一词。辞职就是辞职。我很愿意回顾我担任党主席期间的工作。当时社民党成功地做到了纲领革新——主要是在经济政策领域；找到了应对全球化的正确方法。遗憾的是，这个政策现在被抛弃了。其结果是社民党站在了500万失业者和日益增长的社会不公的碎片堆上。这个社民党只是一个空壳了。

记者：当内容回到空壳里，即当社民党改变了以后，那里还是您的家吗？

拉封丹：我不能推测太远的将来。现在的事情就是这样。在今后的几年里，我们要在社民党自暴自弃后重新建立一个左翼力量。

记者：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民党的左翼分裂派别，这个词能唤起您什么样的回忆？

拉封丹：能让我想起总是存在这样一些时刻，深刻的纲领冲突分裂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我们今天经历的这些纲领讨论和分裂，在新自由主义时期，也在欧洲其他国家和政党那

里发生。

记者：独立社会民主党对所有左翼力量来说不也是一种创伤吗？它当时与其说是在与纳粹作斗争，不如说是在与自身作斗争。

拉封丹：现在的形势是不可以类比的。当时人们竞争，看谁代表着最纯洁的政治理论。今天是要提出一个与所有政党的新自由主义相对立的方案。

记者：对竞争对手施罗德可能的复仇对您来说有多重要？

拉封丹：我总是读到复仇行动这个概念，这如同诬蔑我的辞职为逃跑一样，是要贬低我的政治观点。施罗德自己领导了针对施罗德的复仇行动。他站在他的政策的废墟前。对推行了富有成效的政策，没有哪个批评者有反对的机会。

记者：您的弱点是什么？

拉封丹：我的弱点之一是在困难的情形下要让人们理解我。我是指德国统一的那一年。我没有做到向人们解释清楚，我反对一比一兑换马克的货币联盟不是反对东德地区的人民，而是担心，他们当中太多的人会失业。

记者：您当时是总理候选人，也是一次行刺的受害者。这次行刺怎样改变了您？

拉封丹：我内心受到了伤害。这个伤口依然存在，即使当外部的创伤愈合以后。我认识到可能有比政治上一时的成功更重要的东西。

这也解释了我1999年辞职的原因。我现在是、并依然是一个政治人物。但我将竭尽全力使家庭生活和政治一致。我不允许给予与政治相关的畸变太多的空间。有一个简单的规则：人们必须学会说“不”。

记者：对什么说“不”呢？

拉封丹：不通过政治最大限度地挣钱。

记者：您是反资本主义者。但在市场运作方面却是一个老练的资本主义者——作为作者、在电视露面、作为《图片报》专栏作家。

拉封丹：我写书和作为政论作者而工作。

但我却因为与其他记者和政治人物一样为此收取报酬而受到指责。人们显然在找借口诬蔑我，因为我支持社会公正。无论勃兰特、倍倍尔还是拉萨尔都不是社会救济金领取者。

记者：那么来自社民党的批评，即您恰好为《图片报》写作，也是完全不公正的了？

拉封丹：我永远不会接受这个批评。这是一些没有读过葛兰西的人。

记者：安东尼奥·葛兰西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奠基者之一，与《图片报》有什么关系？

拉封丹：葛兰西呼吁左翼力量必须进入大众出版物。不管这是否适合社民党人：我们想要与之交流的选民购买《图片报》。此外，我的所有批评者都愿意在《图片报》露面。

记者：和您的对手施罗德进行一次澄清问题的对话还是您所希望的一件事吗？

拉封丹：我经常提供公开对话的机会，但他没有回应。我不能一辈子都和施罗德打交道。我现在把精力集中在改变德国的政治路线上。■

注 释

- ①“选举替代”是由来自德国工会和社民党内反对施罗德政府改革政策的左翼人士于2005年1月在哥廷根成立的一个左翼政党。
- ②“哈茨IV”指德国联邦议会于2004年8月通过的关于劳动力市场改革第4阶段的方案，将原来的失业救济和社会救济合并为“失业金II”。2005年1月起正式实施。
- ③拉封丹1999年辞职后，写了一本书，名为《心在左边跳动》。该书中文译本2001年1月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张文红：中央编译局]

(责任编辑 飞扬)

法国共产党三十二大对若干理论问题的阐述

陈露 摘译

2003年4月3—6日,法国共产党举行了第三十二次代表大会。来自96个省的867名法共代表与会。大会经过三天的激烈争论,最终以76%的多数票通过了主要由“变革派”提出的题为《共同谱写共产主义新篇章》的大会文件。大会选举产生了以全国书记玛利-乔治·比费为首、由222人组成的新一届全国理事会。现将法共三十二大文件中关于共产主义、超越资本主义、法共与法国社会党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摘译如下。

一、对共产主义的理解

对于我们来说,共产主义是由资本主义带来的苦难和破坏所引起的反叛的政治表达,也是对一个合作的、平等的、自由的、博爱的社会、一个能使每一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和解放的社会的深刻的期望。

共产主义表达了从现在起建设这样一个社会的意志,在这个社会里,人的能力的发展是社会活动的目标和新的效率的杠杆。因此,共产主义一词既表示一种目的,即人类文明的历史进步,同时也意味着一种现实的运动,即消灭剥削、统治和人的异化,进而解放资本主义社会。

给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过多种形式的抗议表

达出来的要求和替代资本主义的建议指明方向并使它们协调一致,通过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具体计划,赋予这些要求以政治上的力量,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现实意义。这样就可以把另一种社会组织的轮廓展现出来,在这一社会组织中,所有憧憬另外一种社会关系的人都能发挥自己的设想,而这种社会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归结为一种明确表达的民主的意志。

共产主义表达了一种建立这样一个社会的意志,在这个社会里,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是社会活动的目标和新的效率的杠杆。这意味着:生产手段、交换手段和金融手段的社会占有;走向一个保障就业,超越雇佣劳动,没有阶级的社会;民主机构的持续创新将使民主制朝着经济与政治的工人自治的方向发展。这不仅涉及走向对财富的分享,还涉及走向对知识、权力、资源和资金的分享。由于拥有超越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和专制的团结之间的对立的新的价值观,这一新的文明可以使人们从阶级、种族、性别和国家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可以使每个人和所有的人都得到充分的发展并发挥出创造性。

由于在“共产主义”的名义下既展开了大规模的解放斗争,同时又发生了无可挽回的悲剧,这就给共产主义这个词造成了麻烦。我们既不能忘记一个方面,也不能忘记另一个方面。

但是，要想使超越资本主义和一切统治制度的希望获得生命力，而且也使这一希望所鼓动起来的运动获得生命力，就必须赋予它们一个名称。何况，不管历史的风暴如何变换，还没有任何其他名称可以更为强有力地表示千万人曾经和仍旧向往并为之斗争的事业，他们希望建设一个能使所有的人获得自由、平等、尊严和和平的社会。

这种对共产主义目标的设想使我们作出坚定的选择：通过促进个人权利与能力而使每个人得到充分的发展；在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使民主制得到持续的发展；使各国人民在一个和平世界里持续地共同发展。

这种观念是对由资本主义造成的全球范围内人类生活和一切活动的商品化的强有力的挑战。这种观念也是对国家干涉主义的和专制的观念的激烈批判，包括对那些声称要实现社会变革，却无法超越资本主义的人们的批判。

二、对超越资本主义的解释

共产主义致力于人类从资本主义和一切统治制度中获得解放。我们不接受这样的思想，即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不可超越的边际。共产主义的志向是没有剥削、没有统治的社会。超越资本主义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决裂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人类将摆脱资本主义的逻辑和效果。这是一种以成功地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而进行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民主运动以及夺取权力的民主运动。

为了结束资本主义，也要涉及应对灵活性、创造性、迅速反应性和生产力发展的挑战。正是资本主义回应这些挑战的能力才使它得以维持到现在，不过这是以剥削和个人越来越严重的不稳定性以及对地球的掠夺性开采为代价的。为了应对这一挑战（“社会主义国家”正是在这方面失败了），我们把个人能力和社会能力的发展、对今后世代负责的精神、地区的和全世界的民主与合作的发展以及建设一个和平的世界置于首位。由此，共产主义不

停地向国家干涉主义提出挑战，后者意味着一个公共权力组织逃避集体的控制，使一个社会阶级能对全社会实行统治。因此，在各个层次的地地区组织中，包括在国际范围内，“国家的消亡”并不都是企求使共同事务管理的必要形式消失，而是要通过所有男女平等地参与一切决策的过程，使共同事务的管理彻底民主化。

同样，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市场提出挑战，资本主义市场意味着一个交换组织把一切事物直至人本身都变成商品，并使整个社会都受到金钱的盲目的、残酷无情的权力的控制。目前，资本仍旧保留对权力的垄断，因此必须实行权力的民主分享，这意味着对大规模的生产手段、交换手段与金融手段的真正的社会占有。

共产主义是从一切统治形式获得解放的意志的载体，它对男性统治女性持坚决的批评态度。女权主义应该成为共产主义计划整体的一部分。

应该超越由资本主义加以重复并且整合的上千年的异化，如性别的不平等、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的鸿沟、任务的设计与实现之间的分离、解决冲突的暴力方式。

这里需要进行严酷的和长久的政治斗争。必须激发并依靠对当前资本主义的规章、权力、机构和“价值”的不断增加的抗议；依靠以多种形式表达出来的反资本主义潮流；为了利润的竞争，在环境、食品、健康、海运、铁路等的安全方面不断爆出丑闻，资本主义越来越难于炫耀自己的“效率”了，我们也要利用这一困难。为了把直接的斗争和革命变革的前景结合起来，应该力求制定一个有活力的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计划。

正是从我们男女公民所痛苦经历的全部经验出发，我们才能够筹划向市场的统治和一切形式的统治发起挑战。这场战斗必须深入到社会之中、对世界开放并具有政治创新性。这样才能促进一种新的文明因素的出现，从而有效地采取行动以便实行对制度的超越，这正是我们今天赋予“革命”一词的含义。

三、对与法国社会党联合的看法

掌握大权的社会党通过放弃与世界性的资本主义选择进行斗争而使多元左翼政府依赖金融市场并且受到不利于就业及解决社会问题的欧盟结构的限制。我们正是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参加了政府。我们没有争取到我们党的自主性。这种情况使我们未能足够迅速和强有力地提出创新性措施以抵制政府治理的过失。

因此,尽管国民议会中没有共产党的票就不能达到议会多数,“参与执政”却经常表现为“不可触犯的”、“无条件的”,在欧洲、私有化等问题上尤其如此。但是,我们的领导对于党内和民众的批评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上,经验显示,随着创建尽可能广泛的联盟的建议和创举,对大众的动员已能取得重大的进展。

2002年,我们的总统竞选运动表现出缺乏明确的计划,尤其表现为这样的思想,即我们的抱负是成为“左翼中的左翼”。因此,许多公民和共产党员不再能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建议,我们捍卫“谁”的利益,我们的“计划”是什么。另外一些人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已经“屈服”并且或多或少地放弃了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

自1997年以来,我们的主要努力一直是要使我们有可能在政府中任职。当本来应该制订一项共产主义的计划、使之适应新的需要、把它放在首要地位的时候,我们自己却相信这样的思想,即共产党人的计划是不现实的。

我们已经采纳了某些积极的创意,但我们为社会运动所进行的活动只不过是起了对左翼政党施加压力的作用。我们对联盟的观念和实践仍然停留在陈旧的框架内。我们过于确定与社会党的关系,却妨碍了推动变革的人民运动发展的需要以及与社会行为主体(协会、工会、公民……)的新关系的建立。这样一来,我们就被这种不利的力量关系束缚住了,我们屈从于社会党在多元左翼中的领导地位。

因此,我们给这样的想法提供了机会,即认为我们已经只不过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左翼”了,而社会民主主义本身正在偏向自由主义的选择。

在整个法共历史上,法国共产党的力量来自于与人民的紧密联系,这表现为党本身有能力发起强大的联盟运动。这些强大的运动使得几代人都能找到共同的理想。这一基本的功能,正如我们反对右翼和极右翼的坚定斗争一样,构成我们革命的身份特征的一部分。

我们不能放弃这一缔结最广泛的联盟的要求。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数十年来这种联盟的要求都是以“左翼联盟”的观念来表达的。这一观念紧密地与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变革的幻想联系在一起。由于把上层关系放在首位,就无法使人民运动介入政党关系。因此,我们不是在有利于改变政治力量对比的动态变革的条件下,而是在不利的政治力量对比关系中,受到与社会党单方面密切联系的束缚。

我们并不否定这一时期取得的进展,但是这些失败迫使我们就联盟本身的概念、特别是选举联盟的概念进行反思,以便对这一概念进行全部的必要的修改。因此,我们应该着手一项全新的尝试,以便使今天的政治联盟概念与我们所作出的选择取得一致,这种选择就是我们赞成在任何情况下都把人民运动放在首位。

这涉及在人们中间、在一切与剥削、统治、歧视做斗争的力量中间创造出一种新的政治联盟的形式,涉及为了在社会中发挥应有的重要政治作用而联合起来,促进一种能够深刻改变力量对比关系并使之有利于改造的社会运动。

联合和选举联盟不能构成目的本身。然而联盟是把那些希望深刻改造社会、要求社会改变面貌的人们联合起来不可绕过的手段。■

[陈露:中央编译局]

(责任编辑 殷叙彝)

非洲：帝国主义和新形式的资本积累

康瑞华 编写

美刊《每月评论》2003年11月号发表了萨拉·布拉金 (Sarah Bracking) 和格雷厄姆·哈里森 (Graham Harrison) 的题为《非洲：帝国主义和新形式的资本积累》的文章，认为帝国主义在非洲的扩张和渗透把不平等结构移植到了非洲，在当地培育了贪婪的经济政治精英，并使非洲受外部支配，却没有给当地人民带来什么实在的好处。因此作者认为，在分析非洲现状时，使用帝国主义概念远比后帝国主义或全球化概念更能接近事情的本质。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非洲国家在结束殖民统治后，在从独立到1973年石油价格上涨的发展时期，国家经济计划，大规模的公共投资，以及以多边信贷和跨国直接投资的形式流入的外资，创造了非洲的经济增长。

在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前的70年代绝大部分时间里，美元实际利率一直是负的，这鼓励了过度借贷。可是，1979年标志着全球经济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该年保罗·沃尔克接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突然大幅度地提高美元利率，形成“沃尔克冲击”。美元利率政策的突然变化极大地增加了非洲债务的成本，因为绝大多数债务以美元计价，这迫使新独立的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为还债而白白干了至少20年。非洲债务危机是非洲被进一步纳入帝国主义统治的一个关键点。

马克思从未用过帝国主义这个术语，但它仍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关键词汇。帝国主义这个概念一般用来批判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指出现在被称为“全球化”的过程的不公平性；谴责西方国家的暴力胁迫；考察自由主义所声称的“自由、平等”的虚伪和极权主义本质。帝国主义在政治斗争中被用于称呼一种在国际层面运作的压迫性力量。帝国主义涵盖了各种不同的含义，以致于人们在使用这个术语之前必须先澄清他所说的帝国主义指的是什么。人们可以看出研究者们主要从三个角度使用这个概念。第一种帝国主义概念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向殖民地的资本输出过程相联系。第二种帝国主义概念把注意力放在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对殖民统治结束后地区的经济的支配上：这种支配表现在跨国公司对这些国家国民经济有害的致命的影响、贸易的不平等交换和技术上的支配上。就这一点来说，国家之间以及州（省）际间制度的差异，为中心地区对边缘地区的剥削创造了机会。第三种帝国主义概念与国际关系上美国的统治地位以及它对许多“二战”后摆脱殖民统治国家的军事威胁有关。人们或许把对帝国主义的这三种认识分别说成是“扩张主义的帝国主义”、“依附论的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每种认识都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每种认识本身都倾向于把全球资本主义的复杂性和矛盾简化成单一的论点。超越这三个范

晴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考察现实资本积累的特征。

关于帝国主义存在许多争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还是它的先锋？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物还是像卢森堡认为的那样产生于资本主义对“边缘”的需要？最近，世界已经达到后帝国主义阶段了吗？——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已经完全非中心化了，以致再没有确定的基地国家了。后帝国主义的概念是一种高调。弗雷德·哈利迪（Fred Halliday）在一篇论文〔收在 M. 鲁珀特（M. Rupert）和 H. 史密斯（H. Smith）编辑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全球化》一书中〕中通过对帝国主义“本性”的高度概括说明，帝国主义概念似乎并不陈旧过时，特别对于非洲来说是如此。他列举了当前时代的五个特征：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在世界范围的不可阻挡的扩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咄咄逼人的、扩张主义的、好战的特性；资本主义扩张的不平衡性以及社会经济不平等在世界范围的再生产；权力和财富不平等结构在世界范围的产生——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政治、法律和文化领域；贯穿资本主义扩张整个过程的抵制运动和反帝国主义运动。

这五点足以论证当前时代的本质是帝国主义。正是前两点使帝国主义的概念成为理解非洲与全球关系的基点，即非洲的不平等结构是通过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再生产出来的。我们还需要记住，被殖民主义移植过来的结构为非洲迅速地培育了贪婪的经济政治精英。解放、发展、现代化和进步这些美好的语言到处都被以贪婪和贪赃枉法为时尚的资本积累所玷污。

印度或其他殖民地不能把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看成是自己的未来。洛德·扬（Lord Young），撒切尔政府的部长评论说：“当你们谈论贿赂时，在这个国家（英国）是非法的事情……但在世界上有些我们曾去过的国家，我

们知道它经常发生，如果你想做成生意，你不得不那样做。”国际资本在结束殖民统治的国家“赤裸裸地运作”，遇到的是弱机制保护下的人民。第三世界国家常常不能有效地保护其人民，有时是因为精英为自我扩张故意制定的专制规则，有时是因为人民遭受长期掠夺、处于崩溃状态。富国支持为资本积累服务的政权，并确保它们自己在海外的公司有丰厚的利润可赚。

这些落后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网络通过与大跨国公司建立的关键性的联系得以维持，而大跨国公司又与它们自己强大的国家保持着政治上的联系。完全不平等的全球体制，对全球资本主义来说是内在的而不是一个外在的体制。

F. 库珀（F. Cooper）在论述资本主义渗透非洲的方式时说：“力量合生的地方被那些不合生的地方包围着，在力量合生的地方，社会关系变得密集，而其他地方的社会关系是松散的。”这些资本积累密集的地方的社会影响不是有益的。帝国主义所推动的非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实现发展的目的，反而给社会造成损害并导致外部支配和外向积累。这就是帝国主义这个概念为什么仍很重要，为什么在理解非洲与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关系方面它比全球化的概念有用得多的原因。那些希望进步、发展和人民幸福的人最好还是使用帝国主义这个概念，以挑战帝国主义的伪善。■

[康瑞华：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 刘元琪）

查韦斯政府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

何耀武 林卫 编写

2004年1月22日委内瑞拉分析网站(www.venezuela-analysis.com)刊登了C.P.潘迪亚和贾斯廷·波德尔著的题为《查韦斯政府的经济政策》的文章,阐述了查韦斯接手时委内瑞拉经济在新自由主义长期破坏下的困难局面,以及查韦斯政府近期为控制长期的金融危机所采取的外汇管制政策所取得的良好效果。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尽管委内瑞拉国内反对派和美国媒体都企图将委内瑞拉的经济问题归咎于查韦斯政府,然而,席卷委内瑞拉全国乃至所有贫穷国家的经济危机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持续时间之长,绝不是单一的政府因素所能解释得了的。看看委内瑞拉的邻国哥伦比亚或巴西的经济状况,我们就不难发现:诸如贫困、通货膨胀、失业、暴力犯罪之类的经济、社会问题在这些国家中都普遍存在,而不仅仅是在委内瑞拉存在。

1999年查韦斯上台执政时,他所面临的是一种长期的贫困不断加剧、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经济状况。在查韦斯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城乡土地改革、建立小型信用贷款、发展公共教育、增加食品配给、改善医疗卫生设施等多方面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委内瑞拉反贫困斗争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委内瑞拉的反贫困斗争中,查韦斯的经济小组必须克服这样一个难题: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国际背景下,一个穷国能够成功地做些

什么?由于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之类的信用机构进行大量的贷款和支付利息,穷国经常要承受巨大的外债压力。穷国如果想要获得发展或想减少失业、加快经济发展及减轻债务负担,那么它们就需要资本和投资。受这些因素的驱使,穷国政府就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恶性竞争:为了迎合投资者和借贷方提出的条件,它们不得不降低劳动、健康和环境标准。无论这些投资者和借贷方是私人还是如IMF一类的机构组织,都使接受其投资的对象付出了可怕的代价,而这些投资所带来的好处普通民众是享受不到的。但是试图置身于全球经济之外或与世界经济完全脱节,特别是当一个报复性的强国对其使用经济制裁、政治封锁甚至发动恐怖袭击时(正如“脱节的”古巴已面临的挑战)就更加困难。

在吸取委内瑞拉以往的经验教训后,查韦斯政府已经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这一问题。虽然这些方法都不是长期的解决方案,但是它们都是为了试图克服由于阶级矛盾和各种破坏活动所造成的经济困难局面而制定出来的。

查韦斯继承的经济状况

1988年上台执政的总统卡洛斯·佩雷斯将国家交付给IMF。私有化、削减公共开支、经济自由化以及减少行政干预等措施随之推行。1989年经济收缩了8.6%,并且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1988年的43.9%上升至66.5%。这

些措施不仅没有解决诸如通货膨胀等他们声称要解决的问题，而且还给民众造成了毁灭性的负面影响。

查韦斯的前任，拉斐尔·卡德拉（Rafael Caldera）由于一场银行业危机，再次面临大规模的资本外逃。1994年，货币贬值使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达到70.8%，价格和外汇管制被迫再次加以实施。1995年，委内瑞拉与IMF达成协议：IMF再给予委内瑞拉14亿美元的贷款，条件是委内瑞拉必须进行结构调整。随之而来的是委内瑞拉国内私有化扩大：外国投资增加，石油价格上升，而贫困也持续上升。这就是1999年查韦斯政府所面临的国内局势。

查韦斯政府的对策是在设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同时，努力保持私人投资者的信心。但是委内瑞拉反对派对查韦斯政府所采取的对策持续不断地进行阻挠已严重地破坏了这些努力的成果。

与当前危机作斗争

委内瑞拉遭受的最新一轮经济危机源于2002年4月份发生的美国支持的政变，接着在2002年的晚些时候，爆发了由石油垄断企业——委内瑞拉石油公司上层精英领导的总罢工。这次罢工，影响了各个经济部门，石油出口陷于瘫痪，给委内瑞拉造成近80亿美元的巨大损失。

委内瑞拉中央银行统计资料显示，对资本外逃起缓冲作用的外汇储备在2003年1月的20天里由119.3亿美元减至110.5亿美元。由于投资者们开始期望购买美元以实现资金外逃，中央银行于2003年1月份暂停了美元交易。外汇储备的锐减促使查韦斯政府重新采用现今人们所熟悉的外汇管制政策。

这一次，政府成立了国家货币管制委员会，制定了以1598博利瓦兑换1美元的官方固定汇率。那些有幸能出国旅行的委内瑞拉居民（鉴于1997年有67%的居民每日开销还不到2美元，这类出国旅行居民只是人口中的少部分）

只能从黑市以2500博利瓦兑换1美元购进美元。

历史证明，实施外汇管制是政府为使国家经济免遭国际投资者及其国内傀儡机构反复无常的做法的破坏而可以采用的少数有效货币政策工具之一。对银行、经纪商、外国政府和机构投资者而言，像委内瑞拉这样的穷国并不是真正的投资市场，当其经济繁荣时它们投入资金，一旦经济陷入萧条就溜之大吉。这种反复无常的投资使委内瑞拉的穷人、失业者以及政府负债数量不断增长。

查韦斯政府正在把委内瑞拉公民每年在国外旅行的花费控制在2000美元以内，这意味着上层精英难以用出国来规避国家的货币管制政策。在这些限制下，政府将对任何花费超过2000美元限额的人给予严厉的罚款。对多数委内瑞拉人来说，出国旅行是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所以，对这些策略不满的是商界精英。他们都竭尽全力地争取解除外汇管制。

尽管查韦斯政府实施了外汇管制措施，但它行事还是很谨慎的，并未完全阻止急需的国外投资的进入。8月份以来，财政部已经发行数十亿美元的债券在委内瑞拉国内销售，这就为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提供了一个避开外汇管制不利方面的机会。这使委内瑞拉经济既避免了外国投资的蓄意破坏，又刺激了投资。

当然，债券的销售并不是没有其自身的一些限制措施。财政部表示，作为团体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和经纪机构）将只能购买最近所发行的10亿美元债券的20%。剩下的8亿美元债券留给居民和个人投资者。每个单独的金融机构将只能购买5000万美元债券。

为期10个月的货币管制政策已经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委内瑞拉财政部估计，2003年底外汇储备将达到207亿美元，相对2003年1月中旬而言，增加了90亿美元，增幅大约为30%。资料显示，2003年委内瑞拉经济也开始复苏。■

[何耀武、林卫：广东省纺织技术学院]

（责任编辑 刘元琪）

世界左翼齐聚孟买

[美]大卫·怀特豪斯 著 朱艳辉 摘译

2004年3—4月号美刊《国际社会主义评论》发表了大卫·怀特豪斯题为《世界社会论坛首次在亚洲举行：世界左翼齐聚孟买》的文章，介绍了第四届世界社会论坛的主要议题、风格、争论的问题和取得的成果。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主要议题

贯穿此次世界社会论坛的主要议题是美国“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和对伊拉克的占领。

同以往的世界社会论坛一样，跨国公司及其为其服务的国际代理机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罪恶仍是论坛的焦点。例如，印度的很多“大型水坝”项目都是由世界银行提供资金的。这些项目使成千上万的印度农民被迫离开家园。

人们谴责控制印度瓶装饮料市场的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挖掘的深井正在从农村地区地下水位吸取水分，这样农民的水井就干枯了。

他们还谴责安然公司、贝克特公司以及通用电气公司将孟买本地马哈拉施特拉邦地区电力私有化的问题。在国家官员的帮助下，这些国际商业巨人试图将电的价格定为原来价格的7倍。

此次世界社会论坛的新增主要议题是讨论宗教冲突的不断增加。印度由信奉印度教原教旨主义的右翼印度人民党统治。就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地区北部，印度人民党领导的古吉拉特政府协助暴乱者在2002年杀死了1000名穆斯林信徒。古吉拉特反宗教原教旨主义活动家特吕普蒂·沙阿认为：“当你从世界范围内看待原教旨主义时，你就发现宗教并不是本质问题，是资本主义让人们相互对立，而获利的都

是富人。宗教只是一个把人们分开的借口。”

真正的多样性

尽管世界社会论坛的与会者来自120多个国家，但是大多数还是来自南亚。

许多与会者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者和更广泛的左翼人士。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各种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主要致力于贫困国家的发展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迅速并组织了一系列让人目不暇接的活动，从艾滋病宣传教育到国家用水权保护和反对使用童工的运动。其中，很多非政府组织一心想通过改革来促进基层的参与，赋予基层以权力，还有一些则完全致力于慈善事业。

虽然印度的两个主要共产党从组织上支持了这届世界社会论坛，但非政府组织还是为会议提供了很多资金。巴基斯坦活动家胡迈拉·伊克提达(Humeira Iqtidar)说：“有很大一部分与会者是来自发达国家的政治活动家，他们能够负担自己的路费，而大多数与会代表均来自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他们都是非政府组织的成员(通常他们都具有国际会员资格)并由非政府组织负担路费。”伊克提达还提到，很多来自印度社会运动的与会者也是由非政府组织提供经济支持的。但是这些都不会影响到这些运动的纯粹性，——他们的苦难如此真切，他们的抵抗如此感人至深且鼓舞人心。

问题是很多社会运动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比与政治性的左翼的关系甚至更近。这种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肯定会影响到这些活动的政治取向，伊克提达认为这种关系“会影响这些运

动的政治倾向，(因为)非政府组织的经济支持是以他们的非政治性为条件的”。

重新提起的争论

很多争论继续出现。其中一个争论早在1999年西雅图抗议世界贸易组织事件时就已出现：类似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机构能否改革以满足人们的需要？更广阔一点说，这是非政府组织与左翼之间的一场争论，非政府组织希望在这些机构中能够拥有(有的现在已经拥有)一个席位，而左翼认为这些机构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所以应被废除。其实这个争论并不是经常被提起，因为非政府组织和左翼相互开展独立的活动，也都有他们自己的受众。

虽然对美国军国主义的反对一直是不变的话题，而且也经常提出应该加强国际团结合作，但是只有极少数的几个发言人提出应该募集物资去支持伊拉克的抵抗。就在世界社会论坛开始时，成千上万的伊拉克人正在抵抗美军的占领，这种相对的冷清由此更加显眼。

有些发言人对于以暴力形式进行抵抗显得小心翼翼，或者他们可能是在担心这种抵抗会最终以宗教的形式出现。只有几个发言人认为所有受到压迫的人都有反抗的权利，并认为自决就应该意味着外人无权决定抵抗的政治形式。

对于是否支持伊拉克的抵抗斗争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是否会对世界社会论坛产生保守影响的争论是与世界社会论坛相并立的另一个在大街上举行的会议上争论的焦点。这是由印度的一些军事化的毛主义组织举行的“孟买抵抗2004”集会，该集会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但是据大家所说，“孟买抵抗2004”集会的参与人数不到世界社会论坛的1/10，结果，“孟买抵抗2004”的组织者将自己与大批民众隔离开来，而他们是左翼在辩论中需要的。

回到世界社会论坛。另一个一周来引起热烈讨论的话题是印度对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的镇压。令人愤慨的是，包括左翼人士在内的很多印度人都对占领穆斯林地区以默认予以支持。

成果

尽管受到全球瞩目，本届世界社会论坛最重要的成果还是可能只具有地方意义：促使分裂的印度左翼走向某种程度的真正的团结和讨论。印度的贫困、压迫、军国主义和残暴的右翼都说明左翼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同以往的社会论坛一样，本届论坛为世界的这一重要地区的进步和左翼力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对话和讨论的空间。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下一步，即自下而上建设可靠而政治化的反抗力量的工作，尚待努力。

世界社会论坛也为世界社会主义和激进左翼的46个组织提供了一个在附带同时举行的会议上相聚的机会。同印度左翼一样，国际左翼处于分裂的状态；也同世界社会论坛一样，这个附带会议主要起着相互介绍的作用。各个组织陈述了对美军占领伊拉克的一致反对以及对3月20日世界范围内反对占领伊拉克示威的支持。所有成员都表示要在世界社会论坛下一年在巴西再次召开之前相互交流政治观点和提议，以实现更好的合作。

世界社会论坛也适当促进了美国左翼的发展。一场名为“美国社会运动的斗争”的分会标志着致力于在2005年举办美国社会论坛的几股力量首次实现了合作。此次讨论会由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国际交流变迁中心及经济研究和社会变迁中心发起主办。发言人包括反种族隔离的老牌活动家丹尼斯·布鲁塔斯(Dennis Brutus)和“50年受够了”组织发言人恩乔基·涅胡(Njoki Njehu)。包括一月底的芝加哥社会论坛在内的一系列活动的成功举办显示了将社会论坛活动带入美国的好处，虽然世界著名的西雅图事件发生在这个国家，但是在巩固政治力量方面，这里却远远落在了其他地方的后面。■

[朱艳辉：中共中央编译局文献部]

(责任编辑 徐洋)

苏联解体后的摩尔多瓦共产党

李亚洲

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是前苏联地区惟一重掌政权的共产党，因而它的发展历程及前景引起世人关注。本文拟从摩共是如何重掌政权、它现在面临哪些考验的角度，提供一些情况和分析。

一、重掌政权和再次执政

1991年“8·19”事件后，随着苏共解散、苏联解体，摩尔多瓦也宣布完全独立，成为多党议会制国家，同时禁止共产党在境内活动并没收其财产，摩尔多瓦共产党被迫解散。

但是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并没有停止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从国内形势来看，当时摩尔多瓦独立伊始，摩共同苏东地区多数共产党境遇相似，在人民阵线等极右势力甚嚣尘上的反共气焰下遭禁，但总体上说，当局后来并没有像一些国家那样对摩共“打压封杀”和“反攻倒算”。再加上刚刚上台执政的右翼彼此倾轧，不断分化组合，无暇顾及其他，未能形成反共气候。在这种内部环境里，以共产党为首的左翼力量得以喘息和发展，原摩共一部分党员加入了“摩尔多瓦农业民主党”，另一部分党员则组成了“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与此同时，前摩尔多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长沃罗宁成立并领导了废除非法取缔和恢复共产党的组委会。1994年2月，摩尔多瓦第

13届议会选举举行，“摩尔多瓦农业民主党”大获全胜，并在议会中形成压倒多数。同年4月，摩尔多瓦新议会通过决议，取消了对共产党的禁令。“禁共令”解除后，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作为原摩共的继承者开始公开活动，经重新改组获准登记为合法政党。1994年12月，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召开第一次党代会，沃罗宁当选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重新改组后的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强调自己是摩尔多瓦共产党的继承者，是工人阶级、劳动农民、人民知识分子和一切劳动者的政党；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失败是“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造成的，但这种挫折是“暂时的”，两种制度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而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强调必须创造性地，而不是教条地对待马列主义学说和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提出党的近期目标是建立“革新形态的社会主义”，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认为只有经历泛民主主义阶段（恢复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同时保留多种经济成分等）和复兴社会主义阶段（通过直选建立人民政权，社会主义经济在多种经济成分中占主导地位等）这两个阶段才能使摩摆脱危机。^①

为了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面临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和平、民主的道路夺取政权。为此它成立后一直非常注重自身思想和组织建设，首先建立健全了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并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基

层党组织，此外还成立了自己的共青团和妇女组织。与此同时，它既坚持马列主义又不机械照搬，既注意发扬党内民主又禁止派别存在，既努力维持原有的工农和知识分子这一社会基础又注意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充实党的队伍，并且能够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斗争策略，使人感到耳目一新。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迅速成为摩国内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1998年3月22日，摩尔多瓦举行第14届议会选举。结果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脱颖而出，获得30.01%的选票，位居第一。摩尔多瓦第一任总统斯涅古尔领导的竞选联盟“民主协议会”获得19.36%的选票，“争取繁荣民主的摩尔多瓦”获得18.14%的选票，“民主力量党”获得8.82%的选票。上述四个获胜党在新一届议会中分别获得40、26、24、11个议会席位。上次选举中得票第一的“摩尔多瓦农业民主党”在本次大选中因得票率未达到法定的4%，而未能进入议会。

议会选举结束以后，进入议会的4个政党中的3个政党结成执政联盟，而在选举中得票最多的共产党人党成为议会反对党。根据执政联盟各党达成的协议，得票第三的“争取繁荣民主的摩尔多瓦”运动领导人迪亚科夫当选议会议长。^②但是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已经成为摩国内影响力最大的政党，是各派政治力量都承认的一个事实，它不仅是拥有40个席位的议会第一大党，并且占据了1个副议长、5个常设局成员（共13人）和4个专门委员会主席（共11人）的位子。除了首都基希讷乌，共产党人党在地方也有很大的影响，在全国10个县中，有4个县、5个副县长的职位由其党员担任。

但是，新议会从刚开始工作就出现了与总统的对立。在总理人选问题上，新议会与卢钦斯基总统意见相左。经过双方艰苦的谈判，议会同意了总统提出的总理候选人丘布克的组阁方案和执政纲领。但总统和议会之间的矛盾并没有随着丘布克政府的走马上任而缓解，反

而日益尖锐化。双方矛盾产生的根源在于国家政权由哪一方主导，即摩是建立总统制国家，还是建立议会制国家的根本问题。

1999年2月，卢钦斯基总统提议修改1994年宪法，改变国家管理体制，由半议会半总统制改为总统制，即总统有全权管理国家，并且负责组建内阁。此举遭到了议会的坚决反对，而且议会先于总统提出了更加完善的宪法修正案。2000年7月5日，摩尔多瓦议会以绝对多数通过采用欧洲民主模式和对宪法中规定的总统选举程序进行修正的决议，从而确立了摩尔多瓦为议会制国家，总统由原来的全民选举改为议会选举。

2000年12月1日，摩尔多瓦议会开始选举总统，候选人分别为议会第一大党共产党人党领袖沃罗宁和宪法法院院长巴尔巴拉特。根据宪法规定，候选人必须获得议会101个议席的3/5，即61席以上才能当选总统。如果议会经反复投票无法选出新总统，在任总统有权解散议会，并宣布重新选举日期。由于沃罗宁和巴尔巴拉特的支持者互不让步，相持不下，经过4轮选举，两名候选人仍无一人获得法定的票数。于是，卢钦斯基总统根据宪法规定，于2000年12月31日宣布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

2001年2月25日，摩尔多瓦举行第15届议会选举。除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外，另有9个政党和6个政党联盟参加了选举。结果共产党人党一支独秀，得票率达到了50.2%，而由总理布拉吉什领导并得到卢钦斯基总统支持的中派联盟仅以13.42%的得票率名列第二，另一个进入议会的是罗什卡领导的右翼政党基督教民主人民党，得票率为8.24%，其他党派则与议会“无缘”。这样一来，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赢得了101个议会席位中的71个，在新议会中拥有绝对优势，获得了单独组阁的权力，并确保该党领袖沃罗宁在总统选举中轻松获胜。同年4月4日，共产党人党第一书记沃罗宁当选为摩尔多瓦共和国总统。摩共经过10年的奋斗终于重新获得了执政权，摩尔多瓦成为

苏联解体后在前加盟共和国中出现的第一个由共产党重新执政的国家，同时也成为欧洲大陆上惟一由共产党掌权的国家，这一事件在独联体以至全世界都引起了强烈震动。

在选举中获胜上台执政的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并没有被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它对当时的国内形势和自己所肩负的任务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及时完成了从反对党到执政党角色的转换。2001年4月21日，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在大选获胜后不久隆重举行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就修改党章、党纲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并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沃罗宁当选为党的主席。更为重要的是，为了使国家摆脱危机形势，将复兴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and 促进社会团结的承诺早日变为现实，此次大会提出了一整套以振兴国家为核心目标的治国方略。

经过不懈努力，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取得了良好的执政业绩。首先，在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其执政4年间，摩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都在6%以上，新增工作岗位10万个，职工平均月工资增加1倍，达到了目前的90美元，建立了一个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对科技、教育和文化事业的预算投入增加了1.5倍，并补偿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私有化时居民的储蓄贬值损失部分。^③其次，在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共产党人党尽量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缓和与在野党的矛盾，在国内营造了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同时政府组织专项行动，着力打击社会上的黑恶势力和团伙犯罪。经过努力，摩国内大型犯罪集团已基本被制服，社会治安有明显改善，共产党人党在加强治安管理方面采取的措施深得群众拥护。可以说，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4年前在选民面前所作的振兴经济和振作民族精神的承诺全部得到了兑现，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自摩尔多瓦独立以来任何一届政府都未能取得的巨大成就。

与此同时，上台执政后，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更加重视自身建设问题。据统计，2001年1月—2004年10月，共产党人党新增党员1.1

万人，数量上几乎翻了一番，与此同时，党的队伍年轻化成就显著：在新增党员中，2400人年龄在30—40岁之间，3000多人年龄在50岁以下。在新增党员中，1/3以上受过高等教育，其余的则受过中等或中等专业教育。共产党人党在重视发展队伍的同时，也特别强调严肃党的纪律。在上述新增党员中，目前已经有800多人被开除出党，占新增党员数的7.5%，在个别地区这一比例甚至达到了40%。这些人被开除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最主要的是，他们身上极为明显的功利主义目的，将党证作为向上爬的“敲门砖”。^④由于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摩共的战斗力的日渐增强。

2004年12月11日，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举行了第五次代表大会，641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出席，现总统沃罗宁再次当选为主席。本次代表大会的中心任务之一是为2005年摩尔多瓦全国大选做准备，大会修改了党章，提出了参加大选的竞选纲领。竞选纲领提出，如果摩共获胜，则党在2005—2009年任期内的奋斗目标是，把摩尔多瓦建成一个国家富足、人民安康的新社会。具体来说：（1）全国投资和国家预算均增加1倍，实施国际公认的经济增长战略，实现经济现代化；（2）新增30万个工作岗位，职工平均月工资增加2倍，达到300美元以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3）在互尊互谅和民主的基础上把国家和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自由发展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及其创新，充分保障个人自由及其选择的权利；（4）把摩尔多瓦变成一个对国家经济有效投资、西方市场对其产品开放的欧洲型国家，摩尔多瓦公民可以免签证自由出入欧洲国家。^⑤由此可见，共产党人党在大选中提出的竞选纲领振奋人心，再次使摩尔多瓦人民对美好未来充满了憧憬，加上共产党人党4年前在选民面前所作的振兴经济和振作民族精神的承诺全部得到了兑现，所以有相当一部分民众对其再次兑现竞选承诺抱有坚定信心，这为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再次获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5年3月6日，摩尔多瓦举行第16届

议会选举。结果有3个政党和竞选联盟进入议会，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不负众望，得票率为45.98%，基希讷乌市长乌列基安领导的“民主的摩尔多瓦”竞选联盟获得了29.41%的选票，罗什卡领导的基督教民主人民党得票率为9.7%。根据得票率，共产党人党在由101名议员组成的议会中控制了56个席位，以较大优势保住了第一大党的地位。但是这并不标志着共产党人党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因为其候选人离再次成功蝉联摩尔多瓦共和国总统还差5票，而进入议会的反对党——“民主的摩尔多瓦”竞选联盟和基督教民主人民党都声称，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决不会投共产党人党候选人的票。也就是说，如果不能顺利选出新总统，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主导的议会仍然有被解散的危险。^⑥面对这种形势，共产党人党成功分化了反对派，获得了议会其他两党部分议员的支持。在4月4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共产党人党主席沃罗宁共获得75张选票，从而超过宪法规定的3/5的多数，再次成功蝉联摩尔多瓦共和国总统。

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的再度获胜表明，共产党不仅能够赢得选举的胜利，而且有能力领导人民建设好国家，连续获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在苏东地区各国纷纷抛弃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以资本主义方式为主的社会改造，以及共产党不断摸索、坚持斗争的情况下，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再次获胜给共产党人以信心并使共产党人看到了希望，是一个有着积极意义的重大事件。

二、面临的考验

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作为一个以和平、民主的方式获得政权的政党，有前期的经验可资借鉴，其再次执政获得成功具有一定的潜力。但同时它在国家统一、保持社会稳定以及兑现经济发展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允诺等诸多方面也面临严峻的挑战。

首先，摩共再次执政面临的最大挑战仍然

是国家统一问题。尽管摩尔多瓦是个欧洲小国，但民族问题却十分复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股民族极端主义倾向随着东欧剧变浪潮席卷整个欧洲大地，摩尔多瓦也未能幸免。1990年9月，德涅斯特河左岸的俄族人宣布成立“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摩尔多瓦独立后，虽几经努力，却由于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及德河左岸当局独立立场一直强硬，德涅斯特河左岸闹独立的问题最终没能解决。摩共上台执政后，把解决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的冲突、完成国家的统一事业作为自己工作的优先方面。摩共认为，通过和平的政治途径解决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问题是惟一可行的。

2003年11月中旬，俄罗斯提出了一个解决摩境内德涅斯特河左岸问题的新方案。这一方案的具体内容是，摩尔多瓦将成为一个由基希讷乌中央政府和两个联邦主体——“加告兹”（摩南部土耳其族自治区）和“德河左岸”组成的联邦国家。新方案出台后，摩总统沃罗宁表示原则上接受，但遭到了反对派的强烈反对，反对派还多次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沃罗宁迫于美国和西方以及国内反对派的压力，最终拒绝了俄罗斯的这一方案，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取消了原定对摩的访问计划。这一事件给以后的摩俄关系蒙上了阴影，^⑦摩共由亲俄逐渐开始“反俄”。

格鲁吉亚、乌克兰发生“颜色革命”后，两国相继建立了亲西方政权，而美国又将摩尔多瓦作为其推行“颜色革命”的下一个目标。为抵制反对派的“颜色革命”，2004年12月11日举行的摩共五大决定要把自己建设成一个新型的欧洲民主政党。2005年2月22日，摩尔多瓦又同欧盟签定了加入欧盟的行动计划。与此同时，摩尔多瓦政府还坚决要求俄罗斯从摩尔多瓦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撤军，认为俄在德涅斯特河左岸的驻军是对一个国家领土的非法占领，俄罗斯延长驻军没有任何可以解释的理由。此外，摩尔多瓦联合格、乌亲西方政权，积极致力于复活“古阿姆集团”，形成抗衡俄

罗斯的“三角同盟”。该组织的再次活跃表明，西方支持组成的跨地区机构“古阿姆”集团正在独联体地区崛起。2005年4月22日，“古阿姆”组织峰会在基希讷乌举行，摩尔多瓦总统沃罗宁、乌克兰总统尤先科、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和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出席了峰会。当天会议结束时通过的一项声明宣布，与会成员国愿意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包括在维和行动方面进行密切合作，并坚决要求俄罗斯尽快从该组织成员国撤出其军事基地。^④

其实，摩尔多瓦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真正障碍源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和俄罗斯对摩尔多瓦的争夺。摩尔多瓦虽是一个欧洲小国，但却是美俄争夺的一个战略要地。美国要推进北约东扩，完成对俄罗斯西部的战略包围，摩尔多瓦是一个必争之地。在摩尔多瓦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即未被国际社会承认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驻扎着俄罗斯第十四集团军，美国和西方认为这是北约东扩的障碍，而俄则将其视为抵制北约东扩的前哨，^⑤况且未被承认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领导人反对俄罗斯撤军，认为俄军是维护地区安宁的保障，所以俄罗斯不会轻易退出这一舞台。

众所周知，摩共在2001年2月是以主张与俄罗斯加强合作、将俄语作为第二官方语言、加入俄白联盟等亲俄政策上台的。此次摩共出人意料地主动“革命”，外交政策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积极申请加入西方阵营，由亲俄摇身一变成为“反俄”，这其中既有西方的影响，也与俄罗斯迟迟不肯从摩尔多瓦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撤军有关。摩共既要求俄罗斯撤军，又在国家统一问题上离不开俄罗斯的合作，摩共在该问题上的对俄政策陷入了两难境地。在国家统一问题上，摩共如何调整自己的对俄政策，避免成为大国争夺的牺牲品，完成国家统一大业，成为摩共面临的巨大挑战。

其次，摩共的社会稳定目标面临严重挑战。摩共在2001年2月的议会大选中以绝对优势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占全国人口总数1/3的俄语居民是摩共的传统支持者。摩共在

竞选纲领中明确提出了执政后将赋予俄语以第二官方语言的地位，并表示将致力于加入俄白联盟等亲俄政策，从而更加坚定了这部分选民对摩共的支持。

但是从2003年开始，摩共由亲俄变为“反俄”，这使其失去了相当多俄罗斯族选民的支持。如前所述，摩共在这次议会大选中的成绩比4年前的那次大选有所下降，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与摩共实施反俄政策不无关系。因此，摩共在社会稳定问题上也陷入了两难境地。如何协调国内民族关系，既不伤害大多数摩尔多瓦人民的民族感情，又能赢得俄及其他少数民族选民的支持，从而保持摩尔多瓦今后的政局稳定，这不仅牵动着摩各族人民的心，也受到世人的关注。

最后，摩共的经济发展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目标面临巨大挑战，摩共兑现在竞选纲领中的允诺还存在多种变数。摩尔多瓦历史上一直“颠沛流离”，饱经磨难，在东西方的夹缝中生存。沃罗宁总统2001年上台时就明确表示：“我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偏向任何一方都是不可取的。我们是现实主义者，哪里存在国家利益，我们就应该出现在哪里。首先，我们必须正视现实：摩尔多瓦所需的能源95%来自俄罗斯，销往俄罗斯的商品占出口总额的65%。对我们来说，目前最现实的无疑是发展同俄罗斯和原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基于这种认识，摩共执政后积极发展与独联体国家，特别是与俄罗斯的关系。而摩“前几届政府总是瞄准西方”，“他们反对俄罗斯”。对态度上的转变，俄罗斯也适时地给以回报。此后，俄将出口给摩尔多瓦的天然气价格从原来的每1000立方米60美元降到50美元。此举与2000年3月，由于摩长期拖欠俄天然气款不还，俄断然对摩停供天然气达半月之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无疑是对摩共的莫大支持。此外，摩与其他独联体国家也有着长期的传统联系，在宗教、文化等领域都有许多相似之处，经贸往来更是历史久远。^⑥

但是从2003年开始，摩（下转第31页）

编者按：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本刊照例集中刊发一组关于世界各地工会运动的文章。与以往所裁文章的关注点不同，这篇文章已不单单是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条件下工会运动日益衰落的描述及其原因的分析，而更多的是探索使工会运动走出低谷的途径，包括工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改革方案。

欧洲工会运动的现状、问题和前景

毛禹权 编写

受西班牙共产党影响的西班牙工人委员会国际关系书记哈维尔·多斯在2004年3月出版的西班牙《工会刊物》(Gaceta Sindical)第4期上发表了题为《欧洲工会运动一瞥》的文章，介绍了欧洲工会运动的现状、问题和前景。现将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欧洲工会的多种模式和面临的问题

近几十年来，欧洲各国工会间虽然产生了某些融合，但由于欧洲多民族国家的产生与演变不同，工会模式仍有巨大差异。它反映在传统和实践不同，组织、谈判和动员形式不同，这是欧洲各民族社会历史差异、立法和其他因素不同造成的结果。

欧洲各类工会模式五彩缤纷。一类是以英国职工大会为代表。英国职工大会是联合王国所有工会统一的工会中心，它的活动在企业成效显著，它不存在地方性代表机构，它的全国性大工会和产业工会都在自己管辖范围内进行工会活动，相互间很少配合。职工大会与工党保持着历史联系，但它很大程度上已失去了影

响该党决策的能力。二是法国、意大利、葡萄牙、希腊、西班牙和比利时等国的工会。这些国家的工会运动很有凝聚力，对社会政治拥有很强的干预力，对整体性的劳工社会问题保持着传统的、包括总罢工在内的动员力。这些国家的社会对话，不管是工会和资方的双方机制，还是包括政府参加的三方机制都相当牢固。除希腊全国只有一个总工会外，其他国家都有两个以上的总工会。工会的多元化和分裂有其历史渊源，产生于它们间的政治分歧，它们分别受社会党、共产党影响。三是荷兰工会。它通过社会对话在最近几年达成了重大的社会和劳工协议，使荷兰工会提高了联合行动的水平。四是德国工会和北欧工会。它们共同参与创建了在欧洲甚至在全世界都闻名的最先进模式的福利国家。这种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共决或工人代表参加大企业的董事会或监事会，参与对企业的管理。工会还参与一般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条件是在社会政治领域不采取传统的工会行动，而是通过对话达成一致，因而一直到现在还保持着社会团结和一致。但最近十年中这种一致在德国正在破裂。五是奥地利工会联合会。它兼有上述国家工会的共同

特点,它的强大的产业联合会能够通过谈判达成全国性的产业集体合同。虽然奥工联有地区组织,但内部的权力掌握在产业工会手中。这些产业工会和德国一样,在全国集体谈判中,可进行传统的产业总行动。

中东欧地区国家的工会运动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国家中,多数国家是全国有两个以上的总工会。这些国家工会多元化是政治分歧的产物。它们的主要政治倾向从社会民主党、前共产主义者到在捷克和斯洛文尼亚新建立的中右集团。中东欧国家的工会运动在欧盟国家中是最为薄弱的,工人入会率低。它们在政治变革和经济转轨时期,要面对经济私有化、工业重组和劳动市场非规则化的急剧变化,面对20世纪90年代初期尖锐的经济危机,这是很不容易的。最近几年,经济形势的好转和加入欧盟前法规的一体化为加强这个地区的工会运动开辟了前景。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新自由主义的推行在欧洲劳动领域的反映是:高失业率,临时性、流动性及其他不稳定的工作增多,劳动关系新形式和非正规劳动的扩大,集体合同谈判力度的缩小和劳动关系个人化的倾向,旨在削减社会保障权利和福利待遇的劳动立法改革等等。很明显,工会正面临着一系列不利因素,有些因素直接影响着工会入会率、工会行动和集体谈判。

最近几年欧洲工会联合会(以下简称欧工联)总的发展趋势是会员减少。会员变化的趋势也不是一样的,最近四年中,会员减少的国家是德国、奥地利和北欧四国。在过去20年中,会员流失最多的是英国和德国的工会。

在会员减少的问题上,除女工和青年工人入会率低外,还有两个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即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劳动者和移民工人参加工会的问题。现在相当一部分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工作的是排斥在社区之外的移民,大多数移民没有合法的居留证。而工会在非正规经济部门进行工作需要得到公共部门的允许,在移民特别是无证移民的劳动者

中工作更是困难,因此对这两个群体展开工作更应引起欧洲工会的关注,要比现在做更多的事。

当前还出现了一种改革集体谈判立法的图谋,就是要摧毁产业集体合同,推崇企业集体合同,灵活执行集体合同,并使集体合同的部分内容空洞化,以达到使劳动关系分散化和个人化的目的。这必将影响工会联合模式的基本形式之一——产业工会的活动能力。

近年来欧洲工会的罢工斗争

进入本世纪以来,欧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发出的政治信号是向右转,由于经济增长的下滑和随之而来的公共赤字的再现,各国纷纷采取了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的措施。欧洲组织,首先是欧盟经济和财政部长理事会(ECOFIM)以及欧洲中央银行,不但不为在欧盟范围内促使经济反弹、协调各国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采取行动,反而为各国政府削减社会福利帮腔,将其吹捧为“进行结构改革的必要之举”。

在大多数提出这些强硬改革的国家,工会的反击也是有力的。有6个国家举行了总罢工。2001年是希腊,2002年是意大利,2003年是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意大利。

在希腊、奥地利和法国,发动总罢工的起因是反对削减公共退休制度的退休金。在意大利,总罢工和全国性大规模示威游行是为了反对修改解雇法和反对修改养老保险制度。在西班牙,《失业保护改革法》的颁布影响了对失业者的保护及其利益,因而引起了2002年6月20日的总罢工以及随之发生的示威游行。在葡萄牙,工会则是强烈反对全面修改劳工法,这种修改涉及劳工法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危害到工会的集体谈判权利。

至于总罢工的结果,只有希腊和西班牙取得了明显胜利,在其他国家,政府只承诺进行部分改革。

在叙述这些总罢工时，还应加上 2004 年初德国工会在五金工会和服务业工会推动下举行的各产业总行动，该行动是为了争取签订各产业的全国性合同而进行集体谈判，其目的是反对资本家全面推行集体谈判分散化模式，保护全国性产业集体合同。最后总行动取得了胜利。

从这些罢工斗争可以看到，欧洲社会模式在欧洲各国正在受到不同程度的侵袭，欧洲工会正在各国范围内进行自卫斗争，以避免削弱它们福利国家的社会劳工权利和社会保险制度。

开展这项斗争是困难的，欧洲工会运动在实践中和在发展欧洲社会模式时需要一项欧洲战略，需要建立关于劳工和社会基本权利的欧洲框架。在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前提下，没有别的路可走。当然这种战略应永远扎根于各国牢固的实践中。

欧洲社会模式的推行也取决于经济模式的生产率和竞争力，取决于现有的确保有足够公共收入的累进税收政策，以便强有力地支持各国的和欧洲的公共政策。当前缓慢的经济增长加上“财政倾销”的作用使欧洲社会模式难以为继，这是问题的主要困难和政治症结所在。建立在保持福利国家基本福利相容水平上的欧洲财政平衡应成为欧工联和欧洲工会运动的中心要求，欧洲工会要专心致志地实现里斯本战略确定的目标，也要实现不下调的财政平衡。

联系上面所述，需要对怎样维持依赖于社会分摊保险税的公共社会保险制度进行反思，首先是养老保险制度。工会不应停留在维持社会保险制度的某一水平上而不考虑社会保险制度未来的社会支撑。现在存在着强大的反对现行公共养老保险制度的敌人，他们对公共养老保险制度暗淡的未来作出种种的预言，并且提出发展资本化的私人制度的主张。对此，工会应作出有力的、具有前瞻性的行动，以保证参与任何改革。社会保险制度水平应与财政支撑相一致，并建立以充足、公正和互助为原则的税收制度。西班牙工会在这一领域获得的参与力是它的主要成果之一。

欧工联的现在和未来

欧工联自 1973 年 2 月 8 日在布鲁塞尔成立以来，一直在世界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今天，它的会员包括 34 个国家的 76 个总工会，11 个欧洲产业工会联合会，共 6000 多万会员。在欧洲共同市场逐步发展到拥有 25 个会员国的欧盟的同时，欧工联也从各国总工会的协调机构转变为超国家的工会联合会。

欧工联在政治和组织上取得巨大进步的阶段是在 1991—2003 年，这一时期与欧共体建立统一市场与统一货币时期相一致。1992 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 1997 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建立了为以后年代采用的推动社会对话的机制。1994 年的法令允许在共同体范围内建立欧洲企业委员会。2001 年 12 月布鲁塞尔—雷肯峰会确定了欧工联、雇主组织、欧洲委员会参加的最高一级欧洲三方社会对话机制。在这一阶段，欧工联也采取各种行动以促进欧洲工会的一级性，在重大的欧洲峰会前夕都发表欧工联的欧洲声明以表达自己的建议。

1999 年赫尔辛基欧工联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欧工联的组织机构和章程。该次大会通过了工会方针政策，包括通过社会对话建立欧洲框架内的劳动关系，协调欧洲企业集体谈判。2003 年的布拉格欧工联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有两个基本问题没有提交给其会员组织讨论，一是是否要在欧洲一级范围内进行集体谈判，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用什么机制；二是是否要通过欧洲社会对话，建立欧盟整体劳工和社会立法框架。这两个问题之所以没有提出讨论，是因为担心欧工联会因此发生分裂，领导机构对这两方面作出的反应是积极的，但考虑到它可能不利于团结更广泛的大多数，因而主张先采取推动这两方面前进的具体措施。

当然，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欧洲工会运动，与推进欧洲政治一样，需要耐心和创新精神。要考虑到欧洲正处于一个特别重要的时刻，而欧洲劳工和工会也处于一个特别重要的时刻，

要保持清醒头脑和创新力来抓住主要问题。本文已对在各国内工会采取自卫行动、反对进行劳工和社会改革的后果作了论述。另一个隐约可见的危险迹象是，在欧洲范围内欧盟雇主协会（UNICE）不愿进行制定欧洲劳工法律的社会对话，在紧张的会谈后欧工联提出的社会对话计划（2003—2005）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只有对远程工作问题达成自愿意向的协定。看来欧盟雇主协会只想在自愿意向范围内和通过企业社会责任途径来进行活动。这就产生两种危险。一是用自愿意向性协议替代有约束力的协议。另一种是通过企业社会责任这种手段来取代正在缓慢进行的建立欧洲劳工立法的进程。

欧洲工会运动应对此采取更为明确的立场，无论在创造欧洲劳工和社会立法方面，还是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都要下功夫，要知道在每个领域，在某些环节和某个具体问题上应关心什么、不关心什么。只采取守势、疑心重重是无济于事的。在有相关法律和集体合同的国家，企业社会责任应扩大企业对工人、股东和整个社会的承诺。在世界范围内那些没有相关法律、没有劳工法庭，国际劳工公约还不能起作用的地方，企业社会责任的文件作为企业意向性的协议和行为准则，能为在跨国公司中的工会活动起到重要作用。在欧洲，从得到政府支持的雇主立场出发，引入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是为阻止建立欧洲劳工立法框架推波助澜，欧工联及其主要工会对此应该态度鲜明，有所作为。

当前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欧工联和欧洲雇主协会就企业重组过程事宜无法达成一项牢固的协议。2003年的会谈和会谈纪要对企业重组过程没有达成足够的共识。全球化对现阶段的影响和跨国公司在全球化中的作用使工会在企业重组中有许多工作要做。欧盟扩大就遇到企业外迁问题。欧工联和欧洲各产业工会联合会应要求只在欧洲范围进行企业外迁。

不管是工业变革和企业重组，还是为企业范围内的欧洲集体谈判打开道路，重要的是及时启动工会参与、信息和咨询机制，并扩充它

的应用范围和更好地利用这一机制。欧工联应在修改欧洲企业委员会法令方面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以扩大它的职权，更好地进行活动，要通过产业工会联合会发挥的作用使企业委员会工会化，从而有利于企业集体合同的谈判。正如欧工联2003年12月执委会通过的决议指出，要把1994年建立企业委员会的法令同以后颁布的两个法令相联结，一个是2001年欧洲委员会对于欧洲公司章程关于工人参与的补充；另一个是2002年欧洲委员会关于在欧共体内建立有关工人信息和咨询的总框架的法令。欧工联和它的产业工会联合会在修改欧洲法律的同时，还应制定行动计划，就企业重组过程达成欧洲框架协议。

作为现实主义者，从布拉格代表大会产生的欧工联领导班子在其四年任期中，可能要不断阐明我们欧工联在建设劳动关系欧洲框架中要走向哪里。这就需要开展讨论。与此同时，要在两条战线开展行动。总的方面是要加强各国集体谈判与欧工联有关机构的相互协调；在产业方面，要推动产业社会对话委员会的运作。要分析产业社会对话委员会的潜力，引导它们走向达成产业协议的集体谈判。就是要把产业社会对话委员会作为走向欧洲产业集体谈判的起点。

在未来几年，欧工联应关注的另一个领域就是它的对外关系。要关注它的会员组织参加的国际工会组织间的关系与竞争，关注没有固定的地理范围的跨国公司工会进行的行动。另一方面也要非常关注欧盟与世界其他地区——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欧洲地中海区域组织等发展联系。欧工联和上述地区工会组织能在联系中就有关社会和劳工方面的内容发挥作用。欧工联也应直接参与到国际自由工联和世界劳联的统一进程中去。■

[毛禹权：中华全国总工会]

（责任编辑 周艳辉）

土耳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败及其替代方案

[土]厄·奥尔汉卡兹 著 刘志明 摘译

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杂志2002年冬季号刊登了厄兹居尔·奥尔汉卡兹题为《土耳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败和可能的替代方案》的文章，认为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通货紧缩和稳定”计划后，土耳其的经济体制日益脆弱，并最终导致IMF计划的破产和2001年土耳其经济的严重危机。本文还提出了一些将有助于土耳其经济增长、就业增加和收入分配公正的替代性政策和措施。文章主要内容摘译如下。

直到2000年12月，土耳其一直赢得了国际金融分析家们和IMF对它稳定化经济政策的交口称赞。但是，在2000年11月那一次小的金融波动之后，在执行IMF指导的“通货紧缩和稳定”计划一年后，土耳其在2001年开始陷入灾难性的危机之中。

对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989年金融自由化以后，土耳其的经济增长一直缓慢，非常典型地呈现出那种经济大繁荣之后的不景气局面，它的平均增长率相当低，而经济不稳定性却很高。关于土耳其经济不稳定的问题，主流分析一致认为，公共部门的赤字居高不下乃是导致危机情况出现的最终原因。的确，至少从表面上看，经济指标似乎证实了这一判断。不过，这种判断却忽视了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金融自由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土耳其严

峻经济形势的背后有它们的影子。

仔细审视土耳其经济发展形势可以看出，新的分配政策最初导致了土耳其公共部门金融问题的产生。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管理方面的一项基本政策就是致力于减轻资本的税收负担。这导致了国家税收收入的减少，然而开支却不可能以同样的比例减少。另外，国家被利用来充当收入转移的直接工具，收入转移的形式是国有银行敞开大门对资本家提供贷款。

1988—1989年间，工人们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工人们通过声势浩大的抗议提高了自己的实际工资，而1989年大选期间人民的压力导致土耳其大幅增加基础性的社会开支，这样它的公共债务开始失去控制。国家本来可以通过选择增加对资本的税负这一措施为新增的开支筹措资金，但是，一味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以及鼎力支持它的资本家集团，都不允许采取这类具有进步意义的财税政策。于是，政府只好在放松金融管制中寻找解决之道，以便把外国的短期投资吸引到土耳其来，同时也使迅速发行公债成为可能。

放弃资本管制以后，流入的短期外资为土耳其的公共债务提供了资金，与此同时也扩大了进口和消费总量。这种政策是执行国际金融机构主张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其想法是：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以及土耳其的政府债券可以确保土耳其有险无虞。

只需简略看一下土耳其国际收支平衡表

上的资本账户，人们就不难发现，土耳其的经济自1989年开始就一直依赖短期外资的流入。土耳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也依赖于短期外资的活动情况。尤其是1993年以后，土耳其经济形势总体显得极不稳定。更为重要的是，在土耳其经济中，每年的投机资本总量都超过了它实际产出的价值总量。这无疑表明土耳其经济受到了投机资本的威胁。另一方面，我们不妨看看土耳其最近15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它大概只有77亿美元，而仅仅在1999年这一年，土耳其私营企业（银行除外）的长期借款总额就有这么多。

与此同时，银行对它们的资产管理进行了改革，从直接贷款转向购买政府债券，利用先从国外借款、然后再贷给国家这种方式谋利。1980年以前，银行业的总贷款额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平均超过15%，只是到1996年，这一比值才达到了20%，1997—1999年间，这一比值平均起来大约为20%。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一比值平均起来只不过略微超过了金融自由化以前的平均值。另一方面，虽然高利率以及日益高涨的公共部门的借贷需求使土耳其的银行业容易受到金融投机行为的冲击，但是，自从金融市场完全自由化以后，土耳其银行业的利息收入和利润却大大地攀升了。1988年到1999年这段时间，对土耳其国内的私营银行和它境内的外国银行来说，无论是税前的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还是税后的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几乎都翻了一番。

2000年：稳定通货的意图及其失败

1999年末，土耳其政府宣布了一项由IMF指导的以汇率为基础的稳定经济的雄心勃勃的计划。这一为期三年的稳定经济计划的主要目标包括到2000年末使综合消费物价指数下降到25%，然后，再分别使之下降

到12%和7%。这一计划建立在这样三个支柱上，即通过紧缩的财政政策和完成“结构性改革”增加财政盈余；推行一项与通货膨胀目标一致的收入政策（根据前瞻性的物价调整来征税）；通过宣告货币贬值率和限制货币发行来降低通货膨胀率。利率完全由市场决定。

该计划最初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这一点在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和利率的降低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1999年的经济萧条后，2000年土耳其经济呈现一派复苏的景象。尽管土耳其的国内需求也一度恢复起来了，但是，它却主要是通过进口消费品和以前积累下来的存货得到满足的。因此，在土耳其的工业生产中，并没有充分反映出它的国内需求恢复这一点。2000年上半年非常稳定的经济形势引起了消费需求的增长，不过，消费需求的增长主要是因为私营业主们对通货膨胀和利率回复到以前的高水平抱有期望，也就是说，正是对未来的怀疑推动了消费。

一、危机之路

2000年以前，土耳其已经推行了IMF的16项稳定经济的计划，但是，每一项计划却并没有相应地导致稳定。而且，在计划执行时期届满以前，其中的8项计划就被取消了。这段令人不快的历史大大降低了人们对土耳其政府和这些稳定计划的信心。

然而尽管有人仍然竭力主张以汇率为基础的稳定经济计划，一些铁的事实已经显示出危机可能因为贸易和经常项目收支平衡的恶化以及土耳其货币的升值而爆发。关于以汇率为基础的稳定经济计划，我们能概括出如下一些清楚的事实：1. 通货膨胀率逐渐趋向于汇率中的变动率；2. 经济活动随着稳定经济计划的实施而扩张；3. 本国通货实际升值；4. 贸易平衡和经常项目平衡情况恶化；5. 消费和投资情况的好转有赖于产出的扩张。因此，虽然不能说这一计划本身不是危机，但是它无疑蕴藏着危机的一个警报。

1. 短期利率波动极大

2000年全年,土耳其的利率波动极大。因为国内货币净投放被严格根据这一经济稳定计划进行管理,土耳其利率的确定因此完全依赖于外资的进出,土耳其短期利率的变动也取决于外汇流进流出的变化情况。如果我们把隔夜利率的标准差异当作利率变化的计量标准,那么,这一数字从1999年末的0.04增加到2000年6月的11.67,8月的16.90,9月的14.05和12月的238.97。

2. 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之比

2000年,短期外债与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的比值有显著的增长。2000年8月末,这一比值达到了1.1,2000年末,则更进一步达到了1.44,这一数字高于危机前相应时期的马来西亚(0.61)和菲律宾(0.85)的水平,大体与亚洲金融危机前的泰国(1.45)持平。人们也注意到,短期外债与出口总额的比值情况也同样地恶化了。

3. 经常项目赤字

2000年全年,经常项目赤字与外汇储备的比值以及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一直在不断地上升。经常项目赤字与外汇储备的比值,从1999年末的5.9%攀升到2000年6月的27.7%。经常项目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也从1999年末的0.7%攀升到2000年6月的3%左右。

二、危机

2000年11月22日,土耳其银行业出现爆炸性的危机,随之而来的是资本大规模的抽逃。引发这一危机的是针对10家私有银行的倒闭而展开的犯罪调查。因为害怕土耳其可能会出现更大范围的银行危机,外国投资者们因此都退出土耳其的短期国库券和短期证券。这反过来又导致土耳其清偿紧张。随着担忧情绪的扩散,甚至连健康运转的银行也开始停止借贷,导致利率剧升,股票市场狂跌。土耳其中央银行也不得不暂时搁置其国内货币净投放的目标,转而向金融市场

投放大量的流动资金。只是在IMF宣布在世界银行50亿美元紧急援助基础上再追加100亿美元后,资本大量外逃的局面才停止出现,人们的恐慌情绪才得以消除。

三个月以后,土耳其总统与总理之间的争论又引发了一次新的危机。仅仅在2001年2月19日这一天,紧张不安的投资者就从土耳其提走了50亿美元的资金。土耳其中央银行不到2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一时之间面临被提空的危险。而且,土耳其政府本身为应对赤字而筹集资金的能力,也因为极为荒谬的高利率而受到威胁。因为试图维持住汇率管理制度,土耳其的短期利率飙升了几十倍。固定汇率制度的废除,立即导致了土耳其里拉的大幅贬值,土耳其里拉兑换美元狂跌了30%。

土耳其增长率大约为8%,年通货膨胀率超过80%,IMF指导的经济政策的破产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更加重了。仅仅在2000年1月至9月期间,就有14540家公司和几乎20%的小店主破产。债务总额(内外债)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从2000年的75.8%上升到2001年的88.5%。土耳其国内债务的年利率,很快就从2000年末的38.1%飙升到了2001年1月的65%,二月危机后,这一数字更是超过了120%。与此同时,债务的平均到期天数从411天降为155天,接着再降为30—60天。这导致土耳其的国内债务猛涨。我们粗略估算,这次危机使土耳其内债增加450亿美元,外债增加224亿美元,土耳其的国民所得也因这次危机而损失了520亿美元。据估计,IMF指导的计划的失败,土耳其遭到的损失几乎达到了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80%,或者说土耳其几乎人均损失了1800美元。

果真“没有替代”?

与IMF签订第17次援助协议的失败明显地表明,IMF型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不能为

土耳其的经济带来稳定,相反,将带来更为严重的灾难。不幸的是,这都没有使土耳其经济决策者改变其新自由主义的旧思想。两个月后,土耳其的新任经济部长凯末尔·德尔维希(世界银行前副总裁)宣布执行一项得到IMF官员们支持的“新”的经济稳定计划。“新”计划其实并非什么新货色,只不过是以前那些计划的重复而已,是IMF提倡的那些政策和一些技术性的改变的大杂烩。嘴里满是新自由主义辞令的人宣称该计划是土耳其唯一的选择。但是,却另外存在可以选择的替代性政策。

只有以工业化和实际生产增长为基础,加上激进的公共金融改革才可能实现健康的经济增长。那些靠债权获利的政府债券持有人大都并非同时又是纳税人。土耳其偿付的利息款占其税收收入的80%。因此,债务问题中也潜藏有重大的利益分配问题,它也能反映出不同集团的政治利益。在这一点上,为了减少土耳其财政和国民经济因国内债券而招致的损失,应该认真考虑采取“债务清理”的政策。债务清理,我们指的是这样一种安排,即延长债务期限和减少实际的利率负担。

拖欠或合并国内债务是短期内可以选择的两种政策措施。从长远看,我们仍然需要设法为国家预算和债务的清偿筹集资金。债务货币化则是另外一种为预算赤字筹集资金的可能的途径。很明显,这里的货币化是指“公债的筹钱术”,换句话说,就是指为了解决公债和预算赤字的问题,由中央银行提供资金给财政部。

使政府开支货币化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有助于使分配问题变小。不过,它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和汇率问题,这反过来会影响收入的分配。这种货币化有两种造成通货膨胀压力的途径。第一,通过通货膨胀为政府开支筹集资金的观点将增加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第二,当通货膨胀超过名义上的生产增

长率的时候,将会出现通货膨胀的压力。1996年,梭利内斯(Sollenius)就曾经提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的几种不同方法:1. 通过增加准备金尽量平衡货币化的负面影响;2. 放开政府债券销售市场,从而使中央银行可以从各地方银行的储备中得到一大笔强力货币。强力货币总额会因此而减少,货币供应也会因此而减少;3. 有选择性的信贷控制能鼓励计划经济部分的生产能力,同时又能有效地抑制信贷总量的膨胀。从管理着手,对给私营企业贷款进行各种限制。信贷控制将不仅有助于降低债务货币化后通货膨胀的各种负面影响,也有助于一个更有普遍意义的以促进特定产品增长为目标的宏观经济计划的实现。

为了战胜当前经济萧条的局面,为了使工业生产及其能力得到长足的发展,也有必要采取积极的经济扩张政策。鉴于数额巨大的预算赤字和土耳其的税收结构,不应该考虑通过削减税收来刺激私人消费或投资的政策。在土耳其,既然私人消费的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进口得到满足的,那么,以刺激私人消费为导向的经济扩张计划无疑将不会最大限度地产生乘数效应。而且,这种经济扩张计划还面临只增加需求而不增加供给的风险。另一方面,以推进私人投资为导向的经济扩张政策措施是无力的和间接的。诚然,中央银行能够围绕短期利率做文章,但是,这却不见得必然就会导致长期利率的下降。而且,最近的经济研究也表明,乘数效应、利润和现金的周转效应比利率变动效应和其他资本成本效应更为强有力。

公共开支却有这样一个好处,就是决策者能把经济扩张中的进口渗漏作用(指经济扩张对国内经济的改善作用由于进口太多而受到削弱。——编者注)降低到最小程度,因而能加强其乘数效应。以公共投资为导向的经济扩张计划有这样一个优点,就是它能在短期的经济扩张和生产能力的长足发展之

间建立强有力的联系。农业部门的基础设施计划(灌溉系统和农村公路建设、生产技术的改进等等)也可能是公共投资进军的领域。最后,有助于降低成本的公共投资计划也将对私营企业的投资热望产生有利的影响。寻租和腐败可以通过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主责任制形式而得以避免。比如,公共投资最初可以集中投资于那些规模小、劳动密集型的项目(扩大教育和医疗),这些项目会为有效的地方控制创造条件。

金融自由化以后,土耳其经济受到投机资本的投机活动破坏的事实,大危机期间总是有资本大量外逃的事实,都表明很有必要对资本进行控制。而且,为了防止出现金融不稳定的局面,为了防止出现人们不想看到的货币贬值的局面,要保证实行切实可行的债务货币化计划,也必须对资本进行一定的控制。反对者们也许会提出,这可能会导致流入土耳其的资本的减少。但是,实际上由于现今土耳其的大量外资本来就是具有很高波动性的短期投资,土耳其当前的金融体制已经表现得相当糟糕,并没有吸引大量长期投资。

土耳其在执行能经受考验的经济扩张计划的过程中,另一个可作为经济稳定器的工具可能就是证券交易税。新税制应该优先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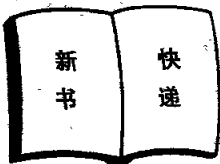
虑对那些非生产性活动征税。“非生产性活动”可以被定义为“非生产性的直接寻求利润的活动”,这些活动对于私人也许有利可图,然而却并不增加货物和服务的流量。证券交易税既增加税收收入,又能通过提高从事金融资产交易的成本打击金融投机行为。

结 论

2000年11月的危机和2001年2月的危机,导致土耳其的经济极为萧条。我们在本文中坚持认为,这种萧条和土耳其经济当前存在的问题,是土耳其执行IMF指导的政策后金融体制日益脆弱所带来的后果。我们也证明存在克服这些问题和确保土耳其经济长足发展的替代性政策措施。当然,谁在谁的政治支持下实施这一项替代性方案,这一问题需要通过政治实践来回答。■

[厄·奥尔汗卡兹: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系;刘志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00级博士生]

(责任编辑 刘元琪)



《全球化之谜:资本主义新阶段的历程》

The Enigma of Globalization: A Journey to a New Stage of Capitalism,
Robert Went, Routledge, 2002.

从理论上,全球化在本书中被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作者把我们带入了一个从全球化的起源到今天的现实意义这样一个历程之中。

披荆斩棘：在委内瑞拉构建共同管理制度

行心明 编写

委内瑞拉正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对象，世人意识到委内瑞拉对新自由主义说了“不”！

尽管那些支持新自由主义的人依然说别无替代（TINA, there is no alternative），委内瑞拉却大声宣布，世界上确实存在着替代新自由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

当然，这意味着我们面临许多敌人，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这些敌人指望委内瑞拉在这条新道路上折戟而归；他们尤其希望人民参与其中、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早早夭亡；他们希望这种制度走不出社区、走不出车间便草草收场；他们希望人民参与、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归于失败；他们希望那种由人民集体决定自己的需要和生产活动的思想无法实现。

但是，我认为，最能令这些敌人拍手称快的是委内瑞拉在推行共同管理制度（co-management）的过程中半途而废。因为，工人阶级——尤其是拉美的工人兄弟——正开始关注我们共同管理制度的进展情况，他们将其视为资本主义工厂压迫制的真正替代模式。

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可能会令一些人觉得刺耳。但是，我不得不向你们坦言：对许多资本主义企业里的工人来说，将企业所有权和决策权一并收归国有的做法，并不是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真正替代模式。我父亲是一名机械师，他认为，国家所有制不过是给工人强加了一个

更大、更有力的老板而已。我从来没有能够说服他改变这种看法。他追求的是逃走，是摆脱工厂。

然而，工人管理的确是一种真正的替代模式。如果我们的共同管理制度取得成功，全世界工人阶级将为之欢欣鼓舞；如果我们失败了，资本的统治将得以加强，同时向工人兄弟传递的信号将是：别无替代。

为什么选择共同管理制度？

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那就是，委内瑞拉实行的共同管理制度完全不同于此前德国采用的所谓的共同管理制度。虽然很久以前，这种管理制度也曾一度反映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但最终还是蜕变为共同选择制（co-optation）。德国的这种制度允许工人代表参与资本家决策过程，将其作为把工人纳入资本家事业的一种途径。这样，就将工人与他们的代表分离开来，使工人对自己所在的资本主义企业产生一种认同感。而在委内瑞拉，我们实行的共同管理制度则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共同管理制度的核心是要终结资本主义剥削，为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性社会创造条件。如果工人不再受资本的生产利润的逻辑的驱使而被迫为资本家劳动，那么劳动的性质将彻底改变。工人通过相互合作可

以更好完成生产任务，他们可以运用自己的知识改进生产方式，在现在或将来提高生产力，还能够在工作场所终结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裂。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切，是因为工人意识到，在共同管理制度中他们不再是为资本家的富有而劳作。工人参与生产活动的决策，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有机结合起来，这就为整个工人阶级开发潜能、施展能力提供了可能性。这种社会是一个鼓励人类全面发展的社会，也是《玻利瓦尔宪法》构想的社会形态。如果在生产活动中不能发挥民主、让人民以主人翁姿态参与其中，人民就会仍然处于一盘散沙的不正常状态，而这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生产过程中的民主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一个必备条件，是21世纪社会主义的一个必备要素。

为什么不称之为“自我管理”？

南斯拉夫曾将其工人管理企业的制度称为“自我管理制度”（self-management），这表明工人并不需要资本家：企业由工人通过工人委员会进行管理。

但是，这种管理方式也存在着问题。诚然，在这种管理方式中，也是由工人决定他们企业的发展方向，但是，工人最为关注的是自身利益。每个工厂中的工人将关注焦点局限于自身利益，局限于各自工厂这个小集体的利益。他们缺少社会团结的意识，缺少服务社会的责任感。相反，他们强调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在某些方面，这种做法类似于最为有害的资本主义神话——“看不见的手”，认为如果每个集体都能围绕自身利益运作，那么整个社会将从中受益。然而，事实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加剧了南斯拉夫的社会不平等，破坏了社会团结，最终导致了国家解体的悲剧。

而委内瑞拉实行的共同管理制度恰恰就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共同管理制度意味着在工人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特殊的合作关系，它强调企业并非仅仅归工人所有。相反，企业要围绕社会的整体利益而运行。换句话说，共同管

理制度并非仅仅要消灭自私自利的资本家，然后以同样自私自利的工人取而代之，它要进一步改变生产的目的。它不仅要为工人，而且要为每个社会成员全面发展其潜能创造条件。每一位劳动者都是共同管理制度的受益者！

在共同管理制度中，谁是社会的代言人？

如果共同管理制度是一家企业的工人与社会之间的合作关系的话，那么在这种关系中将有谁充当社会的代言人呢？最理想的是，经过共同管理制度的改造，生产者自己应当能够代表社会说话。也就是说，在我们将要建立的世界里，在21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对社会需求的认识应当内化为所有生产者的一种素质，应当为所有的生产者理解，生产者与社会整体之间不再存在什么隔阂。

然而，即使在生产者与社会的差别不再代表对抗性利益的理想情况下，依然必须专门确定社会需求，并且这必须是一个民主的过程。生产者以公民身份参与这一过程，以主人翁姿态民主地发挥作用。这种将生产中的民主与社会上的民主相结合的做法是共同管理型社会（co-managed society）亦即21世纪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

但是，在实行共同管理制度的初始阶段，这种做法是否可行呢？在民主的生产者与社会之间结成的这一合作关系中，将由谁为社会代言？一直以来，我们肯定会异口同声回答：社会只有通过民主制度这条惟一的途径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样的话，如果企业（比如电力企业）只为某些社区服务，就可以由社区中的民主团体确认社区需求，并就这些企业如何满足这种需求提出建议。这种做法同样适用于为全社会服务的企业，也就是说，首先确定社会需求，然后工人可以确定如何生产才能更好地满足这种需求。

自然，社区规模越小，就越容易找到民主的、社区成员广泛参与并发挥主人翁作用的解决方案。然而，即使是在规模上相对较小的社

区，就像共同管理制度的发展一样，生产者自我治理（self-government）的发展也有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学习过程，是一个通过实践、通过参与者的转变而不断丰富过程。

至于那些关系整个社会、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应当确保真正代表社会利益的中央政府在民主化过程的结尾阶段，而不是初始阶段参与进来管理它们。由于这一原因，由全社会尽可能充分地讨论对特定企业的期望就非常重要。如若不然，那些企业中的工人又怎能明白这些企业的生产目标的确定是社会共识的结果，而不是由企业负责人或者政府部门武断指派的呢？

如果生产者自信他们所作的决定、所从事的工作因满足了社会需求而十分重要，那么，他们就可以超越以市场回报作为产品价值衡量标准的局限，就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满足社会需求。衡量工人与社会之间这种合作关系成功与否的标准，是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玻利瓦尔宪法》第 102 款规定的目标，即“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开发每个人的创造潜能，充分施展每个人的个性”。

实行共同管理制度过程中，矛盾在所难免

明白下面这一点很重要，即在采用共同管理制度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矛盾。

在改造生产关系的过程中，主要的危险是旧思想和熟悉的模式会渗透进新的生产关系，使之徒有其名。这也是新的生产关系被扭曲、失信于民的原因。比如，有人认为，为了维护国有企业工人的利益，应当给予他们企业股份。可是，不论由工人个人还是由工人合作社掌握股份，都会把共同管理制度扭曲为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私有制。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不是从社会角度出发考虑问题，不是将自己定位为与社会进行协作的生产者和社会一员。相反，他们已经蜕变为以增加自己收入为首要目标的私有者。

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大多数劳动人民在普

通部门和非正式部门工作，一部分工人在相对有特权的部门工作，这两个部门的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反差极大，那么其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被视为特殊工人群体的私有财产的思想不仅会导致共同管理制度遭到拒绝，而且很可能破坏反自由主义、反资本主义伟业的团结。

只要这些关系不转变为真正的共同管理制度的关系（作为生产者的工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关系），就不难预见必将出现以下两种趋势中的一种：第一，通过合法手段或者制造既成事实，将国有财产转化为特殊工人群体的私有财产；第二，恢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工人降格为持有股份的雇佣劳动者。不论出现哪种情况，共同管理制度的理念都将失信于人。

可以在具有战略意义的部门冒险采用共同管理制度吗？

推行共同管理制度的最初几步会引发许多矛盾，前面列举的只是一个例子罢了。此外，一些人担心，共同管理制度不适用于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

显然，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比如国家石油公司，不同于其他企业。社会肯定希望这些企业围绕社会的整体利益运作，这种期望合情合理。并且，这不仅仅只是一种期望，社会有权向这类企业明确自己的需求。比如，今年我们的需求量是 X，明年需要在此基础上增加 5%。换句话说，对于那些影响到每个社会成员、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需要为其制定目标或计划来指导生产活动。一旦社会需求得以确定，在如何满足这些目标的决策过程中，为何不让这些企业中的工人充分参与其中呢？为什么不让联合起来的工人决定如何进行生产呢？为什么非要假定这些企业中的工人的利益有悖于整体社会的利益呢？

在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如果你不相信工人能够作出正确决策，那么等于说你希望工人继续扮演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扮演的对抗性角色，希望他们专注于提高工资的斗争（由于他们所在部门和所从事的工作十分重要，他们要求享受最高的工资待遇），专注于争取更

多的好处和特权，同时降低劳动强度、缩短劳动时间。实际上，这种观点是在强化旧社会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不知不觉之间破坏了构建新社会的努力。说句实在话，如果21世纪的重大抉择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作出，而不是共同管理制度或社会主义，那么你将作何感想呢？

在构建共同管理制度的道路上，出现矛盾在所难免，然而，没有共同管理制度，就没有革命。

最大的危险

每场革命最为重大的难题之一，就是区分革命支持者之间的矛盾和革命的支持者与革命敌人之间的矛盾。推行共同管理制度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不一而足：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之间、被剥削者和被排斥者之间、工人与农民之间、合作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都会出现矛盾。一个最为致命的错误是，将人民之间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变为敌我矛盾。这种错误将扭曲甚至葬送革命！

那么，如何才能避免犯将革命的支持者变

为革命的敌人这样的错误呢？我们可以通过民主讨论、劝说以及教育的方式做到这一点。最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要从维护团结的愿望出发开展工作。

我们必须认识到，推行共同管理制度有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有这么一个核心概念，那就是人类在实践中发展，这一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道理，即共同管理制度将改变人民。经过一个时期，它产生出这样的人民，他们认识工人与社会之间这种特殊的合作关系可以建设一个新型社会。这种认识将有助于我们容忍他人在初始阶段所犯的 error，也有助于我们进行自我批评。在这一过程中，互相尊重是共同管理制度成功的条件之一。

对玻利瓦尔革命的敌人的最大打击，莫过于共同管理制度的成功。■

[行心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 徐洋)

(上接第19页) 正视其深层的理论前提和阶级对抗性，那么合作的潜在可能就是危机重重的。绿色和平运动就是个例证。对现存结构关系的接受使得绿色和平组织削弱成为这样一种组织工具，它很大程度上只是关注短期的胜利，而对全局性或意识形态的问题没有什么兴趣。狭窄的事业范围大大危及绿色和平组织的行动。

问题的一部分必须归咎于新运动的理论家和积极分子们没有理解，将经济力量从分析的首要位置抽离出去并不意味着阶级因素就可以被忽视或被抛弃。

布克齐在其《重塑社会》中断言：“社会中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的基础本身应该以革命的方式来面对和解决。地球不再是私有的，而是分享的。”这种观点代表了一种关于生态社会的激进看法中的真正重要的方面。令人困惑

的是，布克齐并没有从他自己激进的结论中传达出必要的暗示。地球的控制权和所有权问题就是阶级问题。

随着与自然相关的冲突进一步加深，并且由于各种生态社区的进一步被破坏，以至打着所有权旗号对自然的掠夺变得更加非法，从而产生了更大规模地动员起工人为了共产主义的复兴而投入到一种多样而统一的斗争中来的可能。正是从一种异中求同（社会的和生态的）立场出发，一种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更新、更丰富的理解必然产生。通过沟通和结成联盟，作为环保主义者的工人（实际上也是作为工人的环保主义者）将增进对阶级斗争的理解。■

[单提平：北京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 周艳辉)

委内瑞拉共产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徐洋 编写

德国的共产党《我们的时代》周报在2004年2月6日的一期上摘要刊登了德共主席海因茨·施特尔（Heinz Stehr）2003年12月访问委内瑞拉共产党时与委共国际部书记卡洛鲁斯·温默尔（Calolus Wimmer）之间的谈话。温默尔介绍了委内瑞拉目前的政治经济形势和正在发生的玻利瓦尔主义革命（die Bolivarianische Revolution）的进程，阐述了委共在这一革命中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下面是谈话的主要内容。

施特尔：截至这个月，胡果·查韦斯上任已经五年了。目前的形势如何？

温默尔：对于人民，对于工人阶级、农民和穷人来说，目前的形势相当好。我们生活在一个阶级斗争剧烈的时期，我们面临着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某些军阀以及反对党的挑战。

施特尔：能不能具体谈谈。

温默尔：我们建起了一个新的共和国，我们称它为第五共和国。由此我们与过去的历史划清了界限。我们通过全民公决确立了一部新宪法。最重要的是参与性的民主制大大加强。我们阻止了委内瑞拉倒退回总统制的民主制，因为后者意味着一切都是在没有人民参与的情况下决定的。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土著人民即委内瑞拉的原始居民，第一次在宪法中，在这个社会里，拥有了自己的位置。土著居民第一次在议会中有了直接选出的代表。值得强调

的是妇女在这个革命进程中的角色。妇女的权利第一次在宪法中固定下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部宪法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妇女在这场革命进程中有了组织性和自我意识，行动积极。例如，在四月政变（2002年4月，查韦斯遭拘禁并得到解救）中，第一次走上街头抗议法西斯主义政变的游行示威活动就是由妇女发动的，随后男人和部分军队才参加进来。妇女在这一革命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党是通过玛丽娅·莱昂同志——她是国家妇女研究所的主任——来执行领导革命的妇女运动这一任务的，这对我们共产党来说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任务。这里也体现了查韦斯总统对我们党的信任。

施特尔：如果委内瑞拉的这一革命进程要进一步发展，那么目前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温默尔：最大的挑战是，为人民创造新的可能性，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斗争必须给人民一个具体的结果。这也是群众的要求。

施特尔：这是否意味着，对最贫穷的人口来说，迄今还没有出现可以称为革命成果的物质改善？诸如改善营养、免费的医疗预防措施以及类似的东西？

温默尔：每天都有进步。我们在革命进程中得到了人民的支持，特别是工人阶级、农民、青年和妇女的支持。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取得了具体的成果。

但是，我们革命者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政绩，我们必须看到，广大居民还深陷贫困

中。过去四十年的“假”民主对国家、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例如对医疗保障，对教育事业，差不多80%的人口被排斥在外。我们现在有很多事要做，有很多东西要弥补。五年之内当然不可能完成。因此，我们不应当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目前，在教育事业方面，我们建立了玻利瓦尔主义的学校，我们已经做到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到提供食物、医疗、文化和体育的全日制学校去读书。在卫生事业方面，我们在古巴医生的帮助下，力争做到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医疗照顾。我们国家的人口每年增长一两百多万，要完成上面的任务是很困难的。现在我们拥有2500万居民。但是开头的工作我们已经做了。现在的新气象是，人们不是在那里坐等政府解决什么问题，而是亲身参与解决问题。当然其中也不是十全十美。

施特尔：你认为反对派要求解除查韦斯职务的全民公决提议有多大的机会？

温默尔：反对派的机会是零。我们确信，所谓的人民请愿其实是玩弄骗局。可以证明，有些人签了許多次字，许多“死人”也签了字，还有一些伪造的签字。但是决定权自然是掌握在选举委员会的手里。在经历了四月政变，经历了企图通过企业主“罢工”、石油业的“怠工”、抽逃外汇等手段搞垮经济的图谋之后，我们有信心以更大的优势赢得任何一次人民请愿和选举。人民中的大部分都越来越清楚，反对派不可能提出什么真正的民主。

施特尔：你在我们谈话开头时曾说过，共产党的责任和作用非常重要。社会变革的进程才刚刚开始。今天委内瑞拉共产党的作用和任务是什么呢？在团结互助方面，你们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共产党和左派有什么期望？

温默尔：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数很少的小党来说，认清自己在委内瑞拉革命进程中的责任是非常重要的。在今天的委内瑞拉，我们把力量集中在意识形态工作上。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革命。在这方面，我们是惟一拥有革命的意识形态并将之与实际斗争结合起来的党。

我们集中力量在工人阶级、农民、青年和妇女中做群众工作。委内瑞拉共产党应当尽最大的可能做出自己的贡献。其他的党派拥有更多的议员、更多的资金和其他优势，这些因素在这个革命进程中也是相当重要的。我们党具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广泛的国际联系，这对于目前的政治进程十分重要。我们的党将在这场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我们也同宗派主义政治作斗争。我们当然也要对反共思潮和那种排斥共产党的企图作斗争。共产党在未来必须证明，他们能够应付这一责任的挑战。我们并不是在这一政治进程中“自动”拥有特殊的位置；我们必须证明，我们具有能力。

至于国际团结，共产党有优势，因为它拥有传统的国际关系，首先是与各国共产党和其他革命的、进步的党派的关系。我一直这么说：你们最大的贡献就是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我们。一场革命进程不可能不出现错误，而当人们处于这一进程当中时，是很难看出自己的错误的。局外的人则比较容易看到。

自然，为了同国际垄断传媒作全面的斗争，团结互助是必要的。国际垄断传媒总是在国外对我们的革命进程作负面的、错误的报道，包括在德国。我们期望得到你们这样的团结互助：批评我们，但同时也支持我们。

施特尔：明年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将在加拉加斯举行。你认为我们办好这个联欢节的可能性有多大？

温默尔：我们坚信，委内瑞拉的人民和青年能够面对所有的挑战。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全世界的青年来委内瑞拉并亲身经历委内瑞拉的现实，经历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主义的革命进程。如果我们能够接待全世界的青年人和大学生，那么这就是团结互助的证明。■

[徐洋：中央编译局]

(责任编辑 朱毅)

新帝国主义与民族国家

[美]艾·M. 伍德 著 王宏伟 摘译

艾伦·M. 伍德在2003年10月9日英刊《反潮流》中发表了《资本主义帝国与民族国家：一种新的美帝国主义？》一文，认为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主义尽管基本上是通过世界市场来统治世界，但是由于世界市场结构性的不平等蕴含巨大的动荡趋势，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中心，将不得不强化其政治军事权力，并且将不得不强化各民族国家的统治职能，借以达到操控全球化的目的。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新帝国主义对世界市场的控制

人们可能会说，占领伊拉克是美国对“二战”以来外交政策的偏离。许多批评家就是这样认为的。从表面上看，美国似乎是回归到了老殖民主义的直接统治，似乎与先前避免陷入殖民主义泥潭的行为模式相违背。

但这样的看法是令人怀疑的。布什和大公司丧心病狂，这注定难逃失败的厄运，因为布什正在削弱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即丧失对于盟国的控制。布什当局的右翼极端分子正在以新的、无度的方式部署军事力量。这些方式被证明是缺少可持续性的。但布什并没有背离美国的一向政策，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即使是布什及其身边的右

翼狂热分子也会主张置身于殖民主义泥潭之外，鼓吹回归非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这是由于非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更少风险、更少成本、更有利。如果美国能够以绝对军事优势为后盾、利用巨大的经济力量来统治世界经济，它就没有必要陷入殖民统治的泥潭之中。伊拉克所发生的一切就证明了这点。美国在伊拉克搞得乌烟瘴气，这表明美国并不想要真正长期地占领伊拉克。正如许多人所说，布什当局所希望的只是削弱伊拉克政权、扶植一个听话的领导人以使美国公司在伊拉克牢牢扎下根。

第二个原因是，如果不以历史为背景进行观察，我们就不能从布什的所为中得出什么结论。如果美国在先前的几十年中没有建立庞大的军事实力，布什也就不能像今天这样为所欲为。不错，布什当局不加掩饰地公开其追求不受挑战的全球霸权的意图。2002年9月，美国发表了《国家安全报告》，提出要构建一支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其他国家——不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不能梦想作为全球大国或地区性大国对美国提出挑战。但这与从前没有什么两样。美国以前历届政府可能不是如此地明目张胆。但是，如果这些政府不是原已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布什当局的梦想就无从谈起。而强大的军事力量不可能是在不经意间建立起来的。

布什的政策当然是极端化的和不顾后果的，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布什的政策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们与至少半个世纪以来的美国政策模式相关联。“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开始实行追求全球霸权的钳形战略：布雷顿森林体系有效地确立了美国的经济霸权，军事优势表现为它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美国构建军事力量只是为了遏制苏联、维持其在“二战”后世界两极世界中的地位，这种观点是没有充分的说服力的。帝国主义国家就是要实现压倒一切潜在对手的军事优势。

在阶级剥削层面，资本可以不直接使用军事、政治、司法权等经济之外的力量剥削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没有任何财产的地位迫使其出卖劳动力来换取工资，也使资本对劳工行使权力成为可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是通过直接的胁迫性力量、而是通过市场的经济中介进行的。当然，生产场所存在着许多胁迫。但资本主义统治的显著特征不是工厂主的权力，而是市场的力量。

使资本主义统治成为可能的是直接生产者对市场的依赖。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统治的特点，它使资本主义的阶级统治不同于其他形式。同时，在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区别。简言之，前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是直接行使胁迫性力量，目的是侵占领土、从臣民手中攫取劳动及资源、占领贸易通道。像资本主义阶级剥削一样，这种资本主义形式的帝国主义更多地依赖于经济因素的市场作用和帝国控制市场的能力，而不是直接的胁迫性力量。的确，被征服国家的经济不得不依赖于市场，就如同直接的生产者受到压榨而依赖于市场。向市场依赖转变通常是一桩血淋淋的事情，今天的“结构调整”也是如此。

一旦这种转变完成，帝国主义的许多使命可以通过对金融体系、债务等的控制来实现。总的说来，资本主义经济更愿意采取帝国主义的经济模式，而不愿意实行成本高昂的、

危险的直接殖民统治。资本主义在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之间建立起一种奇特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可以说是拥有不同于政治、军事权力的经济权力的惟一体系。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它能使剥削和积累的权力波及直接的政治或军事统治之外。在非资本主义形式之下，不论直接生产者生产多少剩余，剥削阶级攫取剩余的能力也仅限于政治、司法和军事权力。资产阶级权力不仅局限于此，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也是同样。

帝国主义对世界的政治 和军事统治与民族国家

资本在如此广泛的范围之内行使自己的经济权力取决于其摆脱政治、军事统治限制的能力。但它依然需要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帮助来维持社会秩序、创立资本积累的条件。实际上，资本主义比其他社会形式更需要一种精心设计的、稳定的和可预测的法律、政治及行政秩序。资本通过摆脱对经济之外权力的依赖来赢利，这同时意味着它必须依赖于外在于己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来提供这种秩序。就是说，它必须依赖国家权力。

现在，我们经常说全球化正在使民族国家作用削弱，经常谈起“全球治理”。似乎经济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只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简单的、机械的关系：全球经济如果不意味着一个全球国家，那就必然意味着全球治理。当然，这些理论认识到了滞后的政治形式赶不上全球经济的发展。这不仅为传统的全球化理论家所宣扬，它也是米歇尔·哈特与安东尼奥·耐格里的“帝国”理论的根源。“帝国”理论建立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上，即：全球资本的扩张意味着一种新型主权的发展。他们在《帝国》一书中说：“我们的基本假设是主权已经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由一系列国家和超国家组织按单一的统治逻辑组成。这种新的全球主权形式就是我们所说的帝国。”帝国的

基本特征是“民族国家的主权衰落，越来越难以控制经济和文化交流……”。在帝国中，权力是无所不在的，也是无集中之所在的。

资本决不是比从前更少地依赖地理上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讲，它的依赖性更强了，世界比从前更是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诚然，民族国家必须回应全球资本的要求。某些社会、法律和行政原则已经实现了国际化以利于资本的跨境流动。某些国际组织也在按照全球资本的要求行事。但那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国际化”。全球治理的主要工具还是民族国家。

我们生活在一个发展不平衡的世界之中。全球化并不是一体化的全球经济，这是全球经济与本土化国家的破碎体系并存的原因。全球资本从全球化中受益，但它不能组织全球化。一些研究者认为，全球公司不能单独组织自己的国际经营，更不用说全球经济。无论如何，它们需要民族国家替自己来组织这个世界。经济越是全球化，经济循环就越需要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协调来组织。对全球资本来说，国家而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是不可或缺的。

这一切都说明：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不只是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那样的简单、机械关系。它是一个复杂的关系。只要民族经济与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清晰联系，矛盾或潜在的矛盾就或多或少地是可以解决的。但目前其中的非联系化正在日益凸现。而且，问题不是资本逃脱民族国家的约束、使国家作用削弱，而是全球资本的确需要民族国家。

我在这里所要说的是新帝国主义，即美国的帝国主义。它很复杂，也充满了矛盾。从本质上看，它是一种全球经济秩序，一个由许多国家组成的管理体系。这是全球资本的统治面临严重不稳定和威胁的根源。今天的帝国主义霸权国感到不得不去应对这种矛盾来控制上述多国体系。其中，军事力量将发挥重大的作

用。这正是帝国战略开始出现严重问题的地方。在古典帝国主义时代，军事力量的作用是不言自明的。毕竟战争在帝国主义征服殖民地或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方面是没有神秘可言的。但在新帝国主义（以经济统治为主）时代，军事力量意味着什么？它在维持全球资本霸权方面的作用如何？

即使是美国的十分强大的军事力量也不能在所有时候、在所有地方起作用。而且，社会无秩序及经常爆发的战争也无助于资本的积累。不仅如此，其军事行动也缺少攻占特定领土、战胜特定的对手之类的明确目标。资本主义竞争非常复杂，不限于争夺殖民地那样的零和争斗方式。资本主义大国目前彼此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它们需要彼此相互充当市场和资本来源。因此，全球资本时代的帝国主义霸权依赖于控制竞争者，而不是与之交战。以此观察布什主义：一种战争主义，没有特定的目标，也没有空间和时间的界限，可以知道：这种疯狂和不计后果的政策最终注定要失败。

“示范效应”也是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的一个目标，即向世人显示美国军队可以在任何时候到达全球的任何地点，可以通过战争扶植听话的政权。美国固然在伊拉克有石油利益、也急于维持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但美国打击伊拉克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震慑伊拉克及中东地区不听话的国家，甚至于震慑整个世界。

美国面临的最大的难题是如何与友好的竞争者之间保持霸权关系，其原因是：苏联的解体使西方缺少一个共同的敌人，美国很难保持美国盟友的齐心协力。“二战”结束之后，美国享有稳固的经济霸权。它依赖于自己主导的联盟如北约来控制其他资本主义大国。今天，情况变得复杂了，因为美国的经济霸权不像从前那样不受任何挑战。这意味着美国要更加依赖军事优势，按照布什主义的设想，就是打造一支任何潜在对手都不能作为全球性大国和地区性大国对其提出挑战的军（下转第16页）

伊拉克战争与洛克菲勒家族集团

[美] 瓦迪·哈拉比 著 沈文玮 译

瓦迪·哈拉比是美共经济委员会委员、美共报刊的重要专栏撰稿人。本文是哈拉比近日给我刊寄来的专稿。他认为,美国经济日益受大垄断集团控制,特别是洛克菲勒家族集团控制,伊拉克战争、美国大公司腐败等事件的背后都有这一家族的影子。文章全译如下。

让帝国主义日益绝望的是,2001年《财富》杂志所列的世界500强即世界最大的500家公司的利润下降了54%,2002年又下降了56%。它们的销售利润率在2000年到2002年间急转直下,一下子从4.7%降为0.97%。在德国和日本,呆账问题和企业破产创下了历史纪录。甚至有关商业杂志也承认,“生产过剩”造成利润大幅减少。短缺确实存在,但由于没有足够的有效需求来消费资本家的生产能力,资本家看到的只能是“生产过剩”。

随着企业利润的下降,美国最高法院选择乔治·布什和布什为战争大肆宣扬也就不足为怪了。历史的确有过这样的经历:1893年危机后不久,年轻的美帝国主义对古巴、菲律宾群岛和中国发动了战争;1907年危机后不久,帝国主义者踏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路;1929年这次毁灭性的经济危机后不久,绝望之极的日本帝国主义野蛮发动了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战争,使世界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如果“9·11”事件没有发生,布什也会找到战争的借口。几周之内,美国势力进入前

苏联共和国,北约扩张到了前华约国地盘。工会遭到攻击。经过一年的战争威胁后,布什终于凭借各种借口下令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

现在美国(包括日本)一些垄断企业实力有了恢复迹象,这种恢复不是表现为工人工作岗位的增加,也不是表现为小资本家实力的恢复。而是《商业周刊》所列的900强(包括美国最大的垄断企业)的利润在2003年第一季度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33%,第二季度增长了31%。同时,日本最大的工业企业也正在显示出盈利增加或亏损减少。

这一经济反弹源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是来自中国和越南这些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国从资本主义国家购进的商品(进口)以2位数的速度增长,这些对于陷于生产过剩怪圈的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至关重要。中国从日本进口的商品在2003年1—4月份比2002年的同期上升了50%,这正是日本公司利润反弹的基础。

布什的巡航导弹和武装直升机是经济反弹的另一个原因。一方面,华尔街、华盛顿发现战争使资本从世界各地涌向美国。其结果是,自1999年3月轰炸南斯拉夫后,美国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金融资本的净增长从1999年第一季度的492亿美元,一下子猛增到第二季度的1109亿美元。同样地,对伊拉克的攻击使美国的金融资本净流入从2002年最后一个季度的542亿美元,一下子猛增为下一个季度的866

亿美元。

美国政府对于战争的鼓吹也带来了石油价格的猛涨。在现代社会中，石油仍然是基本的、而且在所有方面（开采、加工等等）都由华尔街垄断的产品，即使是英国或荷兰的公司也受美国垄断公司的控制。

石油垄断组织的所有者和华尔街银行的长远利益使它们追求“高价石油”而不是“廉价石油”。高价石油能使劳动力更廉价，并能在世界范围内掠夺小资本家的财富。对于石油垄断组织来说，高价石油是其利润的直接源泉。此外，华尔街将墨西哥、安哥拉等国的石油销售收入几乎全部夺来清偿自己的债务。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统治华尔街的两个家族——摩根集团和洛克菲勒集团证明了这一点。但其中只有一个家族——洛克菲勒家族获得了在石油和银行这两个行业的垄断地位。摩根家族由于不太关心婚姻和家族的繁衍传递，随着1943年小J.P. 摩根的去逝，摩根家族开始走向了衰败。

1957年，维克托·珀罗（Victor Perlo）在其《金融帝国》这一著作中提供了认识当代洛克菲勒集团统治世界的必要资料。珀罗在1971年出版的关于洛克菲勒的代理人亨利·基辛格的一篇专栏文章（最近收入《人民与利润》一书）中指出，洛克菲勒集团是“近些时候在华尔街最有影响力的力量”。

很久以前，洛克菲勒学会了退到幕后，并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寻找可靠的代理人。例如，乔治·舒尔茨就同时领导柏克德公司（Bechtel，与洛克菲勒集团关系密切的建筑公司）和美国国防部。正如珀罗指出的，“二战”以后的几十年里，美国政府的历任国务卿都与洛克菲勒家族有着密切关系。与战争引起的石油敛财相一致的是，美国能源垄断利润在2003年第一季度比上一年上涨了296%；埃克森美孚公司以7亿美元的利润高居所有公司之上，比上一年上涨了237%；而雪佛龙德士古公司（Chevron Texaco）也创造了2.1亿美元利润的记录，增幅高达192%。花旗集团在第一季度

的盈利中仅次于埃克森公司。J.P. 摩根大通公司——其前身是兼并摩根银行的大通曼哈顿银行——也不示弱。然而，比银行利润上升更突出的是六个美国“资金中心”银行的坏账却没有明显增多。那么由安然公司、世界通讯公司以及其他作为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的制造者的大规模的银行破产所造成的巨大坏账又到哪里去了呢？有迹象表明，大通等公司把坏账转向了美国国内外的养老金、互助基金、保险公司和较小的银行了。

埃克森美孚是新泽西州的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联合，雪佛龙是原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花旗集团是原第一全国城市银行，在摩根银行衰落后被洛克菲勒所控制。而大通则是洛克菲勒金融业的一面历史性旗帜。

现在美国负责打击伊拉克行动的是保罗·布雷默。他是谁？他受亨利·基辛格的长期厚爱，起初在尼克松时代作为基辛格的助手，然后负责基辛格的咨询业。

在对伊拉克占领中谁是赢家？柏克德公司——洛克菲勒控制的建筑公司；哈利伯顿公司——洛克菲勒控制的石油供应（现在也在经营军需供应）公司。最近，布雷默将“伊拉克贸易银行”的管理业务授予了大通公司。对此，《华尔街杂志》称之为“一个赚钱的工作”。

2003年8月14日晚上，巴格达和纽约同时停电。在巴格达停电很平常，也很严重。但是什么引起了美国电网的失灵？许多方面认为，其中一个因素是安然公司试图解除对电力市场的管制。

电网失灵的前两周，大通公司和花旗集团同意以3亿美元来解决政府对它们帮助安然公司操纵财务决算和误导投资者的控告。《财富》杂志报道说，大通和花旗“不是处在安然公司诈骗案的边缘，而是处在其核心”。在一篇安然公司破产审查的评论中，《华尔街杂志》高呼这两个银行是安然公司图谋背后的真正犯罪力量。安然公司也卷入了加利福尼亚的突然停

电事件和财富掠夺。很显然，洛克菲勒集团正企图垄断美国的电力市场。

美国能源垄断企业的利润在2003年第一季度增加了296%，同一季度，美国垄断企业的整体利润却仅增加了33%，而根据商务部的资料，当时所有美国企业的利润仅仅增加4%。这一切表明，受洛克菲勒控制的公司除外，其他大多数公司正处于停滞或倒退阶段。可见，乔治·布什正以对伊拉克的毁灭来挽救一个家族企业。

然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掠夺、日益严重的“生产过剩”、债务负担的加重和世界范围内的投机盛行，增加了经济震荡的可能性。洛克菲勒家族为更大的战争和更严重的危

机做好了准备。

8月14日晚上发生了在巴格达和纽约同时停电的事件，这两个地方出现问题的具体原因可能是有区别的，但我们可以看出，其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孤注一掷的家族的黑手，以及它操纵的整个社会体系的衰落和破产。这需要国际工人阶级取得光明，并保证光明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沈文玮：河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 刘元琪)

(上接第29页)于后现代世界来说，挑战就是要适应双重标准这一观念。当我们对付处于后现代的欧洲之外的老式国家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归早期的较为粗暴的方式——武力、先发制人的攻击、欺骗，总之一切用来对付实际上仍然生活在19世纪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必要手段。”这些国家不愿意接受美帝国及其伦敦的知心朋友的议程。

我们触到了问题的实质，即双重标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规则过时了。帝国统治者及其宫廷思想家卡根和库珀，若以法律、道德、伦理或者公平标准贩卖或捍卫他们的世界观，就会遇到重重困难。因此他们决定不遵守这些标准。

再次为了液体黄金

美国占领阿富汗，旨在建立为华盛顿的国际目标服务的新政府，这包括设立军事基地和监听站，从里海通过阿富汗敷设安全的油气管道。多年来，美国的石油大亨就盯上了里海周围巨大的油气储藏，渴望开辟经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通向印度洋的油气道路。

取得阿富汗之后，他们将兴趣转向了储藏更加丰富的伊拉克。知名的间谍小说家约翰·

勒卡尔曾说：“布什和他的统治集团成功地将美国对本·拉丹的愤怒转移到萨达姆·侯赛因身上，这是历史上运用公共关系制造阴谋的伟大范例。”

在此之前，帝国黑手党花了一年时间大肆宣传，不厌其烦地不断向全世界编造一个又一个故事，以说明为什么伊拉克是威胁，迫在眉睫的威胁，与日俱增的威胁，核武器的威胁，化学武器的威胁，生物武器的威胁，说伊拉克是恐怖主义国家，伊拉克与基地组织有牵连……其实每一个故事都是谎言。白宫需要的是战争，而他们得到了战争，他们打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反战抗议运动、席卷联合国的反对浪潮以及通过艰苦奋斗才赢得的国际法和国际合作。

如同在阿富汗一样，美国要更换侯赛因，扶持一个傀儡政府，这是战争的原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让美国的石油公司能够进入伊拉克，享受自由放任主义的欢宴；美帝国又控制了一个国家和更多的军事基地，以便由此出发进一步扩大其控制范围，并彻底改造中东。■

[徐洋：中央编译局]

(责任编辑 刘元琪)

意大利的极左政治与《帝国》

赵文编写

《纽约书评》2002年11月7日发表亚历山大·斯蒂尔(Alexander Stille)的文章《来得太早的启示录》，从意大利极左政治的角度评述了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耐格里的《帝国》一书，为我们解读《帝国》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关于《帝国》的介绍，可以参见本刊2002年第3期《全球治理还是单极霸权?》和2002年第7期《超国家的“帝国”秩序还是帝国主义的新阶段?——评〈帝国〉一书》。

耐格里与意大利极左政治

由于《帝国》一书的出版，耐格里现在在许多国家成了知识界的超级明星。这跟他在意大利的身份很不相称，在意大利，人们几乎普遍地认为他是个“坏蛋”，是个败坏青年一代的居心不良的教授，他将千百个年轻人送上了街垒，用永远也实现不了的共产主义革命来教唆他们。在意大利，耐格里现在仍然处于在家接受政府看管的状态。举个例子来说吧，《帝国》的韩文版出现很久以后才有意大利文版，它虽然相当令人吃惊地售出了4万册，但是意大利的评论家们整体上对它保持了冷漠。

在意大利，耐格里的名字是和所谓的“四月审判”联系在一起的。1979年4月7日，他和他的同事们在政府对他领导的“工人自治”运动的大镇压中被捕了。耐格里被指控为意大利主要恐怖主义组织“红色旅”的幕后策划人，除了种种罪名，他还被指控直接参与了对前总理阿尔多·莫罗的绑架活动。无论是上述

指控还是其他极为严重的指控都没有经过法庭正式程序；同样，他的政治组织中的几十个成员在正式审判之前一直被关押在监狱中。

耐格里，这位帕多瓦大学的政治哲学教授最早是以“工人权力”运动的发起人而著称的，这个组织的主要刊物《工人权力》在1971年一期的封面上印着这样的话：“民主就是工人肩上扛着的来复枪。”还有一期的封面上则印着“无产阶级，我们必须反抗，我们必须组织起来，我们必须武装自己”。20世纪70年代中期，意大利共产党开始接近权力中心，并试图通过所谓的“历史性妥协”策略进入由基督教民主党领导的联合政府。因此，到那时为止还尽可能与意共保持团结的极左派被抛入了危机之中。有些革命团体宣告解散，其中就包括“工人权力”。是进入由保守党组成的政府还是靠自己的力量走武装斗争的道路，许多接近意共的激进分子在这两者之间徘徊。正是在这段时间，左派恐怖主义作为斗争的主要代表浮现了出来，也正是在这段时间耐格里写作了一系列让他声名鹊起也让他声名狼藉的理论著作。

1977年，耐格里建立了一个名为“工人自治”的新团体，以此对激进左派的危机做出了反应。这个组织在武装和暴力革命这方面和“红色旅”有共同点，但是它对有组织的恐怖主义的态度却是复杂的和不明朗的。严格地讲，“工人自治”不是恐怖主义组织。“红色旅”由秘密成员构成；而“工人自治”则走上街头高声宣布他们的信仰。“红色旅”有严格

的等级制度和军事管理；而“工人自治”是松散和无政府的。如果将恐怖主义界定为杀害无辜平民的话，耐格里就绝对没有宣传过恐怖主义，他只是在鼓吹着他所谓的“群众性非法活动”，而这一运动的形式多种多样：从占领废弃建筑物、拒买车票等非暴力活动到妨害集会群众、抢劫银行和超市、殴打并胁迫政治对手等，不一而足。

耐格里认为，在后工业经济中，由于生产工艺的变化，在失业边缘徘徊的、朝不保夕的打零工的工人增加了，学生工人和知识分子工人的人数也大大增加。耐格里着重指出制造业向他所谓的“*lavoro immaterial*（非物质劳动）”的转型，其实“非物质劳动”指的就是服务行业和非工业性生产。他认为，新型的“自治”工人是天然的革命者，而意大利共产党还停留在20世纪早期的“工人—管理者”二元论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他对“非物质劳动”的强调也预见知识经济的增长。出于一种令人吃惊的理智上的自我中心主义，他在一部收录了他70年代以来所写政治论文的文集的新版前言中，将当代全球化看作是对70年代他所领导的那类极端抗议活动所作出的回应，他说：“为了取得文化领导权，政治上的资本家阶级不得不从70年代吸取教训，而且不得不也将自身组织成一种运动……我们早就看出了这种（包括网络，或者叫因特网在内的）公共领域的（新）生产方式……我们对资本的这种新的表现形式并不特别感到吃惊。”

公正地讲，耐格里20世纪70年代的著作对那个时期的经济转型所作的评论有一定的独到之处，在这段时期发生了许多大事，如1973年的石油危机、尼克松政府放弃了金本位制度，而且新的工作概念范畴也逐渐出现。尽管如此，他的作品也不是什么惟一眼光独到的东西。比如像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这类通过自由主义和民主观念写成的著作同样关注到了许多时代趋势。但是，就耐格里是由激进左派的理念出发关注时代趋势而言，

他是不同寻常的。

70年代以来耐格里作品中的那几段清晰的分析都被掩埋在他那让人不堪卒读的行文之中了，那种行文方式往往是将“无产阶级专政”这类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范畴和从法国后结构主义作品中借来的范畴相结合，而且通常还夸张地借用邓南遮的修辞来歌颂暴力的政治斗争，例如：“从今天开始，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必须通过暴力、通过战斗队……行动起来，去反对这项计划（经济结构的调整）……只有由全部无产者组成的武装组织才能赢得胜利。”实际上，耐格里在此期间的作品绝对没有给妥协留有丝毫余地，而且这些作品也反映出了他对敌人毫不留情的残酷态度。在《马克思，超越马克思》中他说：“必须把对手搞垮。”在《统治和破坏》中他又写道：“对我们的敌人不能手软！”

新的世界秩序和帝国

《帝国》让人吃惊，尤其让那些熟悉耐格里一贯鼓吹极端思想的历史的人们吃惊：它欢迎全球化，认为全球化要比和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前的资本主义形式好得多。对耐格里和哈特来说，商品和服务通过国际商业实现的全球流通与推行炮舰外交和帝国主义领土扩张政策的那种资本主义相比，是一个更为开放的体系。在全球市场和跨国商务支配的世界里，单个民族国家的地位削弱了，国家间的边界也模糊了，而战争则作为对商业最为不利的因素被极力回避。“帝国”，这个被耐格里和哈特用来定义新全球秩序的概念，和列宁所谴责的那种老式帝国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帝国通过发展一套“普遍价值”来寻求国家间的和谐关系。这一系列“普遍价值”不仅包括对人权和其他基本权利的尊重，而且也包括对财产权的尊重。他们写道：“和帝国相对抗并致力于推翻它的种种斗争，还有那些构成真正的替代方案的斗争，因而可能在帝国的领域内发

生——实际上，这种新型斗争已经开始浮现出来了。”就某些方面而言，这部三年前就写成的著作预见了今天的反全球化运动。尽管《帝国》对资本主义持强烈批判态度，但是它的语气是相对温和的：你在里面几乎找不到诸如“无产阶级专政”之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口号，而这类口号本是耐格里早期作品的一大特征。本书审慎地提出了一种“民主的替代方案”，帝国的受害者们将借此方案发起群众性的全民运动，从而使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封闭的国际组织彻底开放。

也许是因为受他的合作者哈特的影响，《帝国》是耐格里著作中最清楚、最可读的一部。鉴于渐渐形成的世界帝国并不那么暴力，而且它比老式的帝国主义要开放得多，所以他们写道，现在要说清楚谁在影响或控制谁是很困难的，尤其随着因特网的出现，情形更是如此。他们还说，人权和环境组织已经不自觉地充当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这些组织为建立在个人权益基础上的新经济秩序扫除障碍，做好准备；虽然同时它们还有着表达异议的潜能。

现在反全球化的抗议者不是在白宫前，而是在世界银行和八国首脑会议的会场外举行示威活动，这种现象说明了这些示威者的主权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示威者本能地意识到帝国不再受单个国家的意志支配着了。

和早期作品所反映出来的思想一样，耐格里认为绝大多数的造反行动是值得支持的。他和哈特赞扬了洛杉矶暴动、萨帕塔主义组织以及西雅图和热那亚大示威，认为它们虽然没有什么精良的武器，但它们的斗争却真正显示了争取自由的力量。他们写道：“这些运动本身就是具有颠覆性的。”“颠覆”一词在耐格里

的著作中总是具有一种积极的内涵。这里还回响着耐格里早期作品的声音：工人阶级的暴力一定是好的，因为它是工人阶级自我授权的一种形式。

哈特和耐格里写道“群众是当今世界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力量”，而帝国则纯粹是奴役人的工具，它靠榨取人民群众的生命和活力而存活，就像马克思可能会说的那样，它是吸血鬼的统治体系，是靠吸干活劳动的血而积累起来的死劳动的统治体系。耐格里和哈特对全球贸易在中国、印度尼西亚和非洲撒哈拉地区的人民身上产生的作用并不感兴趣，对这些地区人们在教育、医疗和妇女解放等方面的要求也不感兴趣。他们对全球化的批判也不同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或乔治·索罗斯，耐格里和哈特既不关心国际投资机构的实际工作，也对他们会怎样调整政策以改善贫穷国家的境况不感兴趣。耐格里和哈特并没有从经验出发去对具体的国家进行评估，看一看全球化到底是让这些国家的国民生活改善了还是恶化了。

逮捕、牢狱、逃亡、流放、他发起的运动的解散、共产主义的崩溃——面对着这些政治上的失败，耐格里设法在全球化时代唤起一种激进的观念。在大多数左翼已经撤离革命的时代，这种观念之所以具有诱惑力，大部分是由于它的自信，由于它那乐观的雄辩。但和以往一样，它无非是一种靠着故弄玄虚而得以建立的观念，它讨厌而且拒绝具体回答那个老问题——“怎么办？”■

[赵文：北京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 黄晓武)

印度共产党的现状及其内外政策主张

苗光新

编者按：在2004年5月举行的印度议会大选中，以印度共产党为首的左翼阵线赢得人民院543席中的61席，其中印度共产党(马)和印度共产党分别夺得44席和10席，成为仅次于国大党和全国民主联盟的第三大党团。那么，印度各主要共产党的现状如何？其政治主张是什么？它们对国大党和人民党抱有什么态度？本刊2002年第10期曾对印共(马)作过专门介绍，这里再刊发一篇关于另一个主要共产党——印度共产党的文章。

印度共产党是印度国内力量仅次于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组织，在印度的政治生活中有着一定的影响，现将其基本情况及内外政策主张介绍如下。

一、印度共产党的现状

印度共产党于1920年10月在苏联塔什干成立。1964年11月，印共由于内部分歧扩大而发生分裂，以孙达拉雅、南布迪里巴德为首的一派退出印共中央委员会，另立新党，起初仍沿用印度共产党原名，1966年11月，改称“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以丹吉、拉奥为首的另一派一直沿用印度共产党这个名称。分裂时印共确立的基本路线是，联合反帝、反封建、反垄断资本的力量，建立民族民主阵线，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以便成立由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行使权力的”民族民主国家，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印共一直坚持这一基本路线，并与国大党(英)在议会选举中结成联盟。在1977年举行的全国大选中，印共因其对国大党(英)1975年紧急状态法的支持等原因而失利，其所得选票从620万张降为520万张。^①与此同时，印共内部的分歧再起，以党主席丹吉为首的少数派继续坚持完全投靠国大

党(英)的立场，而以总书记拉奥为首的多数派认为，在新形势下，应调整印共的内外政策，首先是改变一贯支持、追随国大党(英)的政策。1978年4月印共召开十一大，决定放弃同国大党(英)联合的方针，转而与印共(马)等左翼政党合作，并参加了印共(马)领导的西孟加拉邦左翼阵线政府。1980年7月，丹吉辞去了党主席一职，并于1981年带领少数人脱离印共另外成立“全印共产党”，但该组织一直力量很小。内部的分裂对印共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它的力量还是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到1988年时，印共的党员人数达到45万多人，是印度国内力量仅次于印共(马)的有影响的共产主义组织。

苏东剧变对印共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但由于它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措施加以抵制，因而其力量不仅没有衰弱，反而还有所加强。到1997年时，印共的党员人数已增至56万人，所属群众组织达680多万人。1998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印共的力量几乎停止发展，党员人数只是在55万左右摆动。^②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印共已作出决定，要把加强党的建设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相信印共的力量会继续得到发展。可喜的是，在最近刚刚结束的印度第十四届大选中，印共获得10个席位，比上一届大选时增加了6席，而整个左翼阵线(LF)赢得了前所未有的

胜利,共获得61个席位。^③

二、印共的内外政策主张

2002年3月,印共召开了十八大,大会深入分析了急剧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阐明了新时代印共的内外政策主张。2004年初,由于参与竞选的需要,印共在自己的《竞选宣言》中又对自己的一些政策主张作了稍许调整。现将其各种政策主张分述如下。

1. 政治主张

印共对瓦杰帕伊政府在政治领域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指出印度人民党上台执政后不断践踏民主,剥夺人权,歧视妇女,通过颁布所谓的“禁止有组织的恐怖主义法案”(Prevention of Organised Terrorism Act),大肆强化警察机构的权力,控制工会等组织的反政府运动,大批迫害进步人士,在国内制造紧张气氛。印共强烈反对瓦杰帕伊政府的各项反民主政策,要求扩大民主,结束迫害;倡导世俗主义,反对教派主义,主张各宗教一律平等,和睦相处;反对种姓主义,主张各种姓一律平等,保护低等种姓、部落民及所有弱势群体的利益;强调妇女应在政治、经济、文化及接受教育等方面享有与男人平等的权利,促使议会通过立法,为妇女在中央及邦议会保留33%的席位。

在十八大上,印共提出要建立既取代印度人民党又取代国大党的“第三种替代性力量”。印共指出,必须把印度人民党及其同盟从中央及邦政权中赶下台,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回到国大党统治的时代。国大党在最后的执政时期(拉奥政府和辛格政府时期)错误地推行了所谓的“经济改革”及全球化政策,因此,应建立一种既取代印度人民党统治又取代国大党统治的替代性力量——由左翼及民主的和世俗的力量组成的“第三种力量”,地区性政党也应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印共指出,一般来讲,地方政党只代表本地区人民的心声,由于机会主义的和地域性的原因,这些政党的立场

或左或右,摇摆不定,因此应积极争取地方政党,使它们尽可能摆脱教派主义右翼政党的影响,加入左翼的行列。印共认为,参加印度人民党政府的一些地方政党,尽管其世界观基本上是世俗的,但为了分享中央政权,却与印度人民党及其同盟沆瀣一气,放弃了自己的立场,这预示着建立“第三种力量”的道路必然会错综曲折,有时甚至会倒退。印共强调,取代印度人民党和国大党的统治并不意味着把国大党与印度人民党等同看待。事实上,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国大党是一个世俗性政党,而印度人民党是一个教派主义政党。左翼可以利用国大党来推进世俗主义事业和民主权利,在第三种力量形成之前,有必要与国大党达成某种谅解,共同击败印度人民党及其同盟。但是,与国大党达成某种谅解并不意味着左翼要尾随国大党,支持其取代印度人民党重掌政权,如果这样,势必会在印度导致资产阶级两党制的出现,那将使左翼变得无关紧要,成为国大党纯粹的支持者。

在2004年印度第十四届大选来临之前,为了达到坚决把印度人民党赶下台的目的,也由于国大党在自己的《竞选宣言》中所表现出的亲民内容以及同左翼政党的主动接近,印共在自己的《竞选宣言》中对十八大时所确立的对国大党的政策作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从过去主张既反对印度人民党又反对国大党改为联合国大党以及其他一切世俗主义力量,坚决把印度人民党赶下台,并确保印度人民党今后永远不能东山再起。大选结果是国大党及其联盟取得了胜利,包括印共在内的左翼阵线在其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左翼阵线的支持,国大党及其联盟就无法组阁。但是,四个左翼政党协调一致,决定不参加国大党领导的全国进步联盟(NPA)政府,而是在外围对国大党进行支持,并保持其对政府有关政策的批评建议权。

2. 经济政策

印共对瓦杰帕伊政府所推行的经济政策进行了批判,指出印度人民党政府听从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指示，拼命推行自由化、私有化和全球化，实施了一系列所谓的改革措施：向国内外的大公司廉价拍卖珍贵的公有资产，声称国营企业是国家的一大负担，国家从这些亏损企业中一无所获；取消进口限额和降低进口关税，完全向外商开放国内市场，使农业、金融、纺织等领域遭受了严重的冲击；取消对农民的保护，如实行电力私有化，史无前例地提高电价，取消对化肥和柴油的补助，提高化肥和其他农用物资的价格，取消政府以最低保护价收购农产品，削减在灌溉、农业研究方面的公共投资，削减农业信贷等；对土地实行公司化改革，由此而改变了原有的土改措施，导致一个新的地主阶级的产生，大批农民被迫离开他们的土地，沦为无地劳工。印共认为，印度人民党政府的经济改革措施并未如推行者想像的那样，推动印度经济快速增长，反而破坏了印度的经济基础，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贫困、饥饿、失业和疾病等问题进一步恶化。

印共提出了以下一系列经济政策。一是实行土地改革，执行土地改革法，把多余的和废弃的土地分给无地农民，从而扭转日益严重的无地化的趋势，禁止通过租赁、承包以及公司化等形式来躲避土地最高限额法限制的行为。通过综合性立法确保农业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最低工资和社会安全，并使他们从债务和高利贷中解脱出来。这会激发农村基层群众的潜能，使农村恢复活力，同时，给封建地主制的社会、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的基础以重重一击。二是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和预算，建立农业补贴制度，减少农民的生产费用，鼓励农业生产，增强印度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保护贫苦农民特别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民的生计，通过公共金融机构向农户特别是贫农和边际农提供充足的信贷。三是增加贫苦农民的购买力，以改变需求下降的趋势，需求的下降正

影响着工业及其他领域的增长。四是重新实施进口数额限制和高额进口关税，保护农业及各种弱小领域，向享受出口补贴的外国商品加征反倾销税，以抵制这些商品在国内市场的倾销。五是遏止“非工业化”及“失业增长”的进程。六是改革国营企业，使其得到复兴和巩固，并实现现代化，使管理走向专业化，排除官僚控制和多余的政治干预。七是进一步保持和发展印度在信息产业以及相关领域的领先地位。八是充分利用在公、私两个领域的潜力，充分调动国内各种资源，包括黑钱、银行所谓非经营性资产、偷漏的个人所得税等，发展印度经济。九是国家参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分权的潘查雅特制度(Panchayat raj)*使人民参与制订发展规划，积极投身于建设运动，这会大大促进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基层大众生活质量的改善。十是在互惠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在特定的领域吸引国外资本和高科技，外商一般应在新领域进行投资，而不是获得对现有企业的控制权。十一是强化对财政的控制和管理，防止卢比贬值。十二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发起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运动，迫使其减少和取消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无条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印度还应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内部联合行动，促使世界贸易组织在发挥作用方面趋向民主，有利于发展中国家。

3. 文化教育政策

印共强烈谴责印度人民党政府在文化教育领域向人民发动的进攻，指出印度人民党及印度教“同盟家族”(Sangh Parivar)极力宣扬宗教复兴主义，不断强化其“印度教特性”(Hindutva)计划，让平庸无能的印度国民志愿团(RSS)分子在所有最高的文化和教育机构任职，重新改写课本，篡改历史教科书，公然破坏印度宪法中有关世俗主义的规定，把道德价值的教育与一种特殊形式的印度教的灌输混杂

* 潘查雅特制度又称乡村评议会制度，是现代印度乡村中的自治制度。潘查雅特原指古代印度村社中种姓制度的最重要的裁决和批准机构，一般由五个有威望的年长者组成，故又称五人长老会。

在一起,向世俗的、科学的、民主的观念发动公开的进攻。印共认为,作为印度人民党意识形态工具的所谓的“文化民族主义”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理论正威胁着印度这个伟大的国家所特有的各种丰富多彩的文化的存在。印共强调,应从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和实践的等各个层面向印度人民党及印度教“同盟家族”的进攻发起反击,倡导实行普遍基础教育以及广泛的科学和技术教育,提高人民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自觉抵制类似宗教复兴主义等愚昧落后思想的影响,主张实现国家和社会的世俗化、民主化与多元化。

4. 统战政策

自1978年印共放弃同国大党(英)联合的方针以来,印共一直主张实现左翼联合,在1989年召开的十四大上甚至提出印共与印共(马)应重新实现统一。在1992年召开的十五大上,印共重申希望印度共产主义运动重新统一。然而,由于印共(马)对于印共提出的两党重新统一问题反应并不积极,印共在1995年召开的十六大上尽管仍主张应在原则基础上实现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但不再提两党统一的问题。在2002年的十八大上,印共一方面继续强调实现左翼联合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强调实现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统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印共积极倡导加强和巩固左翼的联合。印共认为,为了有效地阻止印度人民党的反人民、反国家的政策,需要发动由工人、农民、农业苦力劳工、学生和青年等起主导作用的人民运动,并吸引更广泛的人群——商人、小业主、企业家以及知识分子等的参与,但是,一个不能互相协调行动的左翼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因而,加强和巩固左翼的联合就显得非常必要。这就要求左翼政党之间要有一定程度的相互谅解,具有互相包容的精神,抛弃相互关系中自视“高人一等”的做法。

印共积极主张实现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指出在不远的将来,共产主义的联合与统一问题会变得更为紧迫并有着新的内容。印共

认为,两个共产主义政党——印共和印共(马)是左翼阵线的核心,也是其基础,当今面临巨大的挑战,两党不能再停步不前。共产党是反动派进攻的目标,印度人民党政府在文化、教育以及意识形态等领域发动的进攻直接针对的就是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民主进步力量。因此,共产党人不能仅仅停留在左翼联合的层面,当前的形势迫切要求实现共产主义运动的联合与统一。印共认为,虽然印共与印共(马)之间存在一些重大分歧,但是双方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共同看法,在多数问题上采取的共同行动以及群众性组织在诸多关系到人民大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采取的共同行动,足以把两党的距离拉近。因此,实现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是具有可能性的,两党、特别是两党的领导人应当走到一起,共同讨论这些分歧并逐步加以消除。印共认为,要真正实现共产主义运动的联合与统一,就要求两党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共识:一是关于意识形态及其在印度具体实践中的运用;二是关于共产党的纲领,即党的战略构想与路线;三是关于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以及由此而采取的政治策略路线;四是关于组织原则。印共强调,这一切都应本着坦诚互谅的精神得到讨论。

由于种种原因,实现共产主义的统一在短期内似乎还不具有可能性。但可喜的是,在2004年第十四届大选的竞选过程中,印共与左翼阵线的其他三个政党印共(马)、社会主义革命党(RSP)以及全印前进同盟(AIFB)能协调一致,并能与国大党进行联合,终于把印度人民党赶下了台。相信随着实践的发展,印度的两个主要的共产主义政党最终会走向统一。

5. 对外政策

印共坚决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特别是基于原教旨主义的恐怖主义,同时也反对美国以反恐为名到处推行霸权主义的侵略行径,认为对恐怖主义的界定不应有双重标准。印共指出,恐怖主义必须得到根除,但是战争并非解决问题的办法。印共坚决反对美国的核战争政策,反对其领导下的北约东扩,认为中国与(下转第35页)